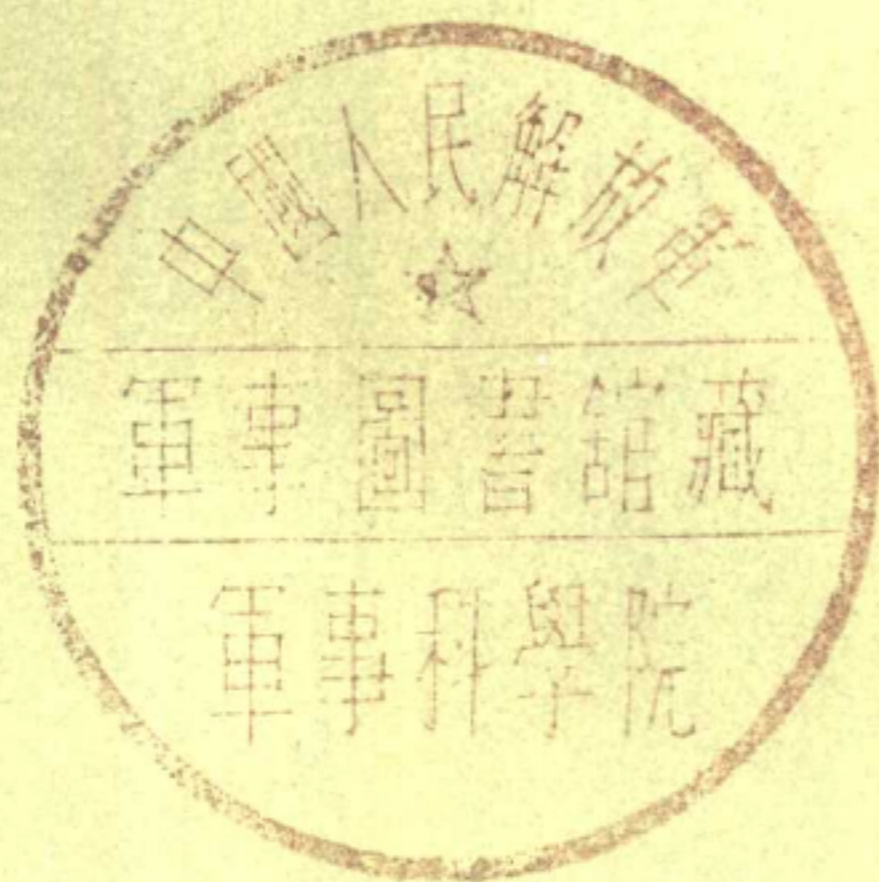


梅林著

馬克思和恩格斯  
是科學共產主義  
的創始人

何清新譯



馬克思和恩格斯  
是科学共产主义  
的創始人

梅 林 著

何 清 新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二年·北京

Франц Меринг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ЗДАТЕЛЬ НАУЧ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0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六〇年俄文版翻译 原著以德  
文出版，原作者是 F. Mehring. 俄文版曾根据梅林《德  
国社会民主党史》1906年斯图加特德文第三版 (Franz  
Mehring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  
demokratie", Dritte Auflage, Stuttgart, 1906)  
校订，校订者：Г. Б. 柯甫阔金和 В. А. 莫羅左娃。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創始人

[德] 梅林 著

何清新 译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56号

人民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7·插頁3·字数169,000

1962年6月第1版

196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400 定价(七)1.10元

統一书号3302·72



## 序 言

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 1846—1919)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理論家之一,大历史学家,卓越的政論家和文艺学家。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梅林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該党的理論刊物——《新时代》(“Die Neue Zeit”)杂志的編輯之一。他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积极反对資产階級哲学。他的一些批判各种反动的哲学派別的天才論文,目前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梅林同修正主义进行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修正主义力图把馬克思主义“适应于”新的条件,以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論完全变成道德观念,把无产階級学說的几个基本問題(階級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階級专政)当作不符合“业已变化的時間条件”的东西拋棄掉。

梅林同卡尔·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一起发表了大量的論文(特别是在梅林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主編的《萊比錫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上),反击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对于馬克思主义的批評。他正确地指出,修正主义者极想用試图使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調和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唯心主义观点盜換馬克思主义的革命辯証法,这就是直接背叛工人階級的学說。

1913年,梅林离开《新时代》杂志編輯部,并且实际上不再給該杂志撰稿,从而同已經不想跟社会民主党中的日益抬头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中派分子卡·考茨基(K. Kautsky)断絕了关系。

FU02/2A-7

梅林正确地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他大胆地譴責以考茨基為首的社會民主黨領導當局的叛變立場，這個領導當局聲稱國內和平是民族生存的迫切問題。1915年4月，他在《我們的奠基人和領導政策》一文中批判德國社會民主黨上層統治人物的政策，認為執行這種政策是出賣無產階級的事業，是背叛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

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在反對右翼首領的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中，建立了一個革命的組織——“斯巴達克聯盟”。羅·盧森堡、卡·李卜克內西、克拉拉·蔡特金 (Clara Zetkin)、尤里安·馬爾赫列夫斯基 (Julian Marchlewski)、威廉·皮克 (Wilhelm Pieck) 等人，都曾參加過聯盟的成立工作。梅林也是“斯巴達克聯盟”的組織者之一。聯盟的成員起來反對軍國主義，領導人民的革命運動，揭穿社會民主黨右翼領導人，于是在這種條件下成了德國工人階級利益的真正表達者。他們為籌備和建立德國共產黨 (1918年底) 起了決定性作用。

梅林的活動和工作，並不是沒有錯誤的。這方面的錯誤，主要在於他低估了作為群眾的政治領導者和教育者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作用，不理解必須從理論上和組織上同機會主義斷絕關係。列寧寫道：“……連梅林和蔡特金這樣的人也竟然過多地‘從品質上’（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而很少從理論上同考茨基劃清界綫……”<sup>①</sup>

十月革命幫助了梅林克服許多錯誤。這十分明顯地表現在他對於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活動的高度評價上面。他在1918年寫道：“布爾什維克是可使民主和平得到充分保證的唯一的俄國政黨……是能夠完全擊退任何帝國主義者、無論是英國帝國主義者還是德國帝國主義者的一切進攻的政黨。”列寧立刻注意到這一點，他在同一年說道，梅林“……寫了許多文章向德國工人

<sup>①</sup> 《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9頁。

証明，只有布尔什維克才正确地了解了社会主义……”<sup>①</sup>用列宁的話來說，梅林的“頭腦和心靈”都是同布尔什維克一致的。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對於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梅林給予很高的評價。列寧說梅林是“一個不僅希望而且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列寧屢次引用梅林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一書，認為它是敘述德國工人運動史的主要著作之一。梅林的這部書和其他著作，使人有理由認為他是一位優秀的德國工人運動歷史學家。

《科學社會主義文庫》的這一分冊，從梅林的四卷本著作《德國社會民主黨史》（1897年）中選出關於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形成的若干章節。

梅林在詳細研究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幾個主要形成階段時，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在整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方面進行了十分巨大的工作。

雖然梅林的這部書中沒有專章評述英國無產階級的運動（憲章運動）、法國工人階級的發動（1831年和1834年里昂起義）和德國工人的發動（1844年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但是作者在敘述的過程中，指出了日益發展的無產階級運動是怎樣影響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的觀點形成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是怎樣變成工人階級為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的旗幟的。

在梅林的這部書的頭几章里，敘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黑格爾左派運動時期的生平和活動；這個運動的代表者大衛·施特勞斯（David Strauss）、阿爾諾德·盧格（Arnold Ruge）、布魯諾·鮑威爾（Bruno Bauer）和埃德加爾·鮑威爾（Edgar Bauer）兄弟，從喬·黑格爾（Georg Hegel）的哲學中作出激進的和無神論的結論。馬克思和恩格斯跟其餘一切黑格爾左派分子不同的地方，在

<sup>①</sup> 《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0頁。

于他們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积极参加实际斗争，这种斗争推动他们在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道路步步前进。梅林在分析马克思 1842—1843 年发表于《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上的反对德国的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的著作时，特别明显地指出了这一点。

梅林在评述马克思批判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几篇文章，以及《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关于摩塞尔农民的状况）一文时着重指出，马克思只是“通过认真地分析经济事实”，才“认识了唯心主义的社会观和国家观的缺陷”。

在《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中，马克思接近理解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公开保卫政治上受压迫的群众。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就已经开始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从恩格斯由英国专为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所写的通讯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向。

但是，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走上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立场的著作，是他们发表在《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上的文章。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工人阶级的观点出发，严厉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向无产阶级呼吁，认为这个阶级是能够推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力量。梅林在详尽地评述马克思的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和恩格斯的论文（《英国状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着重指出这几篇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的作用以后，认为关于无产阶级的形成是使社会摆脱剥削的保证的这一原理，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在这个时期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无产阶级是苦于完全无权的阶级，它要不解放整个社会，就不能解放自己。

梅林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以后，接着評述他們以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写出的著作。从1844年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全面地研究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原则，同时利用唯物主义去解釋历史过程。这样的研究是无产阶级学說形成过程的必要阶段，因为沒有一般理論前提和方法論前提，就无法开始分析資产阶级社会的經濟条件，而如果沒有这种分析，又不可能証明共产主义的自然的歷史必然性。

梅林以他固有的深入和認真钻研精神，分析了标志經典作家創制科学共产主义理論的每一部著作。我們不打算詳細叙述梅林所分析的几部著作（他对这几部著作研究得十分詳尽）的主要思想，而要談一談表現在这本小册子上的某些不够正确和疏漏的地方。

比如，梅林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就其內容來說，沒有超出他們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几篇文章所初步勾画出来的思想的范圍，我們是不能同意这种說法的。虽然《神圣家族》一书也具有論战的性質，但是在《德法年鉴》中表述的一些原理，又在其中得到了具体的論証和进一步发展。正如列宁指出的，《神圣家族》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sup>①</sup>的基础。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左派分子关于思想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时指出，創造历史的并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掌握这种思想并应用实践力量去把它們变为现实的人；只有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斗争消除本身生存的客觀的悲惨条件。列宁特別着重指出过《神圣家族》里面提出的一項原理的重要意义。这項原理就是：社会上发生的变革越广泛和越深入，参加这个变革的群众也就越多。关于无产阶级的全世界历史任务的天才思想，在《神圣家族》中表述得更为具体，并同資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經濟状况联系起来。比如，在《神圣家族》中写道：“无产阶级……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給自己做出的判决……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約着它的对立面——私

①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頁。

有制都趋于消灭。”<sup>①</sup>

在《神圣家族》里，也仔细地分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些基本思想。因此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在这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方面，比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马克思在写《神圣家族》以前，曾为筹编一部哲学—经济学著作做了巨大的工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阐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价值和意义，指出了粗鄙的平均的共产主义的缺点。这部著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sup>②</sup>。梅林没有提到这部著作。然而在这本书里，马克思已经明白了后来他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发挥的许多原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具体地表述了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的思想。马克思写道：“……人类的一切奴役制度，包含在工人对于生产的关系里面；而整个奴役关系，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sup>③</sup>；正因为这样，工人的解放“包括着全人类的解放”<sup>④</sup>。

梅林的这部著作的严重疏漏，是其中没有详细地评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这种情况的产生原因，是梅林当时还没有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些重要章节（这本书的手稿，在1932年才由苏联首次全部发表）。

在写这部书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科学地论证自己的观点，说服欧洲的，而首先是德国的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人物相信这些观点的正确性。因此，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竭尽全力，全面地论证了新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也给予很大的注意。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全部历史的基础，所以为社会发展开辟着巨大可能性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现有经济条件的必然结果。同时，他们认为共产主义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② 中译本的书名为《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中译者

③④ 参见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页。

的必然性，在于“推翻統治階級的那个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旧的肮脏東西，才能建立社會的新基礎。”<sup>①</sup>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更加具體地提出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的作用的問題。每一個力圖取得統治的階級，“都必須首先奪取政權”<sup>②</sup>，我們不能不認為這項原理是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基础。

關於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各種所有制形式、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係等問題的深刻研究，以及其他許多詳細研究，使《德意志意識形態》成為馬克思主義形成時期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列寧認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後寫成的《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已經是馬克思主義的成熟作品。

在這本小冊子的最後兩章里，梅林敘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第一個國際無產階級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活動，但是他把中心放在闡發馬克思主義的兩部天才著作——《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思想上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自己的理論研究和實際鬥爭所達到的結果作了經典性敘述；而《資本論》這部近代的“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文獻”<sup>③</sup>，則是科學共產主義的主要著作，它已經在闡述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及其矛盾的運動規律的基礎上證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

梅林的這部著作是根據大量的和重要的歷史資料寫成的。本書可以幫助研究科學社會主義的人了解無產階級的這兩位偉大導師是怎樣生活和工作的，他們是在什麼環境下創造出自己的革命理論的，以及這一革命理論的基本原則是什麼。本書明晰而深刻地敘述了所向無敵的共產主義學說的幾個主要形成階段。

阿·波利亞科夫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頁。

② 同上書，第38頁。

③ 《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頁。

## 目 次

序 言	1
第一章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
第二章 《莱茵报》	21
第三章 《德法年鉴》	43
第一节 杂志的创办和停刊	43
第二节 马克思的论文	52
第三节 恩格斯的论文	66
第四节 《神圣家族》	83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	97
第一节 恩格斯论英国工人状况	97
第二节 马克思论费尔巴哈	111
第三节 马克思反驳蒲鲁东	117
第五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	137
第一节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144
第二节 《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150
第三节 正义者同盟内的危机	161
第四节 《共产党宣言》	167
第六章 科学共产主义的成就	189
第一节 马克思论商品和货币	191
第二节 科学共产主义的一部主要作品	200

## 第一章

### 卡尔·马克思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在 1818 年 5 月 5 日生于特利尔 (Trier)。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律师，后来得到司法顾问的名衔<sup>①</sup>，于 1824 年率领全家由犹太教改奉基督教。正在成长的卡尔·马克思，在年幼的时候，就引起了父母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这种希望是注定不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实现的。他的母亲原是荷兰籍的犹太人，终生说着一口半通不通的德国话。她是一位疼爱儿子和关心家务的妇女，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显然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父亲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精通约·洛克 (J. Locke)、哥·莱布尼茨 (G. Leibniz) 和哥·埃·莱辛 (G. E. Lessing) 的著作，但决不是一个革命者，而不过是德意志的和甚至是普鲁士的爱国者。他为人温和和蔼，不安地观察着“魔鬼”在爱子身上的一些最初表现。他在卡尔·马克思刚满二十岁的时候与世长辞，比在 1863 年才逝世的马克思母亲幸福，因为老妇人恰好经历了这位绝代天才与不承认他的世界进行坚强斗争的几十年最艰苦的岁月。马克思由于父母的关怀，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无忧无虑的青

---

<sup>①</sup> 马克思的父亲取得司法顾问 (Justizrat) 的名衔以后，还被选为当地的律师公会会长。——俄译本编者

年时代。馬克思一开始就表現出的那种完全脱离犹太<sup>①</sup>的自主精神，也有賴于他的父母；我們从任何一位曾在历史上发生某种作用的德国籍犹太人身上，都沒有見到过这种程度的自主精神。像亨·海涅（H. Heine）和斐·拉薩尔<sup>②</sup>这样才气同他相近的人物，或者像路·白尔尼<sup>③</sup>和約·雅科比<sup>④</sup>这样聪明睿智的人，都沒有达到这样的自主程度。雅科比利用关于宗教容忍的虛伪論据为犹太人辯护，而馬克思早已理解了犹太人問題的社会性质。

东欧的犹太人和西欧的犹太人，在文化上处于非常不同的发

① “犹太”一詞的俄文为 Еврейство，除了有“犹太人”、“犹太教”的意思以外，还有“作生意”、“放高利貸”的意思，或指一般的“犹太人习气”。以后，有时把这个詞譯为“犹太人”和“犹太教”。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6頁。——中譯者

② 拉薩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律師出身；从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在工人中間进行鼓动宣傳；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年）的创办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的普魯士的霸权下“自上”来統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內建立了机会主义派別。梅林对于拉薩尔的評价有严重的錯誤，把他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平列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

实际上，無論是拉薩尔的理論著作，还是他的实践活动，都与馬克思主义大相徑庭。汉·迈尔（H. Mayer）在1928年（梅林死后）发现的拉薩尔同俾斯麦（O. Bismarck）的通信，完全証实拉薩尔是同这位首相有勾結的。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說拉薩尔“跟俾斯麦訂立了一个真正的契約”，从而事实上“叛变了党”的时候（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56頁。——中譯者），他們是正确的。然而，他們对于拉薩尔在德国工人中間进行的鼓动宣傳工作，却給予很高的評价。——俄譯本編者

③ 白尔尼，路德維希（Börne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論家和批評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报道法国1830年革命事件的名著《巴黎来信》（“Briefe aus Paris”）（1830—1833年）。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俄譯本編者

④ 雅科比，約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魯士国民會議中的左翼領袖之一，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接近社会民主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問題上跟雅科比持有不同的見解，但是給予他以很高的評价，認為他是站在工人运动方面的民主主义者。——俄譯本編者

展阶段。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和英国，以及很大程度内也在荷兰，犹太人把精神寄托于本族的伟大历史的传说，漂浮在资产阶级文化的激流上面；甚至他们还有时遭到的迫害，也在顽强的斗争中锻炼了他们。在东欧，即在多瑙河沿岸各国、波希米亚和波兰，以及在德国，一直到亚尔萨斯和法国北部，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地方的犹太人，同荒淫无度的专制暴君和遭受奴役的群众生活在一起。这两者都需要犹太人，可是又轻视他们，而犹太人也看不起他们两者。犹太人在这里还完全依靠寄生性的投机生意和高利盘剥活动维持生活。这种社会的对立性，日益胜过血统和信仰的共同性。比如在汉堡，一个具有高度教养的葡萄牙—西班牙籍犹太人集团，同另一个完全没有教养的德国—波兰籍犹太人集团并存，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法国革命的法制，最初对“南犹太人”和“北犹太人”实行差别待遇；它首先从政治上解放了前者，只是后来才使后者同基督徒有了平等的权利。《拿破仑法典》<sup>①</sup>仍然保存着这项平权的规定，而后来的莱茵普鲁士，在1808年就颁布了一道严格限制放高利贷的犹太人的皇帝命令。在这方面，莱茵河沿岸地区在一定程度内也是资产阶级西欧和封建主义东欧之间的连结地点。在莱茵地方的城市里，住着有教养的犹太人，他们的犹太性格仍被保存着，同时又受到了一般资产阶级文化的熏染；而在莱茵地方的农村里，并且恰好是在特利尔城附近，放高利贷的犹太人飞扬跋扈，利用他们在东欧封建制度解体过程中琢磨出来的恶毒方法压迫小农。

有些地方官吏，用引人注意的鲜明色彩，在报告中描绘小土地

---

<sup>①</sup> 《拿破仑法典》——在拿破仑参加下制定的于1804年3月批准的法国民法法典。恩格斯指出，《拿破仑法典》是“典型式的资产阶级社会法典”（《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94页。——中译者）。这部法典曾对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发生过影响。——俄译本编者

所有制由于放高利貸的犹太人的盘剥，而日益沒落。馬克思律師正是同这些官吏交往，跟他們保持事务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在这种結交当中，特別有一項結交对于卡尔·馬克思的生活起过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把馬克思家同参事官<sup>①</sup>威斯特华倫 (Ludwig von Westphalen) 家联系起来的邻誼。

年輕的卡尔·馬克思，把这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官吏的家庭当作了自己的第二家庭。他跟老威斯特华倫学会了閱讀荷馬 (Homerus) 和威·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的著作，这两位作家后来成了他終生喜爱的詩人。威斯特华倫家的孩子們成了他的游戏伙伴，而燕妮·馮·威斯特华倫 (Jenny von Westphalen) 后来作了他的終生伴侶。燕妮在 1814 年生于薩尔茨維德尔 (Salzwe-del)，比馬克思大几岁；她是一位高雅而勇敢的夫人，恐怕其他革命斗士很少有过这样的內助。早在 1836 年，他們就訂立了婚約，而在 1843 年《萊茵报》<sup>②</sup> 被查封后，便于克罗茨納赫 (Kreuznach) 举行了婚礼。从此以后，燕妮·馬克思不仅同自己丈夫的劳动、斗争和命运与共，而且以最透彻的理解和最熾烈的热情参加劳动与斗争，以及分享命运的甘苦。

卡尔·馬克思的生活道路，是在吉星高照之下开始的。早在幼年时期，馬克思就已显出雋拔的才华。他不必浪费这种才华去反对外界的障碍；相反地，这种才华受到馬克思从小在其中长大的

---

① 参事官 (Regierungsrat)，即政府的顧問。——俄譯本編者

② 全称《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日报，从 1842 年 1 月 1 日到 1843 年 3 月 31 日在科倫 (Köln) 出版。这份报纸是由一些对普魯士专制制度持有反对情緒的萊茵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創办的。有些黑格尔左派人物，也应邀为报纸撰稿。从 1842 年 4 月起，馬克思开始为《萊茵报》写稿，而从同年 10 月以后，又成为該报的編輯之一。在馬克思未到編輯部以前，报纸的領導人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阿道夫·魯滕堡 (Adolf Rutenberg 1808—1869)。恩格斯也在这个报纸上发表过几篇文章 (关于《萊茵报》，請參看本书第 2 章)。——俄譯本編者



整个社会环境的鼓励，得到了和諧的发展。在馬克思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沒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将来变成像无产阶级的死敌們迄今还想把他說成的那样丑恶的人物——冷得像冰、心地凶狠、既不满意自己又不满意他人、血管里流着的不是血液而是硝酸的蠱惑煽动分子。在无产阶级的死敌們的这种奇談当中，也有很少一点真理，那就是馬克思不是出于冲动的热情而是由于深刻地認識了事物的內部联系才成为革命家的这一事实，証明着馬克思的发展是极其和諧的。年輕的馬克思，是一个精神焕发、身体健康、力量充沛的人，全心全意地渴望人生能够真正完滿。詩是他的最初艺术作品。他所以未曾在刊物上发表过一首詩，想必是出于一个基本原因，即受形式束縛的語言，是同他格格不入的。但是，描写的无比突出，証明馬克思是具有真正詩人的若干特征的。甚至在他闡述最干燥无味的問題时，我們都可以看到他的描写的无比突出。在海涅、弗萊里格拉特<sup>①</sup>和維尔特<sup>②</sup>的革命詩里，可以看到他們受到过馬克思影响的深刻痕迹。每当他討論美学問題的时候，不但說得精細入微，而且具有深厚的情感。

卡尔·馬克思十六岁时入波恩大学，遵照父亲的希望在这里学习法学，但是在大学生活的第一年，就显然沒有得到特殊的成果。这个渴望求知的青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工作，以致在1836年秋天剛剛訂婚以后，就迁往柏林去了。不錯，他在这里也沒有成为一个規規矩矩的大学生；在九个学期当中，他只注册了十二門課

① 弗萊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的革命詩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曾同格奥尔格·維尔特一起領導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报》的文学部。后来脱离了革命活动(关于馬克思和弗萊里格拉特的关系，請參看梅林：《从彼此的通信中看弗萊里格拉特和馬克思的关系》，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俄文版)。——俄譯本編者

② 維尔特，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76)——著名的德国詩人和政論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恩格斯称他为“第一个最重要的德国无产阶级詩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上册，俄文第一版，第154頁。——中譯者)。曾任《新萊茵报》的副刊編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俄譯本編者

程，而究竟听完了几門，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問題——如果认为这项研究一般說来还有某种意义的話。根据馬克思在学校时写成的文章，可以知道大学教师当中，只有甘斯<sup>①</sup>一人对他发生过影响。当时，甘斯同法的历史学派<sup>②</sup>及其首領薩維尼經常論战。对于大学时代的馬克思具有巨大意义的事件，是在他放棄最初的毫无实现希望的掌握大量科学材料的試图以后，走出自己的孤独的书斋，加入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团体。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正忙于清理自己老师的精神遗产，而且比施特劳斯<sup>③</sup>在《耶穌傳》中所做的清理更具有批判精神。在这个团体里，卡尔·馬克思結識了布魯諾·鮑威尔<sup>④</sup>和弗里德里希·科本<sup>⑤</sup>。他們都比馬克思大十几岁，已經

① 甘斯，爱德华(Gans, Eduard 約1789—1839)——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自由派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的門徒之一，曾出版黑格尔文集。也同黑格尔一样，强烈地批判过法的历史学派。——俄譯本編者

② 法的历史学派——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律科学中的一个反动学派。这一学派的創立人是德国的法学家古斯塔夫·胡果(Gustav Hugo 1764—1844)。按照法的历史学派的意見，法的渊源是习惯，所以一切规定的和已經成为习惯的法制都是合理的。国家和法的变革，只是某种“人民精神”的自我发展的結果。这一学派实际上维护德国当时存在的封建法权，“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辯护”(馬克思語，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4頁。——中譯者)，使其合法化。馬克思在柏林大学时期，听过法的历史学派的首領弗·卡·薩維尼(F. K. Savigny)的課程。——俄譯本編者

③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ss,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論家，著名的黑格尔左派分子之一。他的著作《耶穌傳》(1835年)奠定了黑格尔学派分裂为黑格尔左派和黑格尔右派的基础，批判了宗教信条，否認宗教上的奇迹。1866年以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俄譯本編者

④ 鮑威尔，布魯諾(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名的黑格尔左派(“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之一，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著有許多关于早期基督教历史的著作。1866年以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拥护俾斯麦。在馬克思属于黑格尔左派时期，同布·鮑威尔保持着友誼关系。后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唯物主义立場的时候，他們就已經在《神圣家族》(1844年)和《德意志意識形态》(1845—1846年)中，批判了布·鮑威尔和他的弟弟埃德加尔·鮑威尔(1820—1886)以及其他黑格尔左派分子的观点。——俄譯本編者

⑤ 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Koepfen, Karl Friedrich 1808—1863)——德国激进展論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曾把自己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大帝及其反对者》(1840年)献給馬克思(“献給我的朋友特利尔的卡尔·亨利希·馬克思”)。——俄譯本編者

在精神共和国取得了显著的地位，可是都以同志的态度对待这位年轻的大学生，把他看成与自己相等的人，怀着真正的情感认为斗争的舞台上出现了他这样一位无比强大的力量。布鲁诺·鲍威尔认为自己在工作和斗争中得到一位很好的同志；弗里德里希·科本也是一样，他把自己的充满战斗精神的小册子献给了特利尔的朋友。

经过顽强的抗拒斗争以后，马克思才顺服了黑格尔的哲学；然而在黑格尔哲学的无数信徒当中，谁也没有像马克思这样彻底地研究过和深刻地理解了这一哲学。关于马克思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似乎他的那种拉比式的或诡辩性的锐敏智慧，不能充分深刻地分析和解剖概念。我们不能认为这种说法是公正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强而有力地吸引他去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呢？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不过，这一辩证法的革命锋芒，恰好被模糊不清的概念的閃变幻影掩盖起来了。马克思与众不同，他埋头研究大量的历史材料以后，便把这些概念制服了。他很早就发现了使科学的皇帝同科学的苦力区别开来的特点，即无厌的求知欲和不倦的自我批评。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的朋友们就责怪他，说他彻夜工作，把钢铁一般的健康身体都搞坏了。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的孜孜不倦的勤勉精力用去琢磨没有益处的小事情。毫无疑问，他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就有时已经对自己的锐利而沉重的武器的初露锋芒而感到天真的满足，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坚毅而热情的青年来说也是应有的；但是，只有软弱无能心怀嫉妒的人，才会认为这是令人讨厌的装腔作势或涉奇猎异。

卢格<sup>①</sup>在同马克思争论的最初阶段，对于马克思作过比较正确的论断，当时卢格的眼睛就已充满了憎恨的敌意，不过还没有因

<sup>①</sup>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曾同马克思一起出版《德法年鉴》，不久以后与马克思分手。后来成为俾斯麦的拥护者。——俄译本编者

憎恨而气得失明。卢格那时写信給费尔巴哈說：“馬克思讀的书很多，工作起来非常紧张，具有时而变为退化的辯証法的高傲蛮橫之批判天才，但是他什么工作也沒有进行到底，干了一陣就突然放下，而且每次都又重新投入无边无际的书海。从他的学术爱好來說，他完全屬於德国人世界，而从他的革命的思想方式來說，則应当从德国人世界把他开除。”青年馬克思的这种形象，沒有为阿諛奉承所粉飾，但是也沒有被歪曲。馬克思把德国人的一切浮士德式的好学博覽意向都結合在自己身上，以便永久控制它們。他既把生活带进了科学，又把科学带进了生活。这是一个只有德国教育还能做出的进步，無論在任何条件下，只要德国教育不希望历史发展的发动机变成头脑昏庸的凡人的小推車，它就必須做出这一进步。由于馬克思具有革命的思想方式而把他从自己队伍中开除出去的学术界，同时也把本身从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中开除出去，本身使自己变成了为統治階級的短暫利益服务的唯命是听的奴才。

1841年，馬克思讀完大学的課程，并由于提出关于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学之間的差別的論文，而得到博士学位。这篇学术論文当然只是馬克思广泛地研究、一般地闡述伊壁鳩魯哲学、斯多葛哲学和怀疑論哲学的起点。这些希腊的自我意識哲学，是在古代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哲学发展出来的，正如現在的布魯諾·鮑威尔及其小集团的自我意識哲学，是从黑格尔的絕對观念引导出来的一样。当时，还没有进行这种广泛的研究，甚至也沒有能够发表博士論文。馬克思打算依靠这篇博士論文，在波恩以副教授的身分取得講授哲学的权利。从布魯諾·鮑威尔在波恩担任神学副教授时受到艾希霍恩<sup>①</sup>的紀律处分以后，馬克思

<sup>①</sup> 艾希霍恩，約翰·阿尔勃来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o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魯士的反动国家活动家，曾任宗教、教育和医务大臣。在他的压力下，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布·鮑威尔被迫离开波恩大学。布·鮑威尔在1841年发表的《福音书作者批判》，成了迫使他离开大学的借口。——俄譯本編者

就沒有再到普魯士的大學里去找教職。向例可以提前看到風吹草動的反動派，把這位天生的鬥士推到鬥爭中去了；同時根據馬克思的初期寫作活動，也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這一鬥爭是怎樣一步一步地推動他在認識的道路上前進的，這一鬥爭是怎樣在他的面前把事物的觀念外殼一個接着一個打碎的，這一鬥爭是怎樣日益深入地把他投到現實生活的狂風巨浪里的。

馬克思在巴黎度過的 1844 年，毫無疑問是他青年時期最有成果的一年。具有震撼世界的後果的偉大革命，使目光能夠看到這一革命的最深奧內部和把第三等級的階級鬥爭追溯到中世紀的重要歷史著作，把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到極其細微地步並且正好在這個時候開始通過卡貝<sup>①</sup>的空想作品、路易·勃朗<sup>②</sup>的社會—政治宣傳和蒲魯東<sup>③</sup>的宣言深入到工人階級的大量文獻——這一切使人得到豐富的变化不定的印象，甚至頭腦聰明的人都可能被這些印象弄得糊里糊塗，但是，却必然更要激起天才把其中漫射的新世界的一切光芒集中於一個焦點。看到這種情景，盧格在巴黎完全張惶失措了；而馬克思卻在這裡抓住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初步線索。

像內容肤淺而外表艰深的思想体系硬叫人們相信的那樣，有人硬說馬克思在新聞記者的胡思亂想發作的時候，想出了社會的經濟結構決定着它的觀念的上層建築，但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最初，他也跟一切真正的黑格爾主義者一樣，遠遠沒有達到物質利

---

① 卡貝，埃蒂耶納(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國的空想共產主義者，著有《伊加利亞旅行記》(1839年)。曾試圖在美洲實現自己的空想，在那裡建立了一個“新村”移民區。——俄譯本編者

②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國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和歷史學家，1848年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成員。站在同資產階級妥協的立場上，1848年8月流亡英國。——俄譯本編者

③ 蒲魯東，比埃爾·約瑟夫(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國的政論家、經濟學家 and 社會學家，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以及 1846年12月28日給安年柯夫和 1865年1月24日給施韋澤的信里，對於蒲魯東作了評價。——俄譯本編者

害关系的領域，但是孜孜不倦的斗争的必要性，把他推进这一領域。虽然他也同其他一切人一样，很少能够把这一斗争付诸实现，不过他比任何人都深刻地理解了斗争的意义。他没有闭上眼睛，顽固地不看这样的事实：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不能成为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可靠向导。他寻找并且找到了人类社会赖以前进的真正基础。他的“过错”大概只在这里，因为施特劳斯、卢格和鲍威尔的“功劳”，是在他们的脱离现实的道路上未曾被任何经济障碍物绊倒，并且正因为这样，他们始终没有能够认识实践世界，最后作为可怜的德意志现实的牺牲品而死去。

马克思在运用德国哲学的辩证方法方面表现的技巧，使他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在物质利害关系领域内定出方向。我们可以看到，从1842年春到1844年秋，马克思有了长足的进步。在1842年春天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完全是个思想家了，他当时全身投入了实际斗争；而在1844年秋，他对社会关系的明确理解不仅超过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且凌驾于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先进代表人物之上。当然，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他仍把经济范畴披上哲学的外衣。例如，我们从他的一个已被六十年来的历史所证实的惊人敏锐的预言上可以看到这一点。当时，他推断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资产阶级将一事无成，而无产阶级却大有作为。但是，他在用语言表达这一预言时，并没有这样直说，而以哲学的口气说：德国可能实现的只是人类解放，而不是政治解放<sup>①</sup>。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用来透视资产阶

---

① 马克思在载于《德法年鉴》的几篇论文中，对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这两个概念作了分析（参看本书第三章）。马克思把“政治国家”理解为资产阶级国家，把“政治解放”理解为资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的结果，将是消灭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而“人类解放”（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只有这种解放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解放），则已经是革命地改造资产阶级社会和消灭私有制的结果。——俄译本编者

級社会的一双受过哲学訓練的炯眼。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社会产生出发展得更高的社会以后就必然灭亡，这个新社会的因素，已經隱約地出現于資產階級社会的內部。但是，馬克思並沒有从經濟学的武器庫，而是从哲学的武器庫去取自己的證明的。

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对他做了十分重要而又有决定作用的补充。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样，也是一位天生的辯証法大师，在古典哲学方面有精湛而深厚的才华。他沒有受过馬克思那样严格的哲学教育，但是他的清醒明晰的头脑，使他牢固地抓住了黑格尔著作中的不朽的东西。从年龄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卷入实际生活的漩渦，所以生活經驗丰富的优点，弥补了他沒有系統地受过教育的缺点。

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于巴門(Barmen)市一个工厂主的家庭。“欧門—恩格斯公司”在萊茵的工业史中享有很好的名声，因为它曾坚决反对过由来已久的在工厂制品的度量衡問題上存在的舞弊行为。恩格斯家庭是巴門地方的大戶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同馬克思一样，推动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不是生活的貧困，而是高尚的智慧。因此，他同十分守旧的和虔信宗教的家庭的精神断絕了关系。早在童年时期，他就不願意步入家庭希望他走上的宦途。巴門实科中学的物理和化学的直觀教学，給恩格斯后来学习自然科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从这所規模不大的学校毕业以后，便升入爱北斐特高級中学，差一年沒有毕业，就最后决定去当商人。他最初在巴門的一家商号，后来在不来梅的另一家商号学徒。从1841年10月到1842年10月，作为一个志願入伍者，在柏林的近卫炮兵部队服役。萊茵地方出生的人，当时沒有一个人認為“王家的軍服”是荣誉的服装，所以萊茵地方的資產階級到处活动，广泛賄买官方，以使自己的儿子不服令人可恨的兵役。在庫弗尔格拉班的古老兵营里，他对軍事科学发生了极

大的兴趣，而且后来一直把这种兴趣保持下来。这个事实最能证明恩格斯对于现实生活，甚至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方面，具有实践的爱好的。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荒废了他的哲学研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同鲍威尔兄弟保持着友谊关系，有时还给《莱茵报》写稿。1842年11月底，他在赴曼彻斯特——到那里的一家他父亲同别人合办的工厂去当店员——而途经科伦的时候，于《莱茵报》的编辑部同马克思初次见面。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次会晤是相当冷淡的。当时，马克思正在著文反对柏林的“自由人”<sup>①</sup>，而恩格斯被人认为与“自由人”志同道合，并且由于同鲍威尔兄弟通信，而对马克思产生了反感。

恩格斯从1842年12月到1844年9月，共在曼彻斯特住了二十一个月。他在这里上了他的高等学校——生活在使资产阶级社会解体而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基础的大工业当中。他在这里既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又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研究了这一全世界历史过程的非人道方面和人道方面；而他的哲学修养，又使他能够认识英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无产阶级还无法理解的这两方面之间的内部联系。恩格斯既向宪章派<sup>②</sup>的机关报《北极星报》

---

① “自由人”是1842年中期由柏林的一些青年黑格尔派作家组成的小组成员的自称。这个小组的核心，由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Eduard Meyen）、路·布尔（Ludwig Buhl）、麦·施蒂纳（Max Stirner）等人构成。其中的某些人曾为《莱茵报》撰稿。恩格斯虽然看到了“自由人”的弱点，但是有一个时期曾同他们接近。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由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他们崇尚空谈，玩弄词藻，对于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看法肤浅。——俄译本编者

② 宪章派——参加宪章运动的人。宪章运动是英国的第一个规模广泛、真正具有群众性质、采取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类型的革命运动。宪章运动开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1838年，工人的一切要求都正式规定在一项名叫《人民宪章》的法案里面，由此而产生了“宪章运动”一词。很快就席卷英国全土的宪章运动，对于欧洲和美洲的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发生了很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宪章运动的左翼活动家们有过密切的联系。——俄译本编者



(“The Northorn Star”)投稿,又为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报纸《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撰文。恩格斯从当时领导“正义者同盟”<sup>①</sup>的亨·鲍威尔(Heinrich Bauer)、约·莫尔(Joseph Moll)和卡·沙佩尔(Karl Schapper)身上认识了最初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后来始终没有忘掉这些已经成熟的人给他这个还在成熟中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当时,马克思已从法国革命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奠基在国家之上,而是恰恰相反,国家建筑在资产阶级社会之上;恩格斯则从英国的工业中认识到,迄今没有在任何历史编纂学或遭到历史学家冷遇的经济事实,至少是现代世界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构成了现在的阶级对立的产生基础;在这种对立由于大工业而达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经济事实也是政党的形成基础、政党斗争的基础,从而也是整个政治史的基础。

他们二人通过不同的道路达到同一的目的。马克思主要采取的方法还是哲学的,而恩格斯已经应用了经济的方法。马克思对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作出比较一般的陈述,而恩格斯则把对于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面突出地表达出来。马克思说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sup>②</sup>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一部天才的大纲;这个论断真是最恰当不过了。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没

① “正义者同盟”——信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们的秘密革命组织,因1834年在巴黎成立的德国革命民主组织——“被唾弃者同盟”分裂,而在1836年产生于巴黎,最后在1837年正式成立。同盟的领导者是卡·沙佩尔、约·莫尔、亨·鲍威尔等人。1847年6月,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积极参加下,在“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参看本书第五章)。——俄译本编者

②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由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主编在巴黎用德文出版的杂志。只在1844年2月出了第一期双刊号。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发生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参看本书第三章)。——俄译本编者

有系統地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他對這種政治經濟學所作的審判，略有總評的性質，而且一般說來，他當時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最重要代表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只是間接知道的。然而，這位年輕而火熱的人，卻正確地斷定了資產階級政治學本質上固有的弱點；他勝利地揭露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內在謬誤，正確地指出了必然使它大量流血的創傷。恩格斯第一個描繪出科學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藍圖；他的這項功績，並沒有因為他說自己發現的東西也會被馬克思獨立地發現了而降低，因為歷史判斷所依據的標準，主要是已經存在的東西，而不是可能存在的東西。

恩格斯對於卡萊爾<sup>①</sup>的批判，雖然本質上不如批判政治經濟學那樣深刻，但是幾乎可以說更能代表恩格斯的個性。恩格斯也同馬克思一樣，把真正的詩意嗅覺跟銳敏的批判智慧結合起來了；他對英國工人和民間的詩歌的卓越翻譯，可以十分清楚地證明這一點。恩格斯雖然敬仰卡萊爾，但是他並沒有為這個神秘的預言家的迷人美酒所醉倒。恩格斯能夠理解這位孤獨人物的全部獨到的深處，但是他也看到了卡萊爾無法超越的界綫。

當1844年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第二次會晤的時候，他們在一切理論問題上已經意見完全一致。他們的戰鬥的兄弟情誼，最初在這次會晤中建立了基礎；當然，以後由於這兩個人的為人品質都達到了思想家和鬥士的高度，所以這種兄弟情誼後來更加鞏固。他們只使用最鋒利的武器同壓迫者進行鬥爭；他們意識到，只靠庸夫俗子們的憫人情感和道德沖動所引起的那種薄弱無力和毫無成果的气概，在嚴酷的階級鬥爭中是不可能獲得任何成就的。然而，並沒有因此而減少他們對於受苦受難和遭受壓迫的人們的同

<sup>①</sup> 卡萊爾，托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國的作家和宣揚英雄崇拜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曾站在反動的貴族階級立場上批判英國的資產階級。恩格斯評述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Past and Present”)一書的文章，載於1844年的《德法年鑑》。——俄譯本編者

情。在他們身上，既沒有伤感心理的痕迹，又毫無三百年來的可悲歷史為德國的庸夫俗子們所養成的那種假仁假義的、愛好幻想的、軟弱無能的和溫情主義的品質。但是，他們也不是精神憂郁的宗教狂熱病者，他們沒有裝模作樣地覺得自己十分了不起；他們的勇敢的、從而也是謙遜的自我意識，輕視資產階級的“高尚的和優秀的”正式領袖們所十分喜歡擺出的一切姿態。他們在為自己的事業服務的時候，可能有无情的表現，因為事實上必須這樣；但是在其他方面，他們絲毫不排斥人道的態度。他們都是見义勇为和寬宏大量的善人，性格堅毅，充滿永無耗竭的生活樂觀精神，能夠由衷地捧腹大笑，喜歡明朗的兒童般的嬉笑。他們對聖經里的基督，只喜歡他對兒童的熱愛。

他們首次在精神方面彼此接近以後，又暫時別離了。恩格斯前往巴門，打算在那里把自己的關於論述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著作寫完。馬克思仍留在巴黎。當時，祖國的大門已經對他关上；科布倫茨的最高行政長官，以馬克思的著作有害為理由，下令國境的一切警察機關：一見到馬克思出現在國境，就把他逮捕起來。可是不久以後，馬克思在巴黎的寄居也到了盡頭。普魯士政府以值得表揚的熱心，關懷着它的最可怕敵人使自己的寶劍不上銹。於是，像從德國把馬克思驅逐出去一樣，它又使馬克思被法國驅逐出境。一批德國流亡分子，在巴黎出版一份小報，試圖利用這份報紙在國外繼續同本國的專制暴君作戰。馬克思偶然在這家報發表的一篇文章，構成了把馬克思攆出法國的表面借口。

這份小報就是《前進報》<sup>①</sup>。它從1844年開始在巴黎出版。報

① 《前進報》（“Vorwärts!”）——德國流亡分子出版的報紙，從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發行。它的創辦人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亨利希·伯恩斯坦（1805—1892年），主編（從1844年夏開始）是德國的激進政論家斐迪南·貝爾奈斯（Ferdinand Bernays 1815—1879）。從馬克思參加這家報紙的編輯工作（從1844年中期開始）以後，報紙在馬克思的影響下開始具有共產主義的性質。——俄譯本編者

紙由作曲家迈耶贝尔 (Meyerbeer) 出資和演員亨利希·伯恩斯坦創辦,最初曾为許多方面的工作服务,有时也为創辦人的一些可疑的私事服务。作为一个販賣文艺作品的商人,同时是作为一个非常有发明天才的商人的伯恩斯坦,在《德法年鉴》停刊以后,計上心头:以为如果使自己的报纸变成德国流亡分子的最后避难所,那他也許能够作成一笔很好的生意,何况《前进报》即使全无恶意,也挽救不了它被德国人的各邦政府查禁。伯恩斯坦就这个问题同贝尔奈斯达成了協議,請贝尔奈斯担任主編。大約从 1844 年中期以后,《前进报》展开了政治斗争;当然,报纸沒有留情,痛斥了德国人的各邦政府,特别是普魯士专制政府的丑恶行徑,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贝尔奈斯沒有对德国反动派講什么客气。从此以后,海涅、海尔維格<sup>①</sup>、巴枯宁<sup>②</sup>、赫斯<sup>③</sup> 和卢格等人,由于沒有其他报纸可以发表文章,也有时給《前进报》写稿,同时文責自負,与报纸的編輯部沒有关系。

- 
- ① 海尔維格, 格奥尔格 (Herwegh Georg 1817—1875)——德国的革命詩人, 小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著有反对君主制度和貴族階級的抒情詩集《一个生活者的詩》(1841年)。1842年, 同馬克思接近, 并为《萊茵报》撰稿。同年, 他上书給普魯士国王(完全以德国的自由主义者观点), 抗議普魯士当局禁止預定在苏黎世出版的《来自瑞士的德意志通报》(海尔維格主編)进口的不合法行为。公布了这封信的萊比錫《总汇报》后来被查封(梅林在本书第二章的开始部分, 談到这个事实), 而詩人本身則被驅逐出普魯士。在 1848 年革命时期, 他实质上采取了无政府主义的立場。——俄譯本編者
- ②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 曾参加 1849 年德勒斯頓起义。1864 年参加第一国际, 同馬克思进行激烈的斗争。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 年)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俄譯本編者
- ③ 赫斯, 莫澤斯 (Hess, Moses 1812—1875)——德国的小资产階級政論家,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 曾在德国的“有教养”人士中流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們(赫斯、卡·格律恩、海·克利盖等人)否認階級斗争, 宣傳依靠“爱”来解放人类, 从而沉溺在“极可恶的詞藻和泛爱的空談中”(恩格斯語,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 1955 年莫斯科中文版, 第 365 頁。——中譯者)。——俄譯本編者

馬克思为这家报纸写稿，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不得已。卢格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数篇文章：一部分是对于普鲁士国王夫妇所作的不太高明的谈话，一部分是对于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所作的哲学—预言式隐喻。卢格写道，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社会甚至还没有对于自己的改革产生预感。在像德意志这样非政治的国家里，不可能把工厂区的局部贫困提高到一般意识，即把它看成与一切人都有关系的事情，而是将它视为具有地方性质的火灾或水患。国王认为这是行政机关办事不力或慈善事业办得不够的结果；归根到底，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基督徒之心的善良思想上面，认为这种思想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德国的穷人并不比可怜的德国人聪明些，这就是说，他们除了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工厂、自己居住的地区以外，什么都看不见。整个这一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洞察一切的政治精神接触到；然而，社会革命没有政治精神是不可能的。卢格的这些文章，也同他的其余文章一样，是用笔名“普鲁士人”发表的，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出于马克思的手笔。马克思也确实是普鲁士的臣民，而卢格自从迁居到德勒斯顿以后，便不再是普鲁士人了。他向法国当局声明自己是萨克森人，并受到萨克森政府驻巴黎大使馆的保护。

卢格的这种丑恶的写作活动，激起了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当然，这不是批评卢格对于普鲁士国王夫妇所作的谈话，而是批判他对于普鲁士的社会改革所持的哲学幻觉。马克思指出说，不仅非政治的普鲁士，就是赤贫现象更具有普遍性质的政治的英国，都没有能够把社会的贫困理解为“与一切人都有关系的事情”。英国的有关济贫的法令，指出赤贫现象的产生原因在于：第一，由于自然规律；第二，由于行政机关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第三，由于工人的意志不好。因此，最后在英国想出了设立习艺所的办法——这是把慈

善同对求助于资产阶级的慈善的不幸贫民进行的报复巧妙地结合起来的手段。由此可见，英国也同作为“政治动力、政治势力和政治理智的顶点”<sup>①</sup>的国民公会当时未曾预感到自己的改革一样，仍然没有达到“关于自己改革的预感”。正同英国从穷人的意志不好中寻找赤贫的原因，而普鲁士国王则从富人的非基督教情感中寻找这种原因一样，国民公会也从私有者的反革命的思想方式中去寻找赤贫的原因。为了消灭赤贫，国民公会砍掉了私有者的脑袋，正像英国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惩罚穷人，而普鲁士国王为此规劝富人一样。

接着，马克思引出他早在《德法年鉴》中发挥过的思想，即认为国家不管具有什么形式，都不能消灭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家正是建筑在这个矛盾之上的。“因为这种分散性、这种卑鄙齷齪的行为、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是现代国家借以存在的天然基础，正如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是古代国家借以存在的天然基础一样。国家的存在和奴隶制的存在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古代国家和古代奴隶制这两种赤裸裸的典型的对立之间的联系也并不比现代国家和现代商业世界这两种经过伪装的基督教的对立之间的联系来得更紧密些。现代国家要消灭自己的行政机关的无能，就必须消灭现在的私人生活。而要消灭私人生活，国家就必须消灭自己……”<sup>②</sup> 一个国家越是强盛，从而它的政治性越强，那末，它就越不想从国家的原理本身中，也就是越不想从现存的社会结构（它的行动的、意识的和正式的表现，就是国家）中寻找社会罪恶的原因，越不想理解社会的一般原理。政治理智之所以为政治理智，就是因为它是在政治范围以内思索的。政治理智越敏锐，越活跃，它就越没有能力去理解社会疾苦。典型的政治理智时代，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79—480页。

就是法国革命。法国革命的英雄們，根本沒有从国家的原理中去寻找社会缺陷的根源，相反地，他們却認為社会缺陷是政治混乱的原因。

馬克思反駁卢格对于德国工人所作的輕視性評語。他說，卢格要求德国工人进行的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要末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廢話（如果把“社会”革命理解为同政治革命对立的革命，可是却赋予它以政治精神）；要末就不过是通常所說的“政治革命”或“革命”的同义語。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也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也具有政治性。“可是，如果說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不是同义語就是廢話，那末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却是合理的思想。一般的革命——推翻現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實現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組織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棄了政治的外壳。”<sup>①</sup>最后，馬克思劝告“普魯士人”暂时放弃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的写作，以及关于德国状况的高談闊論，而开始誠懇地把自己的情况檢查一番。

显而易见，卢格过于自負，不会接受忠告。他无力反駁馬克思用来批判地分析他的曖昧論断的敏銳的辯証法，而說自己的論敵是身上藏着一條毒虫的发生腐蝕作用的詭辯分子，并用波美拉尼亞人所有的全套粗魯蠻橫对付《前进报》。

伯恩斯坦的算盘确实打对了。由于一些撰稿人暂时只能利用《前进报》作为他們反对言論自由的压迫者的武器，报纸便暢銷起来；尽管禁令重重，仍旧日益在德国境内傳播。当时，柏林的“合法”国王向巴黎的“非法”国王——資产者告援，声泪俱下地哀求給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8—489頁。

予善邻的警察性服务。法国的基佐<sup>①</sup> 尽管思想十分反动，但还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他显然没有立即根据这个疼得哭出声来的哀求照办。此外，事实上也确实有一定的困难，比如，不可能叫法国的陪审法庭对被诬侮辱或确实侮辱普鲁士国王的人作出有罪的判决，而警察机关的矫正法庭以破坏法国的出版法为名对报纸的编辑贝尔奈斯判处几个月监禁，还远远不等于强制《前进报》停刊。后来，只是通过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不光彩干涉，才说服了基佐。于是，在1845年1月中旬，基佐向《前进报》的撰稿人——将近十名的德国作家发出命令，限制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并尽快由法国出境。

但是，心情冷酷得起初使基佐都感到吃惊的安琪儿，显然产生了正确的预感。法兰西的文明对于德意志的野蛮表示了愤恨；它珍视民族的好客美德，而瞧不起那种引起柏林大吵大嚷的问心有愧的担忧。有一家独立自主的刊物，愤怒地抗议基佐政府，指责它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另一方面，伯恩斯坦深深地坚信，泥罐碰上铁罐的时候，应当自己知道后退。世界上不是没有善人的：伯恩斯坦自愿地不再继续出版《前进报》，而法国政府为此收回了驱逐他出境的成命。伯恩斯坦使自己的同人受到了牺牲，不过其中也有几个人幸免。例如，经过长期的登门哀求和屡次请愿，卢格得到继续留在巴黎的许可，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以后他要规规矩矩，自加检点。

被普鲁士政府首先盯住的马克思，当然不能采取这类办法。他迁移到布鲁塞尔，在这里寄居了三年，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同恩格斯在一起工作的。可以说在这个期间，他们的治学和漂泊生活进入了后半期。

<sup>①</sup>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Guizot, François Pierre 1787—1874）——法国的著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反动的政治家，曾任法国的外交部长（1840—1847年）和总理（1847—1848年）。——俄译本编者



## 第二章

### 《萊茵報》

在一些重要的日報當中，只有三家報紙對於普魯士的居民多少起着強有力的影響。其中之一，是遠銷普魯士境外的《萊比錫總匯報》。一些不滿意普魯士官僚政治的人士，暗地里資助這家報紙，可是在它發表了海爾維格的信件以後，馬上就被普魯士政府查封了。在普魯士國家境內，《科尼斯堡日報》和《萊茵報》以正直而勇敢的語言報道。想入非非的陛下，最喜歡用他那近衛軍中尉的特殊語言，把這兩家報紙稱為“科尼斯堡的娼婦和她的萊茵淫妹”。《科尼斯堡日報》站在約翰·雅科比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立場上，由一位年老的教師維特主編。維特由於主編這份報紙，曾不得不受宗教、教育和醫務大臣艾希霍恩的刁難調查。年輕的瓦列斯羅德<sup>①</sup>，在這份報紙上同其他撰稿人一起，因自己的筆鋒尖銳而得到好評。但是，這家報紙却落后於從1842年1月1日開始在科倫出版的《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萊茵報》的全稱。——中譯者），特別是在眼界的廣度方面。

根據《萊茵報》創刊號登載的聲明，它是由一伙獨立的萊茵省居民創辦的；這些人傾向進步，力求萊茵省發達，竭力發展萊茵省的各种設施，極欲使萊茵省同整個德意志的利益結合起來，總之，

---

<sup>①</sup> 瓦列斯羅德，路德維希·賴因霍爾德（Walesrode, Ludwig Reinhold 1810—1889）——筆名艾米爾·瓦格納（Emil Wagner），德國的民主主義者、政論家和批評家。——俄譯本編者

希望人类社会的内部繁荣。正如读者看到的，这项声明并不十分清晰；同样地，后来该报以政纲形式发表的东西，即实行包括一切阶级和代表各方面利益的普遍选举法，公布政府的施政结果，要求出版自由等等，也没有按照已经定形的政党的惯例，分章分节地一目了然列出。《莱茵报》联合着成分不同的各种人士，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把他们结合起来，但是还不知道什么东西能使他们分离。在莱茵省资产阶级的两个年长领袖的后面，即在大卫·汉泽曼和科伦商会会长路道夫·康普豪森<sup>①</sup>这两个头脑清醒和谨慎持重的商人的后面，是在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莱茵报》对于工商业问题，比政治问题了解得更为清楚：它要求精确而详细地公布关于国家经济的报告，减少国家的支出，发展铁路，降低诉讼费用和邮费，为参加“关税同盟”<sup>②</sup>的各邦规定共同的国旗和派遣共同的驻外领事。

这种情况使《莱茵报》比易北河以东普鲁士的反对派报刊占了很大的优势。在言论的勇敢和思想的明确方面，它至少不比《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sup>③</sup>逊色，而在了解推动德国生活前进的工业发展

---

① 大资本家大卫·汉泽曼 (David Hansemann 1790—1864) 和银行家路道夫·康普豪森 (Ludolph Camphausen 1803—1890)——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1848年时，他们在政府中占居着首要地位(前者最初任财政大臣，后来为普鲁士政府的首脑；后者曾任普鲁士首相)，奉行同容克地主反动派妥协的贩卖政策。——俄译本编者

② 关税同盟——是德意志的各邦政府建立共同关税国界以后，在1834年结成的同盟。普鲁士政府在同盟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个同盟几乎联合了德意志的所有各邦，包括的人口在2,400万左右，后来对于德意志的政治统一起了促进作用。——俄译本编者

③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1841年6月至1843年1月在莱比锡出版；从1838年到1841年，曾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e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在哈雷出版。——俄译本编者

方面，則远远超过东普魯士的反对派报刊和《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它曾坚决地支持关税同盟，而且为此表现的坚定精神决不亚于雪恩<sup>①</sup>在反对关税同盟时所表现的顽强态度。这家报纸评论说，普魯士国家在德意志的领导权，是建立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的。如果这个国家继经济进步之后，能为精神进步和政治进步开辟道路，那末，报纸愿意在这个国家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克·梅特涅 (Clemens Metternich) 的一些御用文人，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以憎恨者固有的洞察能力，揭露了《莱茵报》的亲普魯士倾向；但是普魯士的国家活动家们，却在私下互相耳语，说《莱茵报》依靠法国政府出钱维持。柏林政府的眼光过于狭小，没有理解《莱茵报》想把一个十分强大的武器交给它掌握。《莱茵报》越坚决地想把它抬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高度，它就越顽固地死守自己的专制—封建落后状态。这种冲突一天比一天尖锐化了，而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莱茵报》的主要领导职位就越到后来越被激进分子所占据。

这些人是当时的一伙精明强干的人士。在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中，有布鲁诺·鲍威尔、科本、瑙威尔克、施蒂纳<sup>②</sup>等人，为《莱茵报》写稿；报纸德文部的第一任编辑鲁滕堡，也出生于柏林。在《莱茵报》编辑部工作的莱茵省当地人，有亨利希·毕尔格尔斯<sup>③</sup>、格

---

① 雪恩，亨利希·泰奥多尔 (Schön, Heinrich Theodor 1773—1856)——普魯士的国家活动家，曾经参与实行旨在巩固普魯士国家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俄译本编者

② 德国的政论家卡尔·瑙威尔克 (Karl Nauwerk 1810—1891)——曾参加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人”小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麦克斯·施蒂纳 (Max Stirner 1806—1856)——卡斯巴尔·施米特 (Kaspar Schmidt) 的笔名，也曾参加“自由人”小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作过批判。——俄译本编者

③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 (Bu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的激进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 (1847—1852年)，后来成为自由党人。——俄译本编者

奥尔格·荣克<sup>①</sup>、莫泽斯·赫斯、海尔曼·皮羽特曼<sup>②</sup>和卡尔·马克思。《莱茵报》不按期发表社论，还没有被按照竞争制度组织的企业清规戒律所限制。

因此，副刊里登载的技术和科学论文较多，而小品文栏里的材料也比较有趣，其中发表关于美学、文艺和哲学问题的研究，以及优美的诗篇。海尔维格和普鲁茨<sup>③</sup>经常为这一栏写稿。但是不久以后，《莱茵报》的最年轻撰稿人出了名，成为报纸的优秀力量。即使现在你把积满灰尘的《莱茵报》合订本打开，也不难在大量的优秀作品当中发现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的这些杰作的特点是：构思广泛而深刻；文笔有力而漂亮；辩证的论据具有尖锐的对立性质；思想敏锐，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总是深入到德国生活的混乱嘈杂方面，一直把问题的实质搞清楚为止。1842年秋，马克思担任报纸的编辑，整整作了一个冬季，只是在报纸停刊前不久才离开了。

马克思的最初几篇文章，是讨论出版自由问题的。他在卢格编辑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sup>④</sup>里，发表了自己的关于

① 荣克，格奥尔格(Jung, Georg 1814—1886)——德国的政论家和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莱茵报》的创办人之一。1848年时是民主主义者，后来变成民族自由党人。——俄译本编者

② 皮羽特曼，海爾曼(Püttmann, Hermann 1811—1894)——德国的激进诗人，生于爱北斐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创办过一系列具有这种倾向的杂志。——俄译本编者

③ 普鲁茨，罗伯特·爱德华(Prutz, Robert Eduard 1816—1872)——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的政治抒情诗人，后来成为文学史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曾同青年黑格尔派有过联系。——俄译本编者

④ 马克思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里，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由此开始他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在卢格于瑞士出版的两卷本《轶文集》(1843年)里，除了马克思的两篇文章以外，还载有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弗·科本和阿·卢格等人的文章。——俄译本编者

評述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的文章，文內要求完全廢除書報檢查制度。馬克思說道，檢查令本身是不好的，而檢查令却比人還要威風。馬克思挖苦虛偽的自由主義的作法，譏笑自由主義能夠對不中用的檢查令被主管這種法令的人員所代替感到自慰。他逐條分析新檢查令，以揭露其中在想入非非的曖昧詞藻下隱藏的邏輯荒謬。也同舊書報檢查法令一樣，新檢查令中有一條規定：探討書報中的真理，應以嚴肅和謙遜為特徵。馬克思對此反駁說：“你們贊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却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我是一個幽默家，可是法律卻命令我用嚴肅的筆調。我是一個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卻指定我用謙遜的風格。沒有色彩就是這種自由唯一許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着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着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着什麼事物，卻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歡樂、光明，但你們却要使陰暗成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現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卻沒有一枝黑色的花朵。”<sup>①</sup>

但是，新檢查令畢竟與舊檢查令有所不同，那就是新檢查令指示檢查人員嚴密地注意書報的傾向是否善良。馬克思對此辛辣嘲笑地寫道：“這樣一來，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義的犧牲品，遭到了懷疑的制裁。反對傾向的法律，即沒有規定客觀標準的法律，乃是恐怖主義的法律；在羅伯斯比爾時期，國家在萬不得已時所制定的法律就是這樣的法律，在羅馬各王朝時期，國家在腐敗不堪的情況下所制定的法律也是這樣的法律。凡是不以行為本身而以當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頁。

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所想的，不管我的行为如何。所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威胁着我的生存的一种阴险的陷阱。

我可以任意翻轉打滾，事态决不会因此而有一丝毫改变。我的生存遭到了怀疑，我的最隐秘的本質，即我的个体性被看成是一种坏的东西，而且由于这种意見我要受到惩罚。法律惩罚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坏事，而是因为我沒有做坏事。其实我受罰的原因是我的行为并不違法，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就迫使好心腸的法官只去审查我那非常慎重、不至于使自己在行动中暴露出来的恶劣的思想方式。

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頒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sup>①</sup>

馬克思接着說道，追究倾向的法律，是由那些把自己同人民在原則上对立起来，从而認為自己的反国家的思想方式是普遍的和标准的思想方式的国家发明出来的。統治集团的齷齪的良心，捏造出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把它們作为报复的法律，用来惩办实际上只是政府官員才持有的思想方式。“追究原則的法律是以无原則……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齷齪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怎样才能使这种法律付诸实施呢？这要通过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令人痛恨的工具——偵探，或者通过認為所有写作倾向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一种事先协定……在追究倾向的法律中，立法的形式是和內容相矛盾的，頒布这一法律的政府瘋狂地反对它本身所体现的东西，即反对那种反国家的思想方式，同样，在每一种特殊的場合下，政府对自己的法律來說就好像是一个顛倒过来的世界，因为它采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7頁。

用了两面的手法。对一方是合法的东西，对另一方就是违法的东西。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这些法律使之成为法律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立面。……

又如，检查令想要保存宗教，同时又破坏了所有宗教的最普通的基本原则——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检查令宣布，心的法官是检查官而不是神。又如，检查令禁止使用侮辱个人的词句和进行毁坏其名誉的判断，可是它又使你们每天都遭到检查官的侮辱和毁坏你们名誉的判断。又如，检查令想要消灭来自居心叵测和听信坏话的人物方面的流言蜚语，同时又迫使检查官相信这种流言蜚语，要他们依赖上述这些人所进行的偵探活动……”<sup>①</sup>

“新的检查令也陷入了这种辩证法。当它责成检查官去做那些它在指摘出版物时会斥为反国家行为的事情时，它就陷入了矛盾。”<sup>②</sup>在这篇文章中，狮子首次扬起巨掌鞭打没有法制和专横跋扈的行为，它的毁灭性打击也像五十年前击中书报检查法一样，准确地摧毁着今日的对工人阶级的强制法令。

马克思以类似的批判 1841 年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文章，开始在《莱茵报》上发表言论。科伦地方向莱茵省议会送去一份由一千多人签名的请愿书，请求省议会把请愿书直接呈给国王。请愿书中要求准许公众自由列席省议会旁听，每天扼要地公布辩论的经过，报纸也要有权像讨论国内一切大事一样自由地、语气和露地讨论这些辩论，以及用出版法代替检查令。省议会在转呈请愿书时，对这些要求附上了很多修正意见。比如，省议会请求国王准许在省议会的会议记录里注明发言人的姓名，其次它并没有请求颁布出版法，也没有请求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而只是请求颁布据说可以防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8—19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18 页。

止檢查官專橫跋扈的書報檢查法規。這兩項請求都被國王駁回了。

馬克思對此寫了六篇長文，激烈地反對省議會的這種作法。有一個發言人聲稱，等級可以根據情況或自己的裁奪公布本等級代表的發言。馬克思對於這種說法，以冷淡的輕漠口氣反駁說：“我們可以使他（指發言人——俄譯本編者）相信，省決不會對等級代表這些個別人物的‘言論’發生興趣，然而正是‘這些’言論代表們可以公正地叫做‘自己的’言論。與此相反，省的要求是把等級代表的言論變為公眾的、到處可以聽見的全省的聲音。”<sup>①</sup>馬克思在這裡已在抨擊後來得名為議會呆小病的流弊。“這裡談的是省是否應當了解自己的代表機關！還需要在政府這一秘密上面再蒙上一層新的秘密——代表機關這一秘密嗎？然而，在政府中人民就是這樣被代表的。如果等級會議這一新的人民代表機關的特征不是省本身在這裡起作用而是別人代替省起作用，不是省代表它自己而是別人越俎代庖；那末這種代表機關就會喪失一切意義。脫離被代表人的意識的代表機關，就不成其為代表機關。不了解的事情，就不必為它擔憂。主要用來表現各省獨立活動的這一國家職能，甚至完全被排斥於各省形式上的協作即互通聲氣的範圍之外，——這是一個極其荒謬的矛盾；其荒謬之處在於，我的獨立活動包藏在我所不知道的別人的活動中。”<sup>②</sup>

馬克思同樣毫不留情地批駁了省議會關於出版自由的辯論。諸侯等級和貴族等級的代表害怕出版自由發生敗壞道德的作用。馬克思反駁這種意見說，情況恰恰相反，經過檢查的出版物才起敗壞道德的作用。一個最大的罪惡，即偽善，是同這種出版物分不開的；從它的這一根本罪惡中，又派生出它的其餘一切毫無德行可言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頁。

② 同上書，第54—55頁。



的缺陷，派生出它的最丑恶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这样）劣点，即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騙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騙。至于人民本身，他們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sup>①</sup>但是，馬克思也不滿意城市等級的人士对于出版自由发表的意見。馬克思对于希望出版自由不被排斥在一般的行业自由之外的要求，辛辣諷刺地指出說：“这里出现在我們面前的是資产者反对派，而不是市民反对派。”<sup>②</sup>当然，他不打算否認这种意見的相对正确性。“無論辯論人的观点乍一看来是多么独特，我們仍然应当无条件地承認，这种观点比德国自由主义派那种内容空洞、含糊其詞、模稜两可的議論来得高明，这些自由主义者以为，把自由从现实的坚实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这些流于幻想的空談家、这些伤感的热心家把他們的理想同日常的现实的任何接触都看成是褻瀆神明。对我們德国人說来，自由之所以直到現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願望，一部分責任是要由他們来負的。”<sup>③</sup>德国人一般易于感情冲动，过于激奋，他們有一种爱听藍色天空音乐的癖好。德国人生来就特別忠誠和恭順。他們由于过分地敬重思想，而就不去实现这些思想。但是，不管上述的出版自由观点怎样相对地正确，它毕竟是虛伪的。“作家当然必須掙錢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應該为了掙錢而生活，写作……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sup>④</sup>——这个論題的严正真实性，从那时起已为資产階級出版的六十年的……不自由所証实。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頁。

② 同上书，第80頁。

③ 同上书，第83—84頁。

④ 同上书，第87頁。

除了少数代表、特别是农民等级的代表以外，参加莱茵省议会讨论出版自由和公布省议会会议报告的其他发言人，给马克思留下了一种阴郁不快的印象，感到这些代表经常动摇在特权阶级的蓄意固执和犹豫不决的自由主义的天生无能之间。“这些老各们想给自由吹嘘一番，说它不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的自然礼物，而是吉祥的星星所赋与的超自然礼物。既然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个别人物和个别等级的个体属性，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逻辑地构成的体系’的幻想。为了拯救特权的特殊自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sup>①</sup> 马克思不接受那种只想以多数形式存在的自由；他同伏尔泰(F. M. Voltaire)一样，把以多数形式存在的“自由”叫做一般的奴隶状态的例外。特别种类的自由，是自由的一般原则产生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说，在行业自由中，行业的本性要采取符合于它的生命的内在原则的形式；在审判自由中，法院要遵循它自己固有的法规。“在宇宙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行星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太阳运转，同样，在自由的系统中各界也是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自由这一太阳中心运转。”<sup>②</sup>

在这几篇论文中，马克思仍然完全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的观点出发。诚然，他已经是一个极想从虚幻世界眺望现实世界的激进黑格尔主义者，但毕竟还是一个从纯粹的观念前提引导结论的黑格尔主义者。在这方面，马克思对于《科伦日报》进行的具有歼灭作用的论战的结束语，也有代表的意义。《科伦日报》的编辑卡·亨·海尔梅斯(Karl Heinrich Hermes)被政府收买，向警察当局和书报检查机关告密，说青年黑格尔派是不学无术的空想家，而他们的政论活动则是轻浮的自负心理的令人讨厌的表现。马克思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页。

② 同上书，第86页。

這場論戰中所作的結束語如下：“從前的國家法的哲學家是根據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際，或者甚至是根據理性，但並不是公共的而是個人的理性來看國家的。最新哲學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觀點，它是根據整體的思想而構成自己對國家的看法。它認為國家是一個龐大的機構，在這個機構里，必須實現法律的、倫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時，個別公民服從國家的法律也就是服從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類理性的自然規律。”<sup>①</sup> 馬克思也從這種觀點出發，對於法的历史學派進行了同樣尖銳的卓越的批判。他在摘錄胡果的自然法教科書時指出，法的历史學派的方法力圖證明的，不是存在的事物的合乎理性，而是存在的事物的不合乎理性。法的历史學派曲解自己的先生康德，認為我們不能認識真實的事物，所以在邏輯上我們就應當承認不真實的事物（只要它是存在的）是某種確實的事物。法的历史學派自鳴得意地從各方面搬出論據，以證明下面的事實是顯而易見的，即理性的必然性並不能鼓舞各種實證的制度，比如所有制、國家制度、婚姻；這些制度甚至是同理性矛盾的，至多也不過容許在擁護自己或者反對自己的問題上空發議論。在馬克思的關於把出版法同書報檢查法對立起來的言論中，也相當明顯地反映着他的觀念性觀點。“在出版法中，自由是懲罰者。在檢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懲罰者。檢查法是對自由表示懷疑的法律。出版法却是自由對自己投的信任票。出版法懲罰的是濫用自由。檢查法卻把自由看成一種濫用而加以懲罰……檢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

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應當認為沒有關於出版的立法就是從法律自由領域中取消出版自由，因為法律上所承認的自由在一個國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sup>②</sup>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9頁。

② 同上書，第71頁。

在条文沒有现实性的关于出版的立法和年輕的馬克思为这种立法編制的哲学星卜表之間究竟有什么差別呢!

但是不久以后，据他自己說，他就在“坚实的土地”上落实下来，并通过認真地分析經濟事实，認識了唯心主义的社会观和国家观的缺陷。他在另一組由五篇长文构成的評述中，批判了萊茵省議會关于林木盜窃法的辯論。他在这里也要求从政治上，即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倫理联系起来解决每一項实际任务。他把在討論关于林木盜窃法时只考虑薪材和林木的作法，也就是使意識盲目地服从物質的作法，叫做“下流的唯物主义”，“違反人民和人类神圣精神的罪恶”，“不道德、不合理和冷酷无情的抽象”<sup>①</sup>。但是，正如他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辯論中看到了資产者和市民之間的差別一样，他在关于林木盜窃的辯論中发现了資产者和无产者之間的差別。对于他这样明察秋毫的人來說，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資产阶级的进攻时代，竭尽全力想把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最后几条根系拔掉，并发动反对人民群众的殘酷战争，以便把他們剝夺得淨光。在普魯士 1836 年审理的 207,478 件刑事案件中，約有 15 万件，即將近四分之三的案件，是属于盜窃林木和違反关于森林、狩猎与牧場的立法的罪行的。

剝夺人民群众的方法之一，就是宣布拾檢枯树为盜窃林木。馬克思对此說道，甚至十六世紀的刑律<sup>②</sup>也沒有敢于这样。“……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做違反森林条例的行为称为盜窃林木，那末法律就是撒謊，而穷人就会成为法定謊言的牺牲品了。”<sup>③</sup>馬克思援引了沙·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的下述名言：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80 頁。

② 馬克思指的是 1532 年在累根斯堡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的查理五世刑律，即《加洛林納法典》(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这部刑律的特点，是其中規定的懲罰极其殘酷。——中譯者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39 頁。

有两种坏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变坏；后一种祸害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祸害。“但是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唯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他们把这种东西当作真正的哲人之石，以便把一切肮脏的欲求点成法之纯金。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sup>①</sup> 马克思又向前迈进一步，提出习惯权利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沒有财产的最底下的群众的权利的论点。

他的证明很简单。特权等级已经发现法律承认它们的合理权利和甚至不合理要求。他们奢望非法享用的权利，把这种权利看成用来满足自己的贪欲的私有权。“然而，贵族的这些习惯权利是和合理的权利概念相抵触的习惯，而贫民的习惯权利则是同现存权利的习惯相抵触的权利。贫民习惯权利的内容并不反对法律形式，它反对的倒是自己本身的不定形。法律形式并不同这一内容相抵触，而只是这一内容还没有具备这种形式。”<sup>②</sup> 马克思认为贫民的任何习惯权利的基础都是某种所有权的不固定性。由于这种不固定性，而在我们于中世纪的一切法规里见到的那种私权和公权的混合物中，既不承认所有权是绝对私人的，又不承认它是绝对公共的。理智取消了两重的和不稳定的所有权形式，而把从罗马法中借用来的抽象私权范畴应用于这种形式。“由此可见，在贫民阶级的这些习惯中存在着本能的权利感，这些习惯的根源是肯定的和合法的，而习惯权利的形式在这里更是自然的，因为贫民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1—142页。

② 同上书，第144页。

还没有在被有意地划分了的国家里找到应有的地位。”<sup>①</sup>

馬克思从萊茵省議会的辯論中引用一个实例，詳尽地說明了自己的观点。一位城市代表发言反对把采集林中的越橘和浆果也当作盗窃惩办的决定。他指出說，穷人家的孩子們采集这种野果，是想帮助可怜的父母挣几个零錢；这是从古至今就为林木的占有者所許可的，所以也就产生了孩童們的習慣权利。另一位代表起来反对，說在他的地区，这些野果已經成为交易品，并被成桶地运往荷兰。馬克思用以下几句尖刻的話粉碎这一論据：“的确，有一个地方已經把穷人的習慣权利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你們看，这就充分証明公共财产是可以独占的，从这里自然就得出結論說，公共财产是應該被独占的。事物的本質要求独占，因为私有制的利益想出了这种独占。某些貪婪的現代生意人想出的主意，只要能使枯枝給古代条頓人土地占有者带来利益，就不会引起任何异議。”<sup>②</sup> 馬克思最后承認說，他以厌恶的心情注視了这些枯燥无味的和卑鄙庸俗的辯論，但是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引用这个例子來說明，如果私人利益的等級代表一旦真被召来立法的話，对他們能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呢。

評論林木盜窃法的文章，引起馬克思去研究无产階級在資产階級社会中的作用的問題。但是，《萊茵报》对于經濟問題的重視，遇到了它的青年黑格尔派撰稿人在意識形态的自滿方面表現的妨碍。既然国家应当是公共性的，那就应当使国家統一，使它不被分裂。在国家的“公共性”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的試图究竟被什么东西打碎了呢？答案是明确的，而且实际上早就有了答案，即自由被貧困破坏，而貧困又使社会上的极大多数人失去自由發揮自己力量的可能性。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7頁。

<sup>②</sup> 同上书，第147—148頁。

在《萊茵報》的駐瑞士通信記者中，奧古斯特·貝克爾和塞巴斯提安·載勒爾<sup>①</sup>是威廉·魏特林<sup>②</sup>的朋友。1842年9月底，《萊茵報》本身引用了魏特林的《年輕一代》（“Die junge Generation”）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政府形式說道，應當選入政府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才能，——這也就是《萊茵報》不想在天才和獨創精神方面退步的思想。第二天，《萊茵報》轉載了《年輕一代》雜誌的一位臨時記者的關於評論“柏林家庭住宅”的通訊，認為這個報道“對於了解目前這個重要問題並不是沒有意義的”。這篇通訊把漢堡門附近的幾所工人住宅描寫成“六所工廠式的鼠洞，用泥土和木頭架成，每所高四十英尺，長約九十英尺，牆上塗着藍色和白色”，也就是描寫成實際上存在的極其悲慘的貧民窟。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萊茵報》也發出了響應法國社會主義的微弱回聲。報紙派遣自己的記者（大概是莫澤斯·赫斯），到斯特拉斯堡的學者會議去採訪。有許多德國學者和法國學者出席了這次會議。在像韋爾凱爾<sup>③</sup>這樣歡迎法國革命，認為它是自然法<sup>④</sup>

① 貝克爾，奧古斯特（Becker, August 1814—1871）——德國政論家，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在瑞士的魏特林派領導人之一；載勒爾，塞巴斯提安（Seiler, Sebastian）——德國政論家，“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曾參加德國1848年革命。——俄譯本編者

② 魏特林，威廉（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國的革命家，空想的“平均共產主義”的理論家之一，著有《和諧與自由的保證》一書（1842年），馬克思稱這本書是“德國工人的……光輝燦爛的處女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3頁。——中譯者）。在瑞士出版《年輕一代》月刊。——俄譯本編者

③ 韋爾凱爾，卡爾·泰奧多爾（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國的法律家和自由主義政論家；發表言論要求出版自由；1848年是法蘭克福國民會議的議員。——俄譯本編者

④ 自然法——是關於似乎來自人的理性和本性而與國家沒有關係的法權的概念。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格勞修斯、愛爾維修等人），曾利用自然法的思想反對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礎和法律基礎。——俄譯本編者

的始祖的德国自由主义者的身旁，坐着孔西得朗和勒魯<sup>①</sup>这样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會議的政治經濟学小組，討論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体系。《萊茵报》的記者就這項討論发表短評，認為中层等級現在所处的地位同 1789 年时貴族的地位相似，当时第三等級曾經覬覦貴族的特权，并且得到了这种特权，而現在的一无所有的等級，則要求占有目前当权的中等階級的一部分財產。但是，現在的中层等級比 1789 年的貴族階級更有遠見，所以問題大概会通过和平方法解决。

发表这則短評和轉載关于报道柏林家庭住宅的文章，使奧格斯堡《总汇报》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借口，以此攻击《萊茵报》，說它进行共产主义宣傳。剛剛担任報紙主編的馬克思，在 1842 年 10 月 16 日，对《总汇报》的攻击作了强而有力的回击。奧格斯堡《总汇报》的一位駐巴黎記者，“談論历史像糖果商談論植物学一样”<sup>②</sup>，竟然异想天开，認為君主政体应当竭力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馬克思嘲笑“奧格斯堡长舌妇”<sup>③</sup>，并且問道：“也許她是因为我們既沒有及时开出一个驗方，也沒有悄悄塞給惊愕的讀者一个十分清楚然而却毫不解决問題的方案才指摘我們的吧？我們沒有本事用一句空話来解决那些正由两个民族在解决的問題。”<sup>④</sup>但是，馬克思反駁不公正的攻击的同时，还以无法掩盖的严厉态度，反对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善良意向而对这类問題仓促作出决定的行为。他以自己特有的誠懇老实态度，承認自己还没有

---

① 孔西得朗，維克多 (Considérant, Victor 1808—1893)——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信徒和追隨者。勒魯，比埃尔 (Leroux, Pierre 1797—1871)——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拥护圣西門的观点，后来成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俄譯本編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31 頁。

③ 同上书，第 130 頁；指奧格斯堡《总汇报》。——中譯者

④ 同上书，第 132 頁。



对法国的社会主义作出独立的判断，而不过用下述几句话发展了自己的纲领：“《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然而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智慧和的作品，则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像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长舌妇希望得到比沙龙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比沙龙空话能有更多的才能的话，那她也会承认的。……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末，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sup>①</sup>

马克思是注定不能在《莱茵报》实现自己的计划的。马克思进入编辑部之后，报纸就采取了鲜明的反对派方针，同时以自己的灵活战术使检查机关大伤脑筋，以致中央特派员冯·格尔拉赫（von Gerlach）在十一月中旬，就向报纸的发行人表示了“政府对于报纸的方针的最坚决不满”。当局只希望报纸“回到比较令人满意的道路上来”，并没有采取查封的措施，而只是把鲁滕堡驱出了科伦。为了使报纸早日改邪归正，当局罢免了报纸的检查官警察局员多列萨尔。其实，多列萨尔是一个最好的书报检查人员，有一次他从《科伦日报》上删去关于未来的萨克森王斐拉雷特翻译但丁的《神曲》的声明，因为任何人都不得把神的东西变成戏曲。任命陪审法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3—134页。

官維特豪茲代替了他的职位，新檢查官的責任是以更为巧妙的方法来窒息輿論，但是他不会或者不想把劊子手的职务执行得使柏林的有产者政权滿意。

不久以后，事态发展到引起新的冲突的地步。《萊茵报》从別恩堡和摩塞尔的其他地方，收到关于摩塞尔地方农民的悲惨处境的可靠报告。摩塞尔河沿岸地区位于特利尔和科布倫茨之間，夹在埃斐尔高原和洪茲律克山当中，十分貧困。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农民不像萊茵普法尔茨地方的农民那样，用一小块土地去种粮食或栽烟草；他們的全部土地都用于栽培葡萄，所以一遇到葡萄歉收，他們就毫无办法，走投无路。然而，从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叶到三十年代中叶，葡萄連年歉收，而且后来又成立了“关税同盟”，同盟規定的低微稅率促使法国的葡萄酒大量进口，从而給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葡萄酒造成了銷售困难，使这里的葡萄酒跌价。摩塞尔地方农民的其他訴怨，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乡鎮管理机构的資本主义的独断孤行，因为它剝夺了他們使用公社的土地、森林和牧場的权利；反对葡萄汁的稅負过重和稅率不均；反对高利貸對他們的殘酷盘剝。他們的很少一点土地，一块一块地被拍賣出去，因为他們无力繼續支付稅款和利息。这些可怜到极点的居民的貧困，已經明显得連普魯士的专制政府都沒有勇气否認，不过它只是在附帶一切善于詭辯和毫无能力的官僚政府在不得不解决实际问题时慣用的“如果”和“但是”的条件下才承認的。专制制度的最后手段，照例是揮动大棒，用大棒的打击来奖励对它沒有用处的人，因为这些人想要从它身上得到的东西，要比它能够給予的为多。

发表在《萊茵报》上的摩塞尔通訊，是問心无愧和据实写出的报告。其中的一篇通訊，譴責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由数千人构成的乡里，虽然拥有极其茂盛的森林，然而还没有分到薪材。另一篇通訊，以高兴的心情欢迎較大的出版自由，因为从此以后，摩塞

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可以公开地抨击折磨着他們的毒疮，而不被指責为“无耻叫囂”。这两篇通訊引起了总督馮·沙培尔(von Schaper)公布两个訓諭。他在一个訓諭里，要求报纸說出那个据说发生了薪材事件的乡鎮的名称；在另一个訓諭里，他对不管什么当局曾有过像宣布“公认为处境困难的”葡萄酒酿造者对于他們的处境的訴怨为“无耻叫囂”的这种“不体面行为”，表示异議。他要求通訊的作者向他正确地指出当局即使在比較寬大的书报檢查令公布以前，曾阻撓过公开坦率地討論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的困苦处境的事例，并且向通訊的作者保証：如果作者能坦率說出种植葡萄的农民被什么毒疮所折磨，特别是作者如果能提出根治毒疮的有效办法，他将万分感激。这个官僚神气十足的人物，在这样說完他的全部甜言蜜語之后，便改用了粗暴的口吻，宣布作者的論断是空口无凭的恶意造謠中伤。

《萊茵报》起来应战。它通过自己的記者收集了关于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大量資料，并辟出专栏报道这些材料，以对馮·沙培尔的攻击进行有根有据的反击，而且本身还从其他来源找到一些材料来支援反击。1843年1月15日，报纸上发表了数篇这方面的文章，同时把材料仔細認真地分排在五个标题下面。报纸提出討論的問題是：

- (1)关于分配木材的問題；
- (2)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对于較大的出版自由的态度；
- (3)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毒疮；
- (4)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吸血鬼；
- (5)有关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的建議。

第一項的材料被完全报道出来，因为通訊的作者同意編輯部把那些从未分配过薪材的乡鎮的名称告訴給总督。关于第二項，报纸用大量的实际材料和文件材料，証明了政府确实用暴力压制

过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的訴怨；証明了政府从来沒有想認真地改善这里的农民的处境，而一直是玩弄空洞的言詞；証明了官僚制度根本不能为消除社会罪恶作任何事情，因为这个制度的上层机构依靠下层机构，而下层机构又仰仗上层机构。这几发炮彈，已使政府难于招架了；政府急忙在檢查官的紅鉛筆的掩护下仓皇退却。1月20日的几篇文章，在檢查时大被删节，留下来的还不到二分之一。既怯懦而又强暴的官僚制度，甚至不允許报纸討論最后三項。

但是1月28日，在《萊茵报》的最醒目地方登出一則簡訊，內称主管书报檢查的王国各部，联合下令《萊茵报》从本年4月1日起停刊。同时，授权中央特派員馮·格尔拉赫每天要求各报在檢查以后全部送到他那里复查，在未經他亲自檢查以前，絕對不得付印和发行，即使經過初步檢查，而如果他又在报上发现有不妥的地方，也可以完全把报纸扣下来。在1月25日发布的禁令中說道：《萊茵报》从它誕生之日起，就遵循着一个应受指摘的方針；显然被不良的意图所支配，即想从基础上破坏国家制度，动摇君主政体的原則，挑撥輿論怀疑政府，教唆某些等級攻击另些等級，煽动群众对現行法制不滿。报纸的活动以一些空洞的理論为基础，追随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容忍的应受指摘的目的。报纸的用語和表达方法，都十分放肆。命令中承認檢查制度无能，沒有发挥作用；命令中說道，規定了檢查制度，并不等于以后不断同具有如此頑固傾向的胡作非为进行斗争。其次，訓諭中还提出了一項基督教的德意志原則（尽管這項原則在道德上对于各种世俗的傾向抱着厌恶的态度，但是它对于叮当直响的錢声却持有温柔的情感），說什么如果不考慮到股東們的金錢利益，政府早就把报纸查封了。这个考虑目前还在支配政府不立刻而要在第一季度結束后才查封报纸。

在檢查官維特豪茲的上面設置由中央特派員兼任的首席檢查官以后，就解除了維特豪茲的檢查官職務。科倫的唱歌愛好者協會，曾為這位“下野的檢查官”舉行一次隆重的小夜曲晚會。由柏林派來的部務秘書聖保爾接替了他的職位。這個聖保爾，最後玩弄政府所要求的粗暴和狡猾並用的手法，所以在2月18日又撤銷了首席檢查官的職位。唯恐失去財源的股東們在2月12日召開股東大會，哭哭啼啼地向當局哀求，這也許促進了撤銷首席檢查官的職位。雖然《萊茵報》的各欄里如今還可以隱約地看到指責檢查官的專橫跋扈的痕跡，但是促使馬克思在3月17日退出《萊茵報》編輯部的，並不是同檢查官進行的鬥爭，而是股東們的一種想法，即他們認為報紙的口气緩和以後，他們就能夠使當局收回對報紙所作的死刑判決。馬克思立刻得到了從實踐中檢查他的關於出版自由首先不要成為行業自由的見解的機會。

股東們的幻想當然要變成泡影。股東們派到柏林請願的代表團，甚至未被允許謁見國王。科倫、特利爾和萊茵地方其他城市的請願，得到了禁令繼續生效的答复；而參加請願的政府官員，還額外受到了通令申斥，說他們本應當對社會關係持有更為老練的觀點。《萊茵報》從1843年3月31日以後就不復存在了。

然而，就連德國人的卑躬屈節精神，也玷辱了這面被迫下降的自豪旗幟，于是在為報紙舉行的葬後宴會上，殺死報紙的檢查官又與股東們同桌進餐，而在檢查官的椅子上還用鎖鏈綁着一份《萊茵報》。聖保爾在以文化的名義威風凜凜地立了這一大功之後，還沒有來得及離開科倫，就因為在妓館里與夜間巡察人員鬥毆，而受到警察當局的矯正法院的有罪判決。另一個檢查官是他在这次英勇戰鬥中的同志，即那個身為伯爵的弗里茨·愛倫堡，三十年以後在社會民主黨面前，呈現為曾經腰上挎着殺人大刀和手里拿着射擊武器的偽善人。可惜，普魯士的歷史學家們沒有向後世報道他們

的想入非非的国王，在用自己幻想的动听的和形象化的語言胡說什么“萊茵淫妹”的时候，是怀着什么样的虔信宗教的情感去看他的勇敢的宗教和道德騎士在世間的妓館里同秩序的保卫者打架斗毆的。

## 第三章

### 《德法年鉴》

馬克思退出《萊茵報》編輯部之后，立即写信給卢格說：“自由主义肩上的华丽斗篷掉下来了，极其可恶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現在全世界的面前。”<sup>①</sup>而卢格在向他的兄弟写信时，就把这个专制制度的老根子暴露出来：“在整个德意志境內，扼杀书报出版的不只是一两个官員，也不只是国王，而是經過人民、作家、学者、市民、士兵和农民的同意并以他們的名义扼杀的。”如果政論界的反对派想要扎下新的根基，那它就必須到国外去做这一工作。《德法年鉴》就是出于这种必要而产生的。

#### 第一节 杂志的創辦和停刊

为筹办新事业所做的事务性和組稿性准备工作，几乎进行了整整一年。当《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被查封以后，卢格立刻就想出了同馬克思在国外复刊的計劃。他在尤利烏斯·弗呂貝尔(Julius Fröbel)的“文艺书店”入股，出資六千塔勒<sup>②</sup>，但是新杂志不要像《德国現代哲学和政論界軼文集》那样在瑞士出版。馬克思說，苏黎世也得听从柏林的命令。海尔維格早在二月的时候，就懼于君主政体的反动而蒙受損失，被驅逐出苏黎世，他不得不放棄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7頁。

② 塔勒(Taler)——当时德国的銀币，約等于三馬克。——中譯者

版杂志的计划，而利用书报检查制度的漏洞（准许出版二十印张以上的书籍），把准备登在杂志头几期的数篇幸存下来的文章，编成一本《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张》。

但是，马克思和卢格所以把自己的脚步迈向巴黎，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完全摆脱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的斗争促使他们两个人从宗教方面转向政治方面；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坚定不移地支持海尔维格和卢格同鲍威尔兄弟的论战，无情地谴责“自由人”的轻佻行为，谴责他们仪表上的柏林风度，谴责他们政治上的想入非非，谴责他们自诩才高和追求名利；不过他也认为，就每一个单独的人来看，他们大部分是优秀人物。但是，在德国仍然不可能进行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的风浪已在法国高高地掀起来。此外，马克思到任何地方，也不能像在法国这个社会主义发源地那样容易研究法国的社会主义。在卢格那一方面，还打算在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建立一个精神同盟。他认为，反对法兰西和反对政治，这就是反对政治和反对自由。法兰西是政治原则，即欧洲的人类自由的纯洁原则，而且只有它才能是这种原则。在这个新的同盟里，作为形而上学和玄学方面的可靠罗盘仪的黑格尔哲学的逻辑洞察力，应当成为德国人带来的嫁妆；法国人（甚至拉梅耐<sup>①</sup>和蒲鲁东，更不用说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了）在形而上学和玄学方面，就像一只没有舵的船，任凭风浪摆布。卢格打算邀请拉马丁<sup>②</sup>、拉梅耐、路易·勃朗、勒鲁和蒲鲁东为杂志撰稿。

1843年夏末，卢格前往巴黎，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了解情况。结果他认为很好，于是在1843年底，他同马克思完全搬到巴黎去。

---

① 拉梅耐，费里西德（Lamennais, Felicité 1782—1854）——法国的神甫，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俄译本编者

②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的诗人、历史学家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俄译本编者



但是，过了三个月以后，卢格就写信给他母亲说，《德法年鉴》的第一期双刊号问世了，而整个事业也随此寿终正寝。

这次失败的原因，只有一部分是杂志在德国的行销遇到了很大阻碍，“文艺书店”的资金很快就耗尽了。这种困难本来是可以克服的。至于法国作家们的冷漠矜持，或许更能容易战胜。没有一个法国作家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文章：他们有一部分人虽然答应写稿，可是没有兑现；另一部分人干脆拒绝，有时态度很不友好。拉梅耐向两位出版者讲了两个小时关于他的宗教幻想的说教，然后他宣布说，在参加杂志的工作以前，他要对出版者的活动观察一个期间。拉马丁甚至正式辟谣，否认报载他似乎答应同“异端分子”(!)拉梅耐一起，为马克思和卢格两位先生的杂志写稿的消息。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卢格曾在《和平民主日报》(“La Démocratie pacifique”)上反驳说，拉马丁毕竟使他们有理由期待他为杂志撰稿。路易·勃朗表现得特别不客气。不错，他曾经由于德国的青年开始注意生活实践而为德国庆幸，但是他认为德国的青年应当学会节制自己的热情，因为哲学中的无神论必然在政治方面产生无政府状态的后果。他谴责那些由于崇拜法国的唯物主义、狄德罗、霍尔巴赫和《百科全书》<sup>①</sup>而使自己后退了一百多年的德国青年，并且态度高傲地要求他们：“你们要记住，卢梭才是以团结和博爱为基础的民主制的代表者！你们要记住，正是那只曾经为我们

<sup>①</sup> 《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1751—1781年)——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哲学的最伟大文献。《百科全书》的主编是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哲学家和数学家让·达兰贝尔(Jean D'Alembert)是他的助手，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让·雅·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孔狄亚克、自然科学家若·路·毕丰(Georges Louis Buffon)、经济学家弗·魁奈(François Quesnay)和安·罗·雅·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等人。《百科全书》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思想武器，它动摇了法国的封建制度，并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好了准备。——俄译本编者

留下《社会契約論》的手写下了《薩伏依牧师的懺悔》！”<sup>①</sup> 这个胆小如鼠的小资产者，不能放棄那种用任何一个宗教的神光来包围实际生活斗争，从而阻止自己走上深刻認識这个斗争的道路的温情习气。但是，一棵大树是不应当被砍了一斧头之后就馬上倒下来的，而且在最初时期，即使沒有法国人撰稿，《德法年鉴》的出版者也是能够容易应付过去的，因为有海涅、海尔維格、約翰·雅科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人組成了一个德国撰稿人本部。有这些人写稿，杂志滿可以繼續出版。

是什么东西使他們遭到无法挽救的失敗的呢？这就是他們两人之間的关系破裂。关于这种破裂的表面原因，我們只能从卢格的話里找到，但是这些話里流露着对于馬克思的刻骨仇恨，所以不可能信以为真。据卢格說，馬克思同他断絕友誼关系，是因为他指責海尔維格显然被巴黎的享乐生活所陶醉，胡作非为，从而不承認这个“坏蛋”有任何前途。或許这里面也有一部分真理。馬克思对于一切真正的詩人是怀有亲热的好感的。如果他像卢格那样，曾同海尔維格在柏林长期共处，他是不会怀着卢格曾經体验过的那种隱秘的滿足感容忍詩人去晋謁国王的，而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阻止詩人去見国王；但是現在，当海尔維格如此严重地沉緬于年輕人的这种胡作非为的时候，馬克思对于他的真正錯誤或虛假錯誤，或許能够更为公平从而更为温和地加以判断。或許卢格的根深蒂固的庸人德性，不知怎的引起了馬克思发火。要知道，卢格甚至对于像海涅这样的詩人，也沒有放棄过叨叨不休的道德說教，不过他这时对于海涅的評价，要比以前在哈雷时正确一些；又过許多年以后，他曾經自鳴得意，說他同馬克思一起，启示海涅作出了不朽的

---

① 路易·勃朗在这里暗指：卢梭在《爱弥儿》(1762年)的第四部(《薩伏依牧师的懺悔》)里，虽然也反对正式的宗教，但是主張必須有所謂自然宗教，即以情感为基础的神的信仰。——俄譯本編者

抒情詩篇，比如《一个冬天的童話》。其实，馬克思和卢格的私人关系是由于什么原因破裂的，并不那样重要。只有他們在政治上的决裂，才有历史性意义，而且这种决裂的根源，要比他們由于海涅或海尔維格而临时发生的爭論深刻得多。

必須有想入非非的反动势力的一切眼光短淺的表現，才使卢格这样的人物成为极端反对派。既然他还保有以前的那种連年老而昏庸的国王<sup>①</sup>都容忍的乱发議論的自由，那末，对于他在哈雷或德累斯頓担任城市議員的英勇行为，自然要感到聊以自慰的滿意。他对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如何滿意，从他二十年后在回忆这些往事时表現的自我滿足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应否为了載貨馬車夫和載客馬車夫的利益在易北河左岸修建新車站，或者为了乘客的利益在易北河右岸修建新車站；柏林的犹太人有没有权利拿着假鑽石去参加每年一度的德累斯頓商品展覽会；可不可以禁止沒有教养的英国人在閱覽室里看书时把两只脚放在桌子上——这都是卢格最喜欢討論的問題。当时还是一个理想家和青年黑格尔派的馬克思在《萊茵报》上討論的經濟冲突，同卢格所关心的这些問題，形成了极其鮮明的对比。馬克思所討論的經濟冲突是：資产階級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間的战争，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的对抗，或者甚至关于貿易自由和保护关稅的爭論，特别是由李斯特<sup>②</sup>率領南德工厂主掀起的反对“关稅同盟”的低微稅率的这种爭論。在馬克思和卢格都置身于法国生活之中的时候，馬克思像一艘勁艇，乘風破浪，終于駛到開闊的海域，而卢格則像一块核桃壳，畏畏縮縮地极想退回到岸边的淺灘。为了熟悉工人的共产主义小組的内部生活，馬克思十分願意同当时領導“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

①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中譯者

②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的庸俗資产階級經濟学家，宣傳极端的保护关稅政策。——俄譯本編者

但澤人艾韦貝克<sup>①</sup>往来；然而，在艾韦貝克向卢格借几个法郎印刷魏特林的文集，并附带說了“卢格就是認識錢”的这句沒有恶意的話的时候，这位已經下野的德累斯頓市議員，却对艾韦貝克“怒吼”一通，而且他認為值得把这一“怒吼”的內容写下来，以供后世人浏览。他請求別人不要干涉他的私人事情，卢格說，他不是为了証艾韦貝克控制他的財產，而离开德国躲避檢查制度和檢查官的，接着又說了其他一些諸如此类的話。这个資产者在实际接触社会主义的时候，完全把他的哲学家外衣丢掉，露出本来的面目；卢格开始用比观察共产主义者的“卑鄙齷齪的犹太灵魂”更为寬恕的目光去看“普魯士的劊子手”。

在以后五十年历史的反光照射下，卢格和馬克思之間的典型差别，即一个喜欢吵吵嚷嚷的市僧和一位革命的思想家之間的差异，已經十分明显地反映在《德法年鉴》发表的馬克思同卢格、巴枯宁和費尔巴哈的通信当中。卢格后来冒充这些书信的作者，但是無論从心理学观点来看，还是从笔調上去分析，都沒有任何理由認為这些信件是出于卢格的手笔。無論如何，就书信內容的本質来判断，它們毫无疑問是屬於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信文下面的人的。馬克思用短促而动人心弦的和音，引起了这些书信往来。比如，他在第一封信里写道：想入非非的反动势力，将要引起革命；国家是十分严肃的东西，要它演什么滑稽剧是办不到的；一艘滿載傻瓜的船只，或許会有一段時間順風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駛去的，因为这些傻瓜根本沒有料想到这一点。卢格用对于德国庸人的綿羊般的一成不变的忍耐的冗长訴苦，来回答馬克思的和音。卢格很想消灭这些德国庸人，可是他知道自己也是一个庸人，

---

① 艾韦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医生和作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后来曾为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报》写稿。——俄譯本編者

所以不打算雪去共同的耻辱。“請您把真理告訴我，而不管它怎樣令人痛苦；我準備接受這種真理。我們的民族沒有前途了，考慮我們的榮譽又有什麼用處？”

馬克思對此回答說：“您的來信是一支出色的哀曲……可是它毫無政治內容。……舊世界是屬於庸人的……我們應當注視着他（指庸人——俄譯本編者）。研究一下這位世界之主是值得的。”<sup>①</sup>馬克思分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一些初步措施，認為它們是一位不算昏庸的君主企圖不改變原來基礎地消滅庸人國家的嘗試。這個嘗試失敗了，而且也必然遭到失敗。庸人是構成君主制度的材料，而君主不過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兩者仍然是現在這樣，為王的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為自由的人，即真正的人。國王希望用來治理國家的不是死的法律，而是自己的活的心；他想要把別人的心都鼓舞起來，以便為他的衷心願望效勞，但是別人的心，卻不像國王的心那樣跳動；那些受國王統治的人，一開口便說要消滅舊的統治。那些曾無耻地宣稱要使人成為人的理想家也講話了；當國王按照舊德意志的方式來幻想時，他們認為自己有权按照新德意志的方式來發議論。由於存有這種分歧，那些以前事事都處理得得心應手的奴僕，以及同他們一樣的俄國沙皇<sup>②</sup>，都可以容易說服暴躁的國王，叫他相信這樣就無法管理那些大聲疾呼的人了。接着，就回到了舊的僵化了的奴僕和奴隸的國家；而緘默則成了表達意見的唯一方式。這樣一來，就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證明：專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並且是同人性不相容的。

然後，馬克思認為，盧格當然不會指責他對於目前狀況過於樂觀。如果說馬克思對於目前狀況還沒有灰心失望，那只是由於這種絕望的現狀使他產生了一種希望。他沒有談論主人的無能和一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8—409頁。

② 指尼古拉一世。——中譯者

一切都听天由命的奴僕与臣民的冷漠，虽然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足以引起巨大灾难。他只是注意庸俗主义的敌人，換句話說，就是一切有思想的和受苦受难的人，都已經取得相互諒解，甚至旧式的臣民的消极繁殖制度，也每天在給新人类招募新兵。“工商业的制度，人們的私有制和剝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現今社会內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創造，它只是存在和享乐而已。”<sup>①</sup>他們的任務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其次，是巴枯宁和費尔巴哈的书信。他們二人也反对卢格的悲观失望情緒。巴枯宁以高傲但又出于好意的笔調叙述德国的事情：“……我这个斯基台人，要把你們的枷鎖从你們身上，即从想要成为希腊人的德国人身上解下来。”

費尔巴哈把《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的被查封比做波兰的灭亡。他說：“少数人的努力，在已經腐朽的为人民生活的总的泥潭里是得不到任何結果的……我們需要有新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們不能像民族迁徙时期那样从沼澤地带和森林里来。我們应当用我們的肋骨来創造他們。”他建議成立一个新的机关，以便清洗人的头脑。卢格認為自己是战胜了“新阿那卡雪斯和新哲学家”，而馬克思最后却好像用一首壮丽的收場乐曲，从整个討論中作出了結論。

馬克思說，显而易见，必須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們建立一个新的集合地点。但是，如果說对于“从何处来”这个問題已經不存在什么疑义，那末，对于“往何处去”这个問題却十分糊塗。“姑且不談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們中間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認他对未来沒有明确的概念。然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頁。

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們不想教条式地預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謎語的答案都在哲学家們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張开嘴来接受絕對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現在哲学已經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証明就是哲学意識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渦。如果我們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們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們現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現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謂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縮。”<sup>①</sup>馬克思不想树立任何教条性质的旗帜，而卡貝、德薩米<sup>②</sup>和魏特林等人的共产主义，对于他來說也不过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有两种东西，第一是宗教，第二是政治，当时在德国引起极大的兴趣。不管这两种东西怎样，都应当把它們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拿任何現成的制度，比如《伊加利亚旅行記》中的制度，来和它們对立。

“社会主义迷們”認為政治問題不值得予以任何注意，馬克思反对这种意見。到处都可以从政治国家同自己的冲突中，从政治国家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现实前提的矛盾中，发展出社会真理。他援引自己以前在《萊茵报》上指出的等級制和代議制之間的区别，認為这个問題不过是用政治的語言来表明人的統治和私有制的統治之間的区别而已。“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們把我們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結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場結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們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結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就不是以空論家的姿态，手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5—416頁。

② 德薩米，德奧多(Dézamy, Theodore 1803—1850)——法国的政論家，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俄譯本編者

中拿了一套現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們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闡发新原理。我們并不向世界說：‘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謂之举’，而是給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們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識則是世界應該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願意与否。”<sup>①</sup> 馬克思最后在通信中提出一个綱領：对当代的斗争和願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闡明。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便是这个綱領的頂峰。其他撰稿人的一切作品，比如海涅和海尔維格的詩，約翰·雅科比从他的叛国案审讯中摘出的报道，貝尔奈斯的文章和赫斯的书信，都多少具有重要的美学或历史价值，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却没有什么意义。

## 第二节 馬克思的論文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为《德法年鉴》写了两篇文章。馬克思的两部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論犹太人問題》，彼此具有一定的内部联系；同样地，恩格斯的两部作品《政治經济学批判大綱》和《英国状况》，也是如此。但是，除了这一特点以外，全部的四篇文章好像貫串着一条紅綫。这条紅綫就是費尔巴哈，他們从費尔巴哈出发，然后超过他而摸索着前进。

馬克思在1843年10月20日寄自克罗茨納赫的书信中，邀請費尔巴哈为《德法年鉴》第一期写一篇批判謝林(F. W. Schelling)的文章。馬克思称費尔巴哈是“謝林的直接对立面”，因为謝林的眞誠的青年期思想，在費尔巴哈看来是眞理，是现实，是严肃的、豪迈的事情，而謝林自己后来繼續把它看做玄妙的青年期梦想。“所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7—418頁。



以我認為您是由陛下、自然和历史召来反对謝林的唯一必要的人物”<sup>①</sup>。这短短的几行干淨而充滿善意的詞句，好像在精神振奋的时候写出来的，可是它們已使費尔巴哈深为感动，以致他立刻开始閱讀謝林的讲义，打算履行馬克思为他指出的“必然的天职”。但是，最后他还是拒絕了邀請，說他已把最必要的东西簡明地叙述过了，而不想为了使一般人理解(ad captum vulgi)再重复已經說过的东西，并以此作为辞退的理由。也像費尔巴哈評論馬克思时一样，馬克思在評論費尔巴哈的时候，总是怀着很高的敬意的；但是，使他們彼此有所不同的那个因素，即一代人的半生当中經歷的工业和政治发展阶段，在他們初次接触的时候，就显然地現出了它的作用：四十岁的中年人，仍然只想以庄严的哲学家身分出現在感性世界；而二十五岁的青年人，則希望用利劍征服这个世界。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馬克思从費尔巴哈所奠定的反宗教的批判的基础出发。这个基础就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但是，馬克思立刻向前迈进一步，他說：“……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sup>②</sup>历史的任务，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任务，就是在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sup>③</sup>

为了解决这项任务，馬克思并没有针对原本，而是针对副本——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批判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批判关系到德国。如果想使这种批判面向德国的現存状况本身，那就要犯时代錯誤。“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状况，但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作品选》，俄文版，第258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2頁。

③ 同上书，第453頁。

按法国的年代來說，我也不会是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在现代的焦点了。”<sup>①</sup>其次，应当清楚地描述德国的状况，描述“各个社会领域間的相互傾軋，描述普遍的沉悶和不满以及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偏頗，也就是描述专以维护一切卑鄙行为为生的、而且自己本身也无非是一种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鄙事物的那个政府机构内部的一切。”<sup>②</sup>如果批判打算理解现代的社会现实，如果批判打算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那它就必須超出德国的状况，“不然的話，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sup>③</sup>

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工业以至于整个經濟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主要問題之一。这个問題是怎样使德国人开始发生兴趣的呢？是由于保护关税制度、貿易限制制度、国民經济学。条頓主义从人变成了物質，因此，我們的棉花騎士和鋼鉄英雄也就不知在哪个黄道吉日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sup>④</sup>

当时，馬克思已經撕破了李斯特給自己的資本主义—重商主义宣傳披上的爱国主义外衣，虽然李斯特現在仍被捧为民族英雄。“在法国和英国，問題是政治經济学或社会对財富的控制；在德国却是国民經济学或私有財產对国家的控制……那里，正在解决問題；这里，矛盾才被提出。这个例子充分說明了现代問題的德国式的提法，說明我們的历史就像一个笨拙的新兵，只会重复旧的操練一样，到現在为止一直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重复陈旧的历史。”<sup>⑤</sup>

但是，德国的历史在德国的哲学中有它的观念上的繼續，德国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4頁。

② 同上书，第455頁。

③ 同上书，第457頁。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457—458頁。

人是現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現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統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对于这种哲学的批判，要到目前需要实际解决的那些問題的深处。德国的实践派（显然，馬克思指的是自由資产阶级）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这一派的錯誤只在于沒有認真地实现这一要求，而且也不可能实现它。只是扭过头去，把背冲向哲学，对它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話，是否定不了哲学的。这一派想从生活的现实萌芽出发，可是它忘記了德国人民生活的现实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們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的。这一派如果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它就不能消灭哲学。从哲学中产生出来的理論派（显然，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柏林的“自由人”），也犯了同样的錯誤，不过錯誤的方向相反。这一派不批判哲学，而是从哲学的前提出发，并且沒有超出由这些前提得出的結果，或者把从別处得来的要求和結果冒充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結果。这一派的根本缺陷，是它認為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为现实。恰恰相反，問題在于：“……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 *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 [原則高度的] 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現代各国的現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sup>①</sup>

馬克思对此回答說：“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来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 *ad hominem* [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論只要彻底，就能說服 *ad hominem* [人]。所謂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sup>②</sup>“可是，彻底的德国革命看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質基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頁。

② 同上。

础。理論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論滿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它(指德国——俄譯本編者)怎么能够一个筋斗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越过現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即越过它实际上应该看做摆脱自己实际障碍的一种解放、而且应该作为它的目的来争取的那些障碍呢？”<sup>①</sup> 馬克思在解决这个問題时說道：德国各邦的政府不得不把現代国家世界(它的长处德国人民沒有加以利用)的文明的缺陷，同旧制度的野蛮的缺陷(这些缺陷德国人却大加欣賞)結合起来；德国分担了現代历史发展的一切痛苦，可是沒有享受到这一发展的快乐；有朝一日，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境地以前，就陷于欧洲崩潰的境地。“对德国來說，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純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烏托邦式的空想。”<sup>②</sup>

政治革命的基础，“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統治，就是一定的階級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假定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階級的地位，也就是說，既有錢又有教育，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們，这个階級才能解放整个社会。

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階級要想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一瞬間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在这瞬間，这个階級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認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間，这个階級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sup>③</sup> 相反地，要使人民革命和个别階級的解放互相吻合，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頁。

② 同上书，第463頁。

③ 同上书，第463—464頁。

外一个阶级，一个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化身，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须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所以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法国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

马克思接着指出，德国的任何一个特殊阶级，不仅仅缺乏那些把它自己标志为社会的消极代表的彻底性、尖锐性、勇敢精神和无情。同样地，任何一个等级也缺乏使自己同人民的心胸一致（即使是瞬间的一致）的开阔胸怀，缺乏那种鼓舞物质力量实行政治暴力的灵感，缺乏那种敢于向敌人傲然挑战、大喝“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德国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关系不是戏剧式的，而是史诗式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就连德国资产阶级本身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也同其他要求一起，只是以认为自己是其他一切阶级的卑鄙庸俗性的总代表这一意识为根据的。每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便卷入同低于自己的阶级进行的斗争。资产阶级还只是勉强地敢于表述自己对于解放的观点的时候，社会情况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就已经宣布这种观点是陈腐的，或者至少是成问题的了。

“那末，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

个領域，它本身表現了人的完全喪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結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級來說，就是无产階級。”<sup>①</sup>

德国的无产階級，还只是随着剛剛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因为組成无产階級的，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貧民，不是在社会的双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过程、特别是由于中层等級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不言而喻，自发产生的貧民和基督教德意志的农奴等級，也在不断地(虽然是逐渐地)补充着无产階級的队伍。如果說无产階級宣告了現存世界制度的解体，这也不过是揭示了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如果无产階級要求否定私有財產，这也不过是把社会已經提升为无产階級的原則的东西，把未經无产階級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結果而体現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階級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則。“哲学把无产階級当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样地，无产階級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沒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sup>②</sup>“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階級。哲学不消灭无产階級，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階級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

一切內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鷄<sup>③</sup>的高鳴来宣布。”<sup>④</sup>

馬克思在《論犹太人問題》一文中批判布魯諾·鮑威尔的这方面著作时，証明德国可能实现的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类解放，同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6頁。

② 同上书，第467頁。

③ 高卢是法国古称，“高卢雄鷄”是法国在第一共和国时代用在国旗上的图案，标志当时法国人民的革命意識。——中譯者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頁。

时探討了两种解放的區別。

犹太人問題可以說是德国唯心主义着手研究經濟发展的各种問題的起端。基督教德意志国家一直踐踏、压制和迫害犹太人，可是同时它又容忍犹太人，庇护他們，甚至疼爱他們。在十八世紀，“老弗里茨”<sup>①</sup>把犹太人变成了真正无权的人，可是同时他又广泛地庇护犹太人，这种庇护的“主要形式，就是支持商业、作坊和工厂的成就”。“哲学家国王”給予协助他伪造硬币和进行其他性質可疑的財政活动的有錢的犹太人以“基督教徒銀行家的特权”，可是他只勉强地容忍莫·緬迭尔桑(Moses Mendelssohn)住在他管轄的領土內，可是不把他看作哲学家，而視為給一个犹太富翁当管帳先生的人。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千方百計地刁难犹太人，可是这种刁难并没有妨害犹太人的資本随着經濟发展而加强自己的力量。犹太人的資本开始使統治階級服从于自己，并把自己的鞭子抽在被統治階級身上：以产业資本形式鞭打无产階級，更加殘酷的是，以高利貸資本形式鞭打小农和小市民。

布魯諾·鮑威尔对于这种奇怪的矛盾，对于这种“虛假的情况”表示不滿。在这一点上，他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資本主义阶段，然而只認為它是中世紀黑暗的胚胎，是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身上的贅肉。因此，他没有能够走出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間的宗教对立的圈子。尽管他批判神学时十分尖銳，但是他仍然戴着神学的眼鏡去观察事物。他攻击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認為这个国家的宗教本質不能使它解放犹太人；可是同时他又攻击犹太人，認為犹太人的宗教本質不能使犹太人获得解放。宗教观点对于鮑威尔具有决定性作用。基督徒和犹太人如果希望成为自由的人，就必须不再是

---

<sup>①</sup> 指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历史书刊中把他称为弗里德里希大帝。——俄譯本編者

基督徒和犹太人。但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基督教胜过作为一种宗教的犹太教，所以犹太人走向自由的道路，就比基督徒的这条道路漫长而艰巨。按照布鲁诺·鲍威尔的意见，犹太人要想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就必须首先以某种方式向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学习。犹太人问题的解决，犹太人的解放，在布·鲍威尔这里变成了唯心主义的怪谈。

马克思对此提出实践的结论，这种结论是他从研究法国革命当中得出来的。马克思说，只是探讨“谁应该解放别人？”和“谁应该得到解放？”这两个问题，是绝对不够的。批判还有第三个任务，即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种解放？应当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类解放的关系。鲍威尔问犹太人：根据你们的观点，你们有没有权利要求政治解放呢？其实，他本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政治解放的观点有没有权利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切人放弃宗教呢？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同时证明基督教德意志国家即特权国家只是一个不完备的国家，还是一个神学的国家，仍然没有发展成为纯粹的政治国家。政治上完备的再也不知宗教特权为何物的现代国家，就是这种完备的基督教国家。这种国家不仅可以解放犹太人，同时早就已经解放了他们，根据它的本质，它也应该解放他们。在政治国家高度发展的地方，在国家的宪法直接宣布实施不受宗教信仰限制的政治权利的地方，比如在北美的某些州里，不信奉宗教的人仍然不被视为正派人。可见，宗教的存在并不同国家的完备性发生矛盾。犹太人、基督徒和一切信奉宗教的人的政治解放，就是国家摆脱犹太教、基督教和一切宗教而得到的解放。国家可以使自己摆脱某些限制，可是人实际上不会同时解除这种限制，政治解放的局限性也就表现在这里。

例如，国家作为国家，正在废除私有财产。像在北美的许多州



里发生的那样，人一取消选举权和被选举方面的财产资格，就是宣布私有财产已在政治上被废除。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的时候，当国家不顾这些差别而宣布每个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加者的时候，国家就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废除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上的差别。然而，国家却在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按它们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作为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表现它们的本质。国家远远没有废除所有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的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公共性。完备的政治国家，从它的本质来说，是同人的物质生活对立的人的类生活。这种自私生活的一切前提，正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继续存在于市民社会，而不在国家领域之内。国家同它的前提（无论这些前提是私有财产这样的物质因素，还是宗教这样的精神因素）的关系，就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作为一种特殊宗教的信仰的人跟自己的国家公民身分和作为社会成员的其他人发生的冲突，归结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

但是，如果一个人在保留自己是犹太人的条件下可以从政治上解放，并得到国家给予的公民权利，那末，他这时可不可以要求所谓人权，并取得这种权利呢？鲍威尔对于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解答。马克思对于这一点回答说：从人权这一概念决不能得出宗教同人权毫不相容的结论；恰恰相反，在这些权利中间，直接提出了信奉宗教的权利，而且是可以以任何方式信奉宗教的权利。信仰的特权是一般的人权。Droits de l'homme——人权之作为人权，是和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不同的。和citoyen（公民）不同的这个homme（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的人，正是市民社会的成员。马克思援引最激进的宪法即1793年法国宪法关于人权

(平等、自由、安全、財產)的規定，詳盡地証明了這一點。政治革命是市民社會的革命。在封建制度下，社會一方面具有直接的政治性質，這就是說，市民生活的各項要素，比如財產、家庭、宗族和勞動方式，都已經以領主權、等級和同業公會的形式升為國家生活的要素。但是另一方面，社會又由此分裂為若干單獨的組成部分，把個人從國家整體中分離出來。這種組織的必然後果，就是普遍的国家權力變成同人民隔離的統治者及其僕從們的特殊職能。政治革命打倒了這種專制權力，把國家事務提升到人民事務的高度，以制憲形式把政治國家確定為普遍事務，即確定為真實的國家。這種革命摧毀了一切等級、同業公會、行幫和特權，從而消滅了市民社會的政治性質。“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變成市民社會的成員，變成利己的、獨立的個人，另一方面把人變成公民，變成法人。

只有當現實的個人同時也是抽象的公民，並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人勞動、自己的個人關係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sup>①</sup>

最後，馬克思研究鮑威爾的另一個觀點。按照鮑威爾的意見，似乎基督徒比猶太人更具有解放的能力。馬克思在這裡也粉碎了問題的神學提法。儘管鮑威爾對神學持有批判的態度，但是他並沒有走出神學提法的圈子。馬克思打算觀察的不是安息日的猶太人，而是平素的猶太人。毫無疑問，猶太人問題也是宗教問題，但是它具有自己的實在的世俗基礎。不應該從猶太教去解釋現實的猶太人，而是恰恰相反，應該到現實的猶太人中去尋找對於猶太教的解釋。因此，在馬克思這裡，把猶太人的解放能力問題變成了要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頁。

想消除犹太就应当克服哪种特殊的社会因素的问题。犹太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是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是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是金钱。“既然如此，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

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也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sup>①</sup> 马克思在犹太中看到一般性的现代反社会的因素，而这种因素经由犹太人从最坏的方面积极参加的历史发展而达到了目前这样高度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必然要瓦解。

犹太人由于掌握了金钱势力，而用自己的方式从犹太中解放出来；犹太人所以从犹太中解放了出来；是因为金钱成了世界势力，而犹太人的实践精神则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践精神。“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sup>②</sup> 在理论上人们不承认犹太人有政治权利，而在实际上他们却有很大的权力。既然鲍威尔把事物的这种情况叫做虚假的情况，那末上述的矛盾就是一般的政治权力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但在实际上，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犹太的继续存在不是违反历史，而是顺应历史。市民社会不断从自己的内部产生犹太人。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在它的面前，诸神都要退位。金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6页。

② 同上书，第447页。

把一切神都变成了商品。金錢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金錢剝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金錢是从人身上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的本质却统治着人，而人也向它膜拜。犹太人的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是財迷的民族。既然犹太人的现实本质在市民社会得到了普遍的真正的实现，那末市民社会就不能使犹太人相信他們的宗教本质的非现实性。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

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日常的宗教問題現在具有社会意义，至于宗教本身的問題就更不用說了。他不是用神学家的眼睛，而是用俗人的眼睛去观察犹太的历史发展的。他不是根据宗教理論，而是根据幻影在犹太教中的工商业实践来探討这一发展的。实践的犹太只有在完备的基督教世界里才能完备；此外，实践的犹太实质上是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完备实践。既然市民社会完全具有商业的、犹太人的性质，从而犹太人注定是这个社会的必要成员，那末，犹太人更有权利要求政治解放，要求享用一般人权。

承認人权，不外是承認利己的公民个人，承認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状况内容、即現代市民生活内容的精神和物质因素的不可阻擋的运动。人权并不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賦予人以信奉宗教的自由。人权并不使人放棄财产，而是賦予人以拥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不阻止人去卑鄙地追逐暴利，而只是賦予人以行业的自由。現代国家承認人权，跟古代国家承認奴隶制度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古代国家以奴隶制度作为自己的自然基础，同样地，現代国家以市民社会作为它的自然基础。市民社会通过自己的发展，打碎了一切旧的政治桎梏，建立起現代国家，而这个国家又通过人权的宣布，而承認了自己的慈母胸怀和固有基础。发达的現代国家組織，以发达的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必然基础，換句話說，就是以人反对

人或個人反對個人的普遍鬥爭，只是由於自己的個性就彼此分開的所有個人的相互戰爭，擺脫了特權壓迫的自發生活力量的普遍的不可阻擋運動，個人在表面上自由和獨立的情況下所處的实际奴隸地位，作為它的必要基礎。個人把自己的異化了的的生活因素，比如財產、行業和宗教等的這種不可阻擋的運動，誤認為自己的固有自由；其實恰恰相反，這種運動却是個人的完備奴隸地位和完全失去個性的表現。

混亂是從把自己解體的特權中解放出來的市民社會的規律，而市民社會的混亂則是現代的公法秩序的基礎，猶如這種公法秩序是這種混亂的保障一樣。它們之間的相互制約情況達到如何密切程度，它們之間的彼此對立就處於怎樣嚴重程度。

馬克思通過對猶太人問題的這一批判，在批判黑格爾的法哲學方面前進了一大步。如果說黑格爾把國家置於社會之上，那末馬克思則認為，實際上是社會高於國家。馬克思援引發達的資產階級社會和發達的現代國家證明了這種情況。他指出說，在古代和封建時代，同在現代一樣，社會都是國家的必然基礎，而國家並不是社會的必然基礎。但是，只是到了現代，才使社會和國家之間的对立簡化到和同時又深化到必須在社會力量的有意識組織內加以解決的地步。這種有意識組織大力消滅社會混亂和國家強制之間的矛盾，並在使人成了統治他的生活源泉的主人以後，把人解放出來。馬克思發表在《德法年鑑》上的兩篇文章，包括着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有發展前途的萌芽。

後來，馬克思再也沒有去研究猶太人問題本身。他對於這個問題所能發表的意見，都完全無遺地說出來了。從此以後出現的猶太人問題的文献，真是汗牛充棟，可是沒有一個在內容上超過馬克思的，而是恰恰相反，一直在思想方面落后於馬克思的這篇文章。馬克思與反猶太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因為他不僅确切指出什麼

东西使犹太人有直接权利要求政治解放和享用一般人权，而且也证明了为什么犹太人有这种权利。况且，他又说道：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解放，但是无论如何，在迄今为止存在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然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与亲犹太人主义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亲犹太人主义喜欢用哥·埃·莱辛的《智者纳旦》中的几句美丽的诗来抵制反对爱财犹太的一切批判。马克思与此相反，他把犹太看作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个产物有它的一定的历史形式，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并随这种条件的消失而灭亡。历史的发展把犹太变成金钱势力的体现者，变成必然要解体的最反对社会的因素。它对于这一变化虽然没有责任，但并不是没有参加变化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犹太就要解体；这种社会所围绕迴转的中心已经不是金钱的上帝，而是劳动的太阳。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概括马克思当时对犹太人问题发表的意見，那末，他的研究结果是說：同工人的人类解放一样，同妇女的人类解放一样，犹太人的类解放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是可能的。

### 第三节 恩格斯的論文

像马克思研究法国革命一样，恩格斯从英国工业的研究当中找到和发现了自己对于当时的斗争和意向所持的疑問的解决办法。恩格斯认为，使人贫困、下贱、野蛮和处于奴隶地位的，只是与人异化的财产的不可遏止的运动；然而他也认为，财产在对一切私人利益发生破坏作用的时候，就为我们这一世紀的偉大变革，即为人与自然界和自己本身的和解开辟着道路。

恩格斯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綱》中，把从亚当·斯密

开始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自由贸易学说，称为目前在一切领域都同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地位的伪善和不道德。研究私有制的规律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比重商主义<sup>①</sup>的学说前进了一步；但是，它畏于最后的进步，没有提出私有制具有什么合理性的问题。因此，它不能战胜重商主义学说；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彻底性，也必然对它的各组成部分发生影响。在新经济学家的伪善的人道主义精神后面，掩藏着旧经济学家所不知道的野蛮；旧经济学家的概念混乱，比起新经济学家的虚伪逻辑来，还算是单纯性和彻底性的典范；拥护贸易自由的人物，是比旧重商主义者本身还坏的垄断分子。既然他们无法理解李斯特为什么要恢复重商主义体系，所以联系仍然是很简单的。“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就要进步到自由哲学一样，贸易自由不造成垄断的恢复，就要造成私有制的消灭。”<sup>②</sup> 在一切纯经济问题的争论当中，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批判了重商主义者；而当他们同私有制的反对者争论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正如英国社会主义者早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的那样，反对私有制的人士也能够从经济观点出发更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

恩格斯从这个总的观点出发，研究了各个经济范畴，其中包括商业、价值、价格、地租、资本、劳动、竞争等等。恩格斯揭露了这些范畴的不可调和矛盾，但是没有像蒲鲁东那样，把它们作为可以用来同政治经济学家进行争论的前提提出来；相反地，他证明这种矛盾是私有制的合乎逻辑的表现。尽管布鲁诺·鲍威尔在批判神学时十分尖锐，但是他仍然没有走出神学前提的范围；同样地，蒲鲁

① 重商主义——一系列欧洲国家为了加速国内的资本积累而实行的经济政策，以及十五至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学派（威·斯塔福德、托·曼等人）。重商主义者把财富和货币等同起来，不是到生产过程中而是到流通过程中寻找财富的泉源。——俄译本编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9页。

东虽然十分强烈地批判了私有制，可是他仍被来自私有制的一些经济学概念所束缚。像马克思在自己的论文里打破了问题的神学界限一样，恩格斯在这里冲破了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并使它回到普遍的、纯粹的人类的基础。

在重商主义体系下，商业公开地暴露自己的卑鄙的贪婪。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商业变得人道了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因为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同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关系越友好，买卖越有利。“伪君子叫道：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壟断的野蛮吗？……难道我们没有使各民族和睦起来并减少了战争吗？不错，这一切你们都做了，但是你们是怎样做的呢！你们消灭了小的壟断，为的是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壟断，即私有制能够更自由地更漫无止境地发展起来；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为的是夺取新的天地来施展你们的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结为兄弟（但是是盗贼兄弟），你们减少了战争，为的是在和平时期发更大的横财，为的是使个别人之间的仇恨和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sup>①</sup>但是，还不止于此！当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竭尽全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来使仇恨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利害相同而互相吞噬的凶恶野兽（竞争者不是凶恶野兽又是什么呢）以后，即在做完这个准备工作之后，只要再前进一步——使家庭解体，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它是利用自己的巧妙发明，即工厂制度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它通过这个制度，把共同利益的最后残余，即把家庭的财产共有制破坏了。恩格斯指出当时已经至少在英国常见的普遍现象：小孩子一到九岁，从而刚刚能够劳动，就靠自己的工钱过活，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要收店费的小客栈，向父母支付一定数量的膳费和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2页。



宿費。

然而，恩格斯发现地主也不比商人好。“他靠壟断土地进行掠夺。他利用人口的增长来进行掠夺，因为人口的增长加强了竞争，从而抬高了他的土地的价值。他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和完全偶然地落到他手里的东西当做他个人利益的泉源以进行掠夺。……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把土地当作买卖的对象就是走向自我买卖的最后一步；这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那样不道德，只有自我买卖的不道德才能超过它。”<sup>①</sup> 恩格斯说，认定地主的发财方式是掠夺的公理，亦即确认人人都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的公理和确认不耕者不得收获的公理，并不是我们的主张。第一个公理没有包括抚育子女的义务；第二个公理剥夺了每一代人的生存权利，因为每一代人都得继承前一代人的遗产。相反地，这两个公理都是从私有制产生出来的结论。要末实现私有制所产生的一切结论，要末放弃私有制这个前提。

私有制分化出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没有人耕作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是土地。私有制又把人的活动分成劳动和资本，并使两者彼此敌对。但是，土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斗争还不够充分，所以私有制又把其中的每一因素加以细分和割裂。结果，一块土地同另一块土地对立，一个资本同另一个资本对立，一个劳动力同另一个劳动力对立。换句话说，由于私有制把每一个人孤立在他自己的粗鄙的独特状态中，又由于每一个人都与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害关系，所以地主敌视地主，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正是由于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这个峰极的顶点。“竞争是经济学家的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9页。

主要范疇，是他最寵愛的女兒，他始終愛撫着她，但是請看，在這裡出現的是一張什麼樣的美杜莎<sup>①</sup>的怪臉。”<sup>②</sup>

恩格斯首先證明，競爭中包含的矛盾同私有制的矛盾完全一樣，即競爭中包含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尖銳矛盾。每一個單獨的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而社會則關心每個人所占有的要與他人相等。因此，每個人都想取得壟斷地位，可是社會本身却要受到壟斷的害處，從而必須消滅壟斷。競爭早就要求壟斷，即早就要求財產的壟斷，於是只要財產的壟斷存在一天，壟斷權也就同它一樣是合理的，因為既要出現壟斷，壟斷就是一項所有權。可見，攻擊小的壟斷，保留根本的壟斷，這是多么可憐的不徹底呵！

競爭的規律是：供給和需求始終力圖彼此相適應，可是正因為如此，它們從來不會完全達到這個目的。如果供不應求，價格就要上漲，供給就要受到刺激。只要市場上的供給增加，價格就會下跌；而如果供過於求，價格又要急劇回落，以致重新刺激需求。“情況總是這樣；從未有過健全的狀態，總是興奮和消沉相更迭（這種更迭排斥一切進步），永無止境地搖擺不定。這個規律永遠起着調節的作用，它能使在這裡失去的又會在那裡得到補償，因而經濟學家非常欣賞它。這個規律是他最大的榮譽，他簡直不可能把它看個夠，甚至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情況下都要細細地看它。然而很明顯，這個規律是純自然的規律，而不是精神的規律。這是一個孕育着革命的規律。經濟學家用他那絕妙的供求理論來證明‘生產絕不會過多’，但是實踐卻用商業危機來駁斥他，這種危機就像慧星一樣有規律地反復出現，在我們這裡現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發生一次。近八十多年來，商業危機像過去的大瘟疫一樣按期來臨，而且它所造成的悲慘現象和不道德的後果比瘟疫所造成的

① 希臘神話中的一個蛇髮女妖。——中譯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1—612頁。

更大……当然，这些商业革命证实了这个规律，完完全全地证实了这个规律，但是它并不是用经济学家所用的那种方式证实的。我們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周期性的革命才能给它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彼此都分担一部分，那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的危机的倾向了。如果你们是像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而不是像那些连类意识也没有的分散的原子那样，那末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了的无根据的对立。但是只要你们继续照目前这样无意识地毫不思考地全凭偶然性来进行生产，那末商业危机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因而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样就必然会更多的使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sup>①</sup>

竞争，即资本同资本、劳动同劳动、土地同土地之间的斗争，使生产陷入热病状态，以致生产的一切自然的和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也就是说，凡是卷入竞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的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竞争。“一方面这样过度紧张，结果他方面必然会削弱。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反而无以为生，人们恰恰因过剩而饿死。长时期来英国就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处于这种荒谬绝伦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摇摆得更加厉害（这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那末就会出现繁荣和危机、生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3—614页。

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经济学家从来就不能够理解这种怪诞现象；他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就编造了一套人口论，这种理论和贫富并存的矛盾同样荒谬，甚至比它更荒谬。”<sup>①</sup>人口论以马尔萨斯<sup>②</sup>表述的典型形式得到推广，并且成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但是，恩格斯在开始评述人口论之前，认为自己应当说明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这个事实“比宗教中的一切奇迹的总和更不可思议”，它就是一国人民正是由于富裕和过剩而饿死。

恩格斯说，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无限地提高。根据最稳健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计算，“人口过剩”的大不列颠在十年内，就能使粮食的产量达到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所需的程度。资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要是让竞争自由发展下去，生产能力虽然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是在对立的情况下起作用。一部分土地在实行精耕细作，而另一部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3,000万英亩好地——却荒蕪着。一部分资本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周转，而另一部分却死死地躺在箱子里。一部分工人每天得工作十四小时至十六小时，而另一部分却无事可干，无工可做，活活饿死。这种对立情况也可能不同时出现：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到处是一片忙碌景气，资本以惊人的速度周转着，农业欣欣向荣，工人干得筋疲力尽；而明天停滞到来了，农业得不偿失，大片土地荒蕪了，资本在运动得最紧张的时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6页。

②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牧师，反动的政治经济学家，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的创始人，即所谓马尔萨斯主义的创始人。——俄译本编者

突然停頓下来,工人无事可做,整个国家都因财富过多、人口过剩而备尝痛苦。”<sup>①</sup> 尽管說明这种现象极其简单,可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却不敢承认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就不得不放棄全套光輝夺目的竞争学說。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沒有放棄竞争学說,而试图利用人口論摆脱窘境。馬尔薩斯断言,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資料,人类生来就有繁殖快于它所支配的生活資料的增長的不变趋势。根据这个假定,人口是按照几何級数(1:2:4:8:16:32……)增加的,而土地的生产力只是按照算术級数(1:2:3:4:5:6……)增加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經常的人口过剩是一切貧困和所有罪恶的根源。它由此得出下述仁慈的結論:賑济穷人是犯罪,因为这会加强过剩人口的增長;相反地,把貧穷宣布为犯罪,把习艺所变成監獄,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却是极其有益的。的确,这种理論很不符合聖經上关于上帝及其創造的完美无缺的教义,但是,篤信上帝的英国資产階級却认为,“把聖經拿来和事实相对抗的反駁,那才是最拙劣的反駁!”

恩格斯怀着憤怒的心情,对于这种“卑鄙下流的学說,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的誣蔑”进行了痛击。他問:在什么地方証明了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按照算术級数增加的呢?恩格斯同这种空口无凭的論断相反,他注意到十九世紀农业仅仅由于一門化学,甚至仅仅由于亨弗利·戴維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二人而获得的成就。当地球上的全部土地才被耕种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取現在已經是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談論什么人口过剩,这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馬尔薩斯犯了两个錯誤。首先,他忽略了一个事实,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6—617頁。

即人口过剩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有联系；研究这个事实，一定会对情况得到正确的理解。其次，马尔萨斯把生活资料 and 就业手段混为一谈了。马尔萨斯实际证明的，是另外一个事实，不过这一事实的被证明，却是他的功绩。实际上，他证明了人口总是威胁着就业手段；劳动力的生产迄今一直受着竞争规律的调节，所以也受到周期性危机和波动的影响。

尽管自由主义的人口论毫无根据，但是恩格斯却承认它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它为社会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论据。“由于这个理论，我们才开始明白人类极度堕落的情况，才了解这种堕落是和竞争的各种条件相关联的；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取决于需求；它指出竞争制度因此屠杀了，并且每日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sup>①</sup>

恩格斯在考察竞争怎样影响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首先，土地或资本都比劳动强，因为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所有者可以靠地租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来生活。因此，工人所得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些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所瓜分。此外，在市场上较强的工人排挤较弱的工人，较大的资本排挤较小的资本，大土地排挤小土地。实践证实了这个结论。大家都知道，大厂主和大商人比小厂主和小商人占优势，大土地占有者比只有一摩尔根<sup>②</sup>土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1页。

② 德国的土地面积单位，指一副犁在一个上午所能耕出的土地面积，一般在0.26—0.36公顷之间。——中译者

的人占优势。其结果就是：在普通情况下，按照弱肉强食的道理，大资本和大土地并吞小资本和小土地，就是说，产生了财产的集中。在商业危机和农业危机时期，这种集中就进行得更快。一般说来，大的财产比小的财产增长得更快，因为前者的占有费用只占收入的很小的一部分。这种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它同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阶级必然愈来愈多地被消灭，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任何法律，任何地产的分割，任何偶然的资本的分裂，都无济于事……”<sup>①</sup>同垄断引起竞争一样，自由竞争又引起垄断；要想走出这种窘境，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消灭确立这两者的原则，即消灭私有制。

竞争贯穿到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它不但支配着人类在数量上的增长，而且也支配着人类在道德上的发展。“凡是稍微熟悉犯罪统计的人都会看出，犯罪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年年增长着，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这种规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竞争支配，证明社会产生了犯罪的需求，这个需求要由相应的供给来满足……”<sup>②</sup>姑且不谈别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惩治罪犯究竟会公正到什么程度，恩格斯请读者自己去判断。他证明竞争已经扩展到了道德领域，并只想通过这一点来表明私有制已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最后，恩格斯指出说，在目前条件下，土地和资本在它们反对劳动的斗争中，还有一个强大的同盟者，那就是科学。“例如，几乎一切机械发明都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引起的，哈格里沃斯、克伦普顿和阿克莱发明棉纺机尤其是如此。劳动需求的急剧增长总会引起发明的出现，这些发明大大地增强了劳动力量，因而就降低了对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22—62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623—624页。

的劳动的需要。1770年以来英国的历史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棉纺织业中最近的重大发明自动纺纱机，就完全是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的提高而引起的；这个发明使机器做的工作增加了一倍，从而减少了一半的手工劳动，使一半工人失业，因而也就降低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这个发明破坏了工人们对于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和资本坚持作实力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sup>①</sup> 经济学家们，说什么归根到底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因为机器能够降低生产费用，为自己的产品开辟新的更广大的市场，从而能使失业工人重新就业。恩格斯反对这种说法，并援引也是由经济学家们确定的一个规律加以证明。根据这一规律，劳动力经常威胁着就业手段。所以上述的有利情况即使必然出现，也一定要变成泡影，因为寻找工作的过剩竞争者仍要等待就业；然而不利的情况，即一半工人突然被剥夺生活资料，另一半工人的工资下降，却决不能成为虚构。

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另一篇文章，即对于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书的评述，同上述这些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内容的论点具有密切的联系。恩格斯首先以显明的线条勾画出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精神贫困的图景；他把大陆上据以判断英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有教养的英国人，称为世界上最卑鄙的奴隶，他们满脑袋偏见，特别是宗教偏见。“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sup>②</sup> 恩格斯说，当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流传到英吉利海峡的这一边的时候，没有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敢于翻译这本书，也没有一个著名的出版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4页。

② 同上书，第628页。



敢于印行这本书。“結果有一个社会主义的 lecturer (德文没有一个字能够表达这个鼓动家的专门术语), 即一个非上流社会出身的人把它翻译出来了, 一个社会主义者小出版商把它印成单行本, 每本一辨士; 曼彻斯特、伯明翰和伦敦的工人却是施特劳斯这本书的唯一的英国读者。”<sup>①</sup> 恩格斯认为, 在由有教养的英国人构成的两个政党当中, 托利党对于事物具有比较公正的观点。比如, 托利党认为工业至少是不可避免的灾难, 因为工业破坏了这个党的威力和专政; 而辉格党则认为使它掌握了政权和发财致富的工业无可非议, 把发展工业看成全部立法工作的唯一目的。托利党的一些慈善家, 比如艾释黎勋爵、弗兰德、瓦尔特、奥斯特勒等人, 承担了维护工厂工人不受厂主压迫的责任。托马斯·卡莱尔起初也是托利党人, 而且在他同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关系方面, 他始终比较靠近托利党。一个辉格党人, 永远也不会写出一本能像《过去和现在》这样哪怕是只有一半关心人的书来。在1843年英国出版的书籍中, 这是唯一值得阅读和唯一能够动人心弦的一本书, 它叙述了人们的关系, 为自己留下了人的思想方式的痕迹。

卡莱尔的这本书, 是十二世纪英国和十九世纪英国的对照。它用最忧郁的目光观察了现在, 用被痛心的耻辱激起的鲜明笔触描绘了现在。它用非常令人震惊的具有先见之明的语言愤怒地威胁现在。寄生的土地占有者贵族, “连安分守己都没有学会, 至少还没有学会不做坏事”; 实业贵族沉溺于崇拜玛门<sup>②</sup>, 与其说他们是一群领导劳动的人和“工业司令官”, 不如说他们是一伙工业强盗和海贼; 议会是贿选产生的; 遵循单纯直观和无所作为的处世哲学; 宗教遭到破坏, 日益瓦解; 一切人类共同的利益, 都彻底崩溃; 对真理和人类普遍感到失望; 一切生活关系一团混乱, 纠缠不清;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629页。

<sup>②</sup> 财神或利欲之神的意思。——中译者

进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数多得无法计算的工人阶级，处在难以忍受的被压迫和贫困状态，非常不满和痛恨旧的社会制度，结果威风凛凛的民主主义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到处紊乱不堪，没有秩序，出现无政府状态，旧的社会联系瓦解，处处精神空虚，没有思想和实力衰退，——这就是卡莱尔描写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状况。卡莱尔承认，没有什么万应灵药可以医治社会弊端，或用卡莱尔的原话来说，没有“莫里逊氏丸”<sup>①</sup>。

在这一方面，恩格斯是同意卡莱尔的意见的，不过不是没有保留的。他写道：“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最后结论，还在开莫里逊氏丸的药方，它就远不是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不足取，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就已经知道了；结论如果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但结论在一定时期应当有一定的形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摆脱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应当形成明确的思想，这样一来，这些结论就一定会采取‘莫里逊氏丸’的形式，至少在像英国人那样纯经验的民族手里会是这样。”<sup>②</sup>接着，恩格斯解释了英国的怀疑论。一切英国哲学思想的结论，是承认它们无力解决自己最终必然遇到的矛盾。因此，一方面在恢复信仰，另一方面又信赖纯粹实践，对形而上学毫无兴趣，等等。在卡莱尔的全部狂想曲中只字未提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是纯粹实践家，所以他们提出了建立国内移民区<sup>③</sup>等类似莫里逊氏丸的办法。他们的哲学

① 当时英国流行的一种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卖药，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8页。

——中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2页。

③ 国内移民区(Home-Colonies)是欧文给自己的示范性共产主义公社起的名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35页注释190。——中译者

是純粹英國的懷疑論哲學，也就是說，他們不相信理論，而在實踐中遵循唯物主義，他們的整個社會綱領，就是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他們是片面的，然而卡萊爾也是片面的。無論是社會主義者，還是卡萊爾，都只是在矛盾的範圍內克服矛盾的：社會主義者在實踐的範圍內，卡萊爾在理論的範圍內，克服了矛盾。他們雙方所缺乏的，是對於德國哲學的知識。恩格斯希望英國的社會主義者自己去認識德國哲學；不可以急于把德國哲學強加於他們的身上，德國哲學在最初時期還不會對他們有很大好處。但是恩格斯也認為，卡萊爾只要前進一步，就能夠克服他所陷入的矛盾，不過德國的全部經驗證明，這是很難走的一步。

卡萊爾宣稱，只要人類還在堅持無神論，還未重新得到自己的“靈魂”，那末一切都是無益的，都是沒有效果的。卡萊爾所理解的無神論，不是不相信人格神，而是不相信宇宙的內在本質及其無限性，不相信理性；他不是反對不相信聖經的啟示，而是反對“不相信世界史的聖經這一种最可怕的不相信”。他是斯賓諾莎、歌德和青年時期謝林一類的泛神論者。他的未來的宗教，以歌德為預言家，以勞動為崇拜對象。卡萊爾的泛神論，是宗教的最後形式，但這仍然是宗教，因為他還未能擺脫二元論，繼續承認某種比人本身更高超的存在。根據這個理由，卡萊爾所相信的只是民主主義的暫時勝利，而不是民主主義的永久勝利。卡萊爾說，千百萬勞動者由於渴望生活，正拋棄冒牌的領導，並且在某個時期內還會相信沒有領導者也成。但是，這個期間很短，只能持續一剎那。偉大的任務還沒有解決。這項任務就是由人類的真正領袖，即由“工業司令官”、英雄和好人來領導人類。如果由這些人領導，就可以使必然的民主主義同必要的主權并行不悖。

針對卡萊爾的這種意見，恩格斯提出了布魯諾·鮑威爾和費爾巴哈獲得的研究結果。恩格斯說，卡萊爾的控訴是正當的，但只

是控訴并無濟于事。要想消除弊端，就得找出弊端的原因。如果卡萊爾這樣做了，他就會發現他所指責的無神論和無靈魂，都是以宗教本身為基礎的。宗教，按其本質來說，就是剝奪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內容，把它轉給彼岸之神、即來世之神的幻影，然後彼岸之神再大發慈悲，把一部分恩典還給人和大自然。“我們也反對現代基督教世界秩序的偽善；我們唯一迫切的任務歸根到底就是同它進行鬥爭，使我們和世界擺脫這種偽善；但由於我們是隨着哲學的發展來認識這種偽善，是在科學的基礎上來進行鬥爭的，因此這種偽善的本質對我們來說，就不像卡萊爾設想的那樣不可捉摸，不可理解。我們把這種偽善也歸咎於宗教，因為宗教的第一句話就是謊話；宗教一開頭向我們說明某種人的事物的時候，不就把這種事物說成某種超人的、神的事物嗎？但我們知道，所有這些謊話和不道德現象都來源於宗教，宗教偽善、神學又是其他一切謊話和偽善的藍本，所以我們就有理由像費爾巴哈和布·鮑威爾破例做的那樣，把當代一切謊話和偽善都叫做神學。如果卡萊爾願意了解毒化我們一切關係的不道德現象產生的根源，那就請他讀一下費爾巴哈和布·鮑威爾的著作吧。”<sup>①</sup>恩格斯又補充說，宗教產生的一切可能性都沒有了；不可能創立一種像泛神論的英雄崇拜或勞動崇拜的新宗教，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這種宗教上面。繼基督教之後，不可能再出現任何一種宗教。泛神論也不可能產生，泛神論本身就是基督教的產物，它同自己的前提是分不開的，費爾巴哈也證明了這一點。

恩格斯也想推翻卡萊爾描述的那種無神論，但是使用了另一種方法：他把人由於宗教而失去的內容歸還給人，不過所歸還的已經不是神的內容，而是人的內容了，所以整個歸還過程不外是喚起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8--649頁。

人的自覺。人的和大自然的事物妄想成為超人和超自然的野心，是一切虛偽和謊話的根源。“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永遠向宗教和宗教觀念宣戰，毫不顧及別人會給我們扣上什麼無神論或者別的帽子。同時，假如卡萊爾對無神論下的泛神論定義是正確的，那末真正的無神論者就不是我們，而是反對我們的基督徒。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進攻‘宇宙的永恒內在事實’；相反地，只有我們才認真地論證了這些事實，證明它們是永恒的，使其不受自相矛盾的上帝的萬能任性的危害。……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懷疑或輕視‘歷史的启示’；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任何一個哲學學派，甚至比黑格爾，都更重視歷史；在黑格爾看來，歷史不過是檢驗他的邏輯結構的工具。

輕視歷史，無視人類的發展，這完全是对方的罪過，仍然又是基督徒的罪過；他們編造了一部奇特的《天國史》，否認真實的歷史具有任何內在意義，只承認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杜撰出來的歷史具有這種意義。他們硬說人類是基督創造的，說歷史有一個虛幻的最終目的，而且這個目的已經由基督所實現；他們割斷了歷史，因此為了自圓其說，他們聲言後來的18個世紀完全是胡說八道。我們要求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但我們認為歷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並且只能是人的启示。為了認識人類本質的偉大，了解人類在歷史上的發展，了解人類一往直前的進步，了解人類對個人的非理性的一貫有把握的勝利，了解人類戰勝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類同大自然進行的殘酷而又順利的鬥爭，直到具備自由的人的自覺，明確認識到人和大自然的統一，自由地獨立地創造建立在純人類道德生活關係基礎上的新世界……我們沒有必要首先求助於什麼‘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偉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歸在它的名下。……卡萊爾大為不滿的現代的無神性恰好是現代的有神性。……歷來總是提出這樣的問

題：神是什麼？德國哲學這樣回答問題：神就是人。人只須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為衡量一切生活關係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質去估價這些關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據自己本性的需要，來安排世界，這樣的話，他就會猜中現代的謎了。……

這些在‘預言家’歌德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凡是睜着眼睛的人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讀到這些。歌德很不喜歡跟‘神’打交道；他很不願意聽‘神’這個字眼，他只喜歡人的事物，而這種人性，使藝術擺脫宗教桎梏的這種解放，正是他的偉大之處。在這方面，無論是古人，還是莎士比亞，都不能和他相比。但只有熟悉德國民族發展的另一方面——哲學的人，才能理解這種完滿的人性、這種克服宗教二元論的全部歷史意義。歌德只是直接地——在某種意義上當然是‘預言式的’——陳述的事物，在德國現代哲學中都得到了發展和論證。”<sup>①</sup>

從對卡萊爾觀點的內部的宗教方面所做的這一批判當中，就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出，恩格斯考慮到卡萊爾觀點的外部的政治—社會方面，考慮到卡萊爾的英雄崇拜和與此有關的其他一切。恩格斯指出：“……似乎英雄碰到好時候會比人高出一頭。如果卡萊爾所了解的人是真正的人，具有無限性的人，他就不會再把人分成兩類——山羊和綿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貴族和平民，老谷和百姓；他就會發現天才的真正社會使命並不是用暴力去統治別人，而是去喚醒別人，帶動別人。天才應當說服群眾，使群眾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確，這樣就不必擔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夠實現，因為思想被掌握以後就會自然而然地實現。”<sup>②</sup>當然，卡萊爾把民主主義稱為過渡階段，他是正確的。不過，只有一點同他的見解相反，那就是這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9—652頁。

② 同上書，第652—653頁。

种过渡阶段不是向新的改良的贵族制度，而是向真正的人类自由过渡的阶段；同样地，当代的非宗教性，最终将使时代完全摆脱一切宗教的、超人的和超自然的事物，而不是恢复这一切事物。

恩格斯在结束他的这两篇论文的时候，都谈到不久以后就要详细研究工厂体系，研究英国的状况及其核心——工人阶级。《德法年鉴》的天折，未能使他按原来拟议的形式实现自己的诺言，而是后来用另一种方式履行了这项诺言。

#### 第四节 《神圣家族》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继续他们已在《德法年鉴》开始的制订自己的正确世界观的工作以前，首先联合起来去完成他们的第一部合作著作，以便批判地分析德国的唯心主义，因为德国的唯心主义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代表人物，比如布鲁诺·鲍威尔和柏林的“自由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都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自己的论文，而开始经常通信，恩格斯并在1844年9月到巴黎去了数天，同马克思会见。1845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以《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书名，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合著出版的一书的序言，注明的就是这个月份。这部书在表面上同《德法年鉴》没有任何联系，但根据它的实际内容来看，它完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上述杂志勾出轮廓的思想体系有关系。在一定程度内，这部书是对他们达到的新观点的巩固性和可靠性的首次实际考验；如果经得起考验，当然会使这个观点得到一些新的立脚点。

两位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说，《神圣家族》的目的，是向广大的读者揭破思辨哲学所制造的幻想。他们写道：“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

它用‘自我意識’即‘精神’代替現實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傳播者一道教誨說：‘精神創造眾生，肉体則軟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脫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像中才具有精神力量。鮑威尔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駁斥的东西，正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現出来的思辨。我們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則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則的最終目的就是要通过变‘批判’本身为某种超經驗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sup>①</sup>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叙述，是专对《文学总汇报》<sup>②</sup>月刊头八期进行的。这个杂志是布魯諾·鮑威尔同他的弟弟埃德加尔·鮑威尔以及尤·法赫尔（Julius Faucher）、恩·荣格尼茨（Ernst Jungnitz）、施里加（Széliga）等人，在沙洛頓堡由1843年12月开始出版的。

在这个杂志里，柏林的“自由人”试图論証他們的世界觀，研究影响过当代生活——宗教和哲学、基督教和犹太教、赤貧現象和社会主义、英国工业和法国革命——的一切重要現象的历史作用，并对这一切現象作出絕對自我意識的判決和进行批判的批判。杂志的綱領有一部分包含在布魯諾·鮑威尔的下述理論当中：“到現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偉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沒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們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喚起了群众的热情。換句話說，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慘的結局，是因为作为它們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觀念：它必須滿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采。”<sup>③</sup>“精神”和“群众”之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頁。

② 《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德国资产階級民主派的月刊，由布·鮑威尔同他的弟弟埃·鮑威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政論家（法赫尔、荣格尼茨、施里加——弗·齐赫林斯基的笔名——等人），从1843年12月到1844年10月在沙洛頓堡出版，曾載文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俄譯本編者

③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2頁。



間的对立,像一条紅綫貫串着整个《文学总汇报》。这个杂志宣称:  
“現在精神已經知道它應該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唯一的对头,——  
就是要到群众的自我欺騙和萎靡不振中去寻找。”<sup>①</sup>

在某些方面,这个观点同一些偉大的空想主义者所依据的观点相似。像法国革命这种似乎把世界弄翻天了的群众运动,都遭到了失敗,最后以建立唯利是图家伙們的最鄙俗专政而告終。精神的一切进步,迄今为止都是損害群众的进步,使群众陷入每况愈下的非人境地。在一定意义上,傅立叶和欧文也是对被动的群众持有主动的精神的代表人物。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傅立叶和欧文所处的环境是发达的資产階級社会,而鮑威尔和他的追隨者們,則生活在封建落后的和鄙俗不堪的社会里;前者是两位实事求是的實踐家,而后者則是一伙德国哲学家;前者以法国的唯物主义为根据,而后者則立足在德国的唯心主义上面;前者研究现实社会的基础,研究人同工业和大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則把想象出来的精神看成想象出来的历史的指导者。

《文学总汇报》对当时的一切“群众”运动所做的判断,其否定态度同它的荒誕程度是相等的。这个杂志对英国工业和法国革命,都同样沒有好感。西欧各文明民族的生活和活动,或多或少都是它的厌恶对象。然而,甚至在德国的条件下,这个杂志都是极大的退步。它不仅拒絕費尔巴哈已經获得的成果,而且也把黑格尔哲学弄成一幅可悲的漫画。黑格尔在使絕對精神作为总是事后才进入哲学家意識中的具有創造力的世界精神时,实际上只是为了使人注目,专指絕對精神在思辨的想像中創造历史而言。同时,黑格尔坚决反对据說哲学家个人就是絕對精神本身这种不正确的解釋。鮑威尔和他的追隨者們与此相反,他們認為自己是批判的化

---

①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頁。

身，是絕對精神的化身，絕對精神通過他們有意識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同其餘的人類對立。如果說黑格爾哲學是關於神統治世界、精神統治物質的基督教德意志信條的思辨表現，那末，《文學總匯報》就是批判的漫畫，在這幅漫畫里，黑格爾哲學本身把自己弄到荒誕無稽的地步。黑格爾哲學的觀點失去了支點，懸在半天空里，以致甚至在德國這樣哲學空氣濃厚的國家里，它都非常迅速地揮發逸散了。《文學總匯報》沒有出滿十二個月號，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機會在《神聖家族》的結語里預言該報的滅亡。

因此，《神聖家族》剛一問世，就受到了非難，說它敘述了一些人所共知而又無人反對的事情。盧格給《神聖家族》作者的一位朋友寫信說：“可惜，《文學總匯報》不是直布羅陀”。後來，他又大放厥詞，說兩位作者射出“一股惡毒而又下賤的攻擊的滾熱水流”，用此“燙傷了”自己的以前的最親密朋友。其實，這本書既不惡毒，又不下賤，而且也不是背棄曾把恩格斯和馬克思與布魯諾·鮑威爾聯繫起來的昔日友誼。書中絲毫沒有對於鮑威爾兄弟進行人身侮辱的地方，它只是拿他們的政論著述活動為例，來論證唯心主義哲學的徹底破產。兩位作者滿有這種權利，因為《文學總匯報》經常挑戰，反對馬克思在《萊茵報》和《德法年鑑》上所做的面向實際生活的轉變；它毫無道理地過於自命不凡，想盡一切辦法幫助三月革命以前的反動勢力，甚至對於書報檢查制度和行會制度表示好感。

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向鮑威爾兄弟應戰，是準備性的地基清理工作。他們在共同參加這場論戰之前，都各自獨立地寫了一些文章，每人希望在這篇文章里敘述自己的正確世界觀，從而表明自己對於最新的哲學學說和社會學說的正确態度。今天的讀者往往會把這場論戰看成微不足道的小事，特別是對批判榮格尼茨、施里加和其他現在已被遺忘的批判的批判的名家的部分，讀者有時產生敘述冗長使人疲倦的感覺。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經常使用

的那种简短尖锐的批判技巧，在他们的这部第一本合著作品里，还不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但是，为了躲避德国的书报检查，而必须扩大篇幅，把书的页数排足二十印张，这或许使两位作者过于详述细节了。在其他条件下，他们是非常不喜欢这种办法的。在书中的某些地方，好像有青年人的过于自信的口气，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下贱的恶毒笔调或类似的东西。当他们那一代人已经老了而早被人们遗忘的独身汉布鲁诺·鲍威尔逝世的时候，恩格斯成了唯一的能够在颂德的行状上对死者的实际功绩进行正确评价的人。

据说《神圣家族》“叙述了一些人所共知而又无人反对的事情”，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证明唯心主义哲学所处的退化状态，指出这些哲学甚至在语言和风格方面都在变坏，这还是该书的最小功劳。主要的东西是书里已经光辉夺目地射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战方面表现的另一个特点，这就是能够产生实效的精神。这种精神用确凿的事实打击唯心主义的调言，它在破坏的同时又进行建设，在摧毁的同时又进行创造。比如，马克思精简扼要地叙述完法国的唯物主义以后，接着就拿法国唯物主义的“世俗的群众的历史”同布鲁诺·鲍威尔的几句批判言词做了对比。恩格斯在反驳尤利乌斯·法赫尔的论战中，从应有的历史观点出发，阐述了英国的大地产、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汹涌澎湃的阶级斗争。同时，恩格斯也很少“叙述一些人所共知而又无人反对的事情”，以致他甚至都没有能够唤醒德国知识分子的沉睡了的情感。马克思在阐述法国革命的事件，以反驳布鲁诺·鲍威尔关于法国革命是“十八世纪的实验”的高傲言词时，情况也是这样。

在《神圣家族》的这些章节里，也像在反驳布鲁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观点的其他章节里一样，马克思扩大和深化了他早在《德法年鉴》中发挥的思想。前面已经说过，根据布·鲍威尔的主要论点，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

就是不成功的和沒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們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喚起了群众的热情，或者是因为作为它們的基础的思想必須指望博得群众的喝采。馬克思在反駁这个論点时說：“‘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了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認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現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錯觉构成傅立叶所謂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調。資产階級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經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裝飾自己的搖籃的‘热情’之花也已經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順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侖的劍，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只有对那样的群众來說革命才是‘不成功的’，这种群众的政治‘观念’并不是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的观念，所以他們的真正的主导原則和革命的主导原則并不是一致的，他們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資产階級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sup>①</sup> 革命所以是不成功的，是因为革命在本質上未超出他們的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沒有包括全体居民在內的有限的和特殊的群众；也就是因为对不同于資产階級的絕大多数群众來說，革命的原則并不代表他們的实际利益，而只是一种“观念”而已。

恐怖主义者的錯觉在于：他們打算按照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古代国家的样式，建立以資产階級社会为基础的現代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認和批准現代資产階級社会，即工业的、籠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滿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想在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頁。

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締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錯誤！”<sup>①</sup>拿破侖的錯覺在于：他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作司庫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屬。不管是恐怖主义者，还是拿破侖，他們都由于自己的錯覺而遭到复灭。后来，反革命重新进攻資產階級。“1830年自由資產階級終於實現了它在1789年的願望，所不同的只是他們的政治启蒙运动現在已經完成，他們不再把立宪的代議制国家看做国家的理想，不再認為爭得立宪的代議制国家就是致力于挽救世界和达到全人类的目的，相反地，他們把这个国家看做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做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確認。”<sup>②</sup>但是，“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的生命史，到1830年……还没有終止。”馬克思用这句极其有力的話，結束了关于法国革命的一节。

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从这些和其他历史回顧中得出的結論，可以用概括的形式表述如下：“……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們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員彼此連接起来。他們之間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連接起来的不是国家（布魯諾·鮑威尔認為是国家——梅林注），而是如下的事实：他們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的想像这个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在实际上他們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他們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sup>③</sup>馬克思对于布魯諾·鮑威尔輕視自然界和工业的观点，作了如下的反駁：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頁。

② 同上书，第158頁。

③ 同上书，第154頁。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論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認識嗎？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認識（比如說）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認識这个历史时期嗎？誠然，唯灵論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維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認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sup>①</sup>我們从这些論述中，已經看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茁壮幼芽。

在精神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另一方面仍然依存于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但是决不能把这种依存关系叫做盲从。毫无疑问，他們承認费尔巴哈的天才著作的价值，承認他为批判一切形而上学提供了偉大而高明的基础研究，用人本身代替了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識”在內的破烂貨，从而具有他的功劳。但是，他們通过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繼續前进，走向社会主义，通过抽象的人达到历史的人。他們以令人驚訝的敏銳洞察力，深入研究当时还乱作一团的西欧社会主义世界。他們揭穿了旧資产阶级借以自快的对社会主义献媚的秘密。他們指出，使人不得不接受施舍的人的貧穷和极度窘迫境遇本身，成了供金錢貴族和知識貴族享受的娱乐，作为滿足他們的私欲和表現他們的虛荣的对象而存在。比如，德国的許多慈善协会，法国的不少慈善团体，英国的无数唐·吉訶德式的慈善事业，如为賑济穷人举办的音乐会、舞会、义演和义餐，甚至为遭遇不幸的人进行的募捐，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頁。

都只能有这种意义。

在几位偉大的空想主义者当中，傅立叶对《神圣家族》的思想内容贡献最大。但是，恩格斯指出，傅立叶和傅立叶主义是不同的。他說道，《和平民主日报》所鼓吹的那种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不过是一部分以慈悲为怀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說而已。馬克思指出，“組織劳动”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口号，而是政治激进派的口号，这一派试图在法国实现政治和社会主义之間的妥协。两位作者都沒有停止強調的事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而偉大的空想主义者們从来沒有理解这一事实。埃德加尔硬說：“工人什么东西也沒有制造，所以他們也就一无所有；他們之所以什么都沒有制造，是因为他們的工作始終是为了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是平凡的工作。”恩格斯反駁这种胡說八道时說：“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沒有創造，工人才創造一切，甚至就以他們的精神創造來說，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証明了这一点。”<sup>①</sup> 布魯諾·鮑威尔凭空杜撰，把“精神”和“群众”对立起来，說什么两者之間彼此排斥。馬克思順便指出，空想主义者們的共产主义的批判，一开始就同广大群众的实践相符合，这便揭穿布·鮑威尔的臆造是毫无根据的。馬克思說：“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識的渴望、他們的道德力量和他們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sup>②</sup>

法国的无产阶级認为自己的最卓越代表就是蒲魯东，他的《什么是财产？》一书，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前哨。因此，蒲魯东的名字在《文学总汇报》里特別常見，可是这个杂志不仅沒有正确地評价蒲魯东，而且沒有正确地翻譯他的作品。正因为如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頁。

② 同上书，第107頁。

此，法国社会主义者中的这位无产者，便成了《神圣家族》特别仔细的批判注意的焦点。《神圣家族》中讨论蒲鲁东的章节，以及全书的绝大部分章节，都出于马克思的手笔。他热烈地拥护蒲鲁东，反对埃德加尔·鲍威尔对蒲鲁东进行的“漫骂性”批判。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捕风捉影的说法，说什么马克思原先信奉和崇拜蒲鲁东，而后来却又十分激烈地攻击起他来了。

其实，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不仅没有把自己和蒲鲁东等同起来，而是恰恰相反，拿他同布鲁诺·鲍威尔对比。埃德加尔·鲍威尔譏笑蒲鲁东，说他从平等的原则中找到了维护财产的一切证明的最后的合理根据，然而他却想从这一原则引导出财产的不可能性的结论。马克思对此反驳说，布鲁诺·鲍威尔才正是这样，因为他把“无限的自我意识”作了自己的一切论断的基础，甚至把这一原则看成福音的创造原则，而福音则由于自己的无限的无意识性，似乎是同无限的自我意识直接矛盾的。接着，马克思非常俏皮地指出，偏重实践的法国人用平等的原则所表达的东西，就是爱谈理论的德国人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所表达的东西。也就是说，德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以前，力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去铲除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而法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则力图用平等的原则去达到同样的目的。

布鲁诺·鲍威尔对于神学作了批判的分析，可是他始终站在神学的基础上；同样地，蒲鲁东对于政治经济学作了批判的分析，然而他也没有离开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巨大进步，是他首次对政治经济学的的一个基本前提，即对私有制进行了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同时也就是进行了科学的批判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们，一直把私有制看成确定不移的、不必再做任何深入研究的事实。诚然，经济学家们早就有时指出过像工资、价值等这类经济前提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同私有制的违反人性



的現實之間的矛盾，然而他們當時所攻擊的，只是私有制中的某種個別形式，比如攻擊偽造本來合理的（即他們認為合理的）工資或價值的行為。比如，亞當·斯密對於資本家的一些攻擊，西斯蒙第對於工廠制度的某些攻擊，李嘉圖對於土地所有制的若干攻擊，就具有這種性質。蒲魯東認真地對待經濟關係的合乎人性的外觀，並把它同經濟關係的違反人性的現實尖銳地對立起來，從而永遠結束了這種無意識性。他把整個私有制描寫為經濟關係的偽造，所以從政治經濟學觀點出發對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時所能做到的一切，他都已經做了。但是，蒲魯東並沒有放棄這個觀點；馬克思接着指出，蒲魯東在同政治經濟學鬥爭時，利用了政治經濟學本身的前提，並且沒有走出這些前提的範圍，所以他無法想像人類能夠不以政治經濟學的占有形式來重新征服實物世界。他宣稱政治經濟學的占有形式是“社會的職能”，但是他沒有能夠以應有的方式對這一思想作出相應的發揮。

但是，馬克思在反對鮑威爾兄弟用含混不清的高談闊論把蒲魯東所做的巨大進步化為烏有的時候，也像批判鮑威爾兄弟的神學局限性一樣，對於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局限性作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批判分析。埃德加爾·鮑威爾指責蒲魯東的論斷具有“片面性”，即說蒲魯東從貧窮和困苦的存在事實中去找尋自己的武器，說他認為這個事實是絕對的、合理的，而把私有制的存在事實，則看成是不合理的。據說，批判與此相反，它把兩個事實——貧窮和財產——合而為一，它發現了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使兩者成為一個整體，並向這個整體本身詢問它的存在的前提是什麼。馬克思只用一句簡明的話，就粉碎了這些膚淺的觀念性論斷，他說，整體的存在的前提，正包含在這兩方面的本性當中。

“無產階級和富有是兩個對立面。它們本身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它們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產生的。問題在於這兩個方面

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們是統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制，作为私有制來說，作为富有來說，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來說，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約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則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經濟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轉移的、不自覺的、同它的意志相違背的、为客觀事物的本性所制約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識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貧困的貧困、这种意識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別人生产財富、替自己生产貧困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約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sup>①</sup>

“批判的批判”說，承認无产阶级具有这种全世界历史的作用，就好像是宣布无产者是神。馬克思坚决地反对“批判的批判”早就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44頁。

提出的并且后来一再反复的这种观点，他說：“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經形成的无产階級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觀，由于在无产階級的生活条件中現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違反人性的頂点，由于在无产階級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論上意識到了这种損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飾的、絕對不可抗拒的貧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現——的逼迫，不得不憤怒地反对这种違反人性的現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階級能够而且必須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現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現代社会的一切違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不是白白地經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鍛炼成鋼鉄的教育的。問題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階級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問題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階級，无产階級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現代資产階級社会的整个結構最明显地无可辯駁地預示出来了。”<sup>①</sup>于是，馬克思再一次強調指出：“英法两国的无产階級中有很大大一部分人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識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sup>②</sup>

在同时代人的面前，《神圣家族》显然沒有发生太大的影响。恩格斯在收到这部书時說，书的篇幅过多了，它的大部分内容将不会为广大的讀者所理解。两位作者最不喜欢《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杂志上发表的书評，因为它过于称贊該书了，但远远不是实事求是地写出来的。当代的讀者很容易会把这本书看成一块熄灭了的木炭，但是如果他們具有一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頁。

② 同上。

双敏銳的眼睛，那末他們从灰堆中所看到的，將不止是一块长期发光的宝石。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即他們的終生事业，是从《神圣家族》开始的，以后繼續了将近四十年，无論是对于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还是特別地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把他們两人联系起来的这种真挚的和經得起一切考驗的友誼，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過。它完全沒有彼此傾軋和互相不滿的現象，而两个个性都非常突出的人，在同敌人进行无数的反复无常和胜敗兼有的激烈斗争的时候，一般是必然产生这种現象的。这种友誼好像护有一层鋼甲，防止外界对它蓄意或无意进行的一切引誘。現在不可能断定(也許永远办不到)他們的功績哪一部分是屬於馬克思的，哪一部分是屬於恩格斯的。不錯，在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經常把大部分功績，而且是很大一部分功績写在自己的亡友名下。同时，也毫無疑問，在他們两人中間，馬克思的天才和智慧是比較高的。但是，如果說恩格斯沒有馬克思就做不到他所做到的一切(正如恩格斯自己公正地声称的)，那末这种情况也同样符合于他的已故的战友，即馬克思沒有恩格斯也不能成为后来的馬克思。

## 第四章

### 历史唯物主义

1845年春，恩格斯从巴門迁往布鲁塞尔。一些个人的原因，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恩格斯的思想方式，同他家庭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具有极其尖锐的矛盾；其次，他对故乡的市民听众发表的某些关于共产主义的讲演，尽管具有典型的和平性质，但被警察当局强制停止了。

然而，吸引恩格斯到布鲁塞尔去的最有力动因，是他渴望同马克思合作，以便彻底搞清他们的新观点。为了这个目的，恩格斯随身带去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准备性著作，即他在1844年冬季写成的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那本书。这部书的序言，是1845年3月15日在巴門写的。

#### 第一节 恩格斯论英国工人状况

恩格斯在序言里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给社会主义理论和认为这种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肃清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他认为必须介绍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特别是向德国的理论家们介绍，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只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sup>①</sup>而走向共产主义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9页。

但是只有在英国，无产阶级的境况才具完备的、典型的形式。因此，恩格斯描述了英国工人的状况。

诚然，恩格斯不是第一个描写英国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人，可是他毫无疑问是最后一个使自己的先驱（他本身利用了这些先驱的著作）多少逊色的人。他的这本书，是这类德国文献中的第一部著作，而更重要的，它是这一特别种类文献全体中的第一部著作。同时，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在恩格斯以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描绘出无产阶级苦难的这种触目惊心的真实图景，而是因为这位二十四岁的作者的惊人的洞察力极其敏锐，他依靠这种洞察力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并且由此能够推论出资产阶级的兴衰，以及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和解救。

只有这本书为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提供了正确的解说。如果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研究的是原则，即研究了自由竞争；那末，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研究的是实践，即研究了大工业。在这两部著作之间，既没有某些人有时断言的那种任何差异，又没有下述的任何不同：据说恩格斯在前一著作里，是从伦理学观点出发讨论问题的，只是在后一著作里，他才首次利用经济学观点来作判断。这两部著作都有经济学的基础，而且恩格斯在后一著作中，也像在前一著作里一样，毫不留情地尖锐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理性的人类理想和工业资产阶级的不合人性的现实之间的令人发指的矛盾。实际上，后一著作比前一著作进步的地方，是作者越来越离开了德国哲学的激进派。他没有再引用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话，而只是有一两个地方援引过“友人施蒂纳”的话，同时引证的目的，是为了向施蒂纳指出他的理想就是“我”。这个“我”除了把别人看做可以利用的主体以外，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施蒂纳的这个理想，被资本主义社会极其完美地实现了。问题就在于这两部著作

之間，還有一本《神聖家族》。不錯，到處還都可以看到恩格斯是從德國哲學出發的，不過也十分明顯，他已經開始消化德國哲學的遺產了。有些地方，他還站在“一般的、純粹人的基礎”上，比如他在該書的最後一章總結時，宣稱共產主義是人類的事業，而不僅僅是工人的事業。這種說法在理論上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只要統治階級不願意聽到共產主義，它在實踐上是完全不會收到成效的。然而在全書的敘述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已經作為一個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事實，十分突出地顯現出來；並且由於恩格斯更加自覺地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把它作為理解隨着大工業而開始的全世界歷史時期的鑰匙，而對於這個事實作出了正確的評價。

按照恩格斯的意見，自從進入這一歷史時期，現代工人階級的歷史就開始了。“分工，水力、特別是蒸汽力的利用，機器的應用，這就是從18世紀中葉起工業用來搖撼舊世界基礎的三個偉大的槓桿。小工業創造了資產階級，大工業創造了工人階級，并把資產階級隊伍中的少數選民擁上寶座，可是，這只是為了後來在某個時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們。”<sup>①</sup> 這本書的要點，是指明大工業怎樣創造了現代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怎樣發展了起來和它為了推翻自己的創造者應當怎樣按照個別規律已被作者闡明的歷史辯證法發展下去。

正像資產者之間所做的那樣，無產階級也互相競爭。無產者之間的競爭，決定着工資的最低額；資產者之間的競爭，決定着工資的最高額。無產階級為了一般地有可能生存，就需要把一切生活資料最大量地壟斷為已有的資產階級；而可以依靠自己的資本生活的資產階級，則需要無產階級作為他們發財致富的馱貨牲口或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頁。

买卖对象。如果自由的劳动力多于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产生的需要，那末，工人为了不致继续没有工作和等着饿死，就要把工资下降到勉强能够糊口以免饿死的最低水平。如果工人少于资产阶级对工人的需要，那末，个别的资本家就会利用提高工资的办法，使工人们互相残杀。在平常条件下，即当工人的数目恰好等于生产当时所需商品使用的工人数的目的时候，工资略微比工资的最低额高一些。至于高多少，这要以工人的平均需要为转移。如果工人有每周吃几次肉的习惯，那末，资本家就不得不向工人支付足以使他们买到这些食物的工资：这种工资不低，因为工人不必彼此竞争，从而没有理由满足于较少的工资；可是它也不高，因为资本家之间没有竞争，就不会促使他们给予工人以特别津贴，以便为自己招揽工人。

由此可以得出早由亚当·斯密作出的一个结论：对工人的需求正如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它调节着工人的生产，即调节着所生产出来的人的数量，如果生产进行得过慢，需求就要使它加速，而如果生产进行得太快，需求就要使它缓慢下来。如果工人过少，那末，他们的价格，即他们的工资就要上涨，工人将会生活得好一些，结婚的人数多起来，人口的出生率提高，活下来的儿童增加，直到有了足够的工人为止。如果工人过多，那末，他们的价格就要下落，开始出现失业、贫困、饥饿和由此引起的流行病，而流行病则会扫除“过剩人口”。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的这种奴隶竟可以像商品那样出售，并且也像商品一样，价格有涨有落。这种奴隶制度和旧式的公开奴隶制度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是一下子就永远卖掉了自己，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即按日、按周和按年出售的，还因为他们不是由一个主人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出卖自己，成为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而不做为个别人的



奴隶。对于他们来说，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即使这种表面的自由也能给他们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也不会有一个人能够保障他们以生活资料，而且只要资产阶级对于他们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随时都可以把他们撵到马路上去。然而，资产阶级却感到这种制度要比旧式的奴隶制度好得多，因为他们在解雇工人的时候不会损失投入的资本，而且会大大降低生产费用，这是亚当·斯密为了安慰他们而早已算好了的。

但是，无产阶级的状况，由于几乎经常有“过剩人口”，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几乎经常比争夺工人的竞争激烈，由于因此而来的工资几乎经常接近最低水平，而更加严重地恶化了。每个单独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工人的相互竞争而达到最高限度。分工，使用机器，利用自然力，日益大量雇用女工和童工，——这一切不断地剥夺许多工人的就业机会。被解雇的工人不能增加消费，新生出来的工人也因此没有面包可吃。但是，这种循环被日益扩大的工业和掠夺国外市场所打断。最近六十年来，对纺织品的需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工人的需求，都在不断地和迅速地扩大，大不列颠帝国的人口也以飞快的速度增加。然而，继续有过剩人口。这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

恩格斯回答说：“是从工业和竞争的性质本身以及这种性质所造成的商业危机来的。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例如英国供给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货物在每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费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时间内在那里有多少存货，更不知他的竞争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他只能根据经常波动的价格对现有的存货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可靠的推测，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

碰运气。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场传来，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东西都送到那里去。不久，这个市场就充满了商品，销售逐渐停止，现金收不回来，价格日益下降，英国的工业也没有什么工作给自己的工人做了。”<sup>①</sup>随着积压的存货被消费掉，情况也逐渐好转起来；四面八方传来的好消息，以及日益上涨的物价，又使人们恢复了活动。

然后又怎样了呢？我们还得请恩格斯来描述：“……市场大部分都在很远的地方。在新的商品到达那里以前，需求总是在增加，价格也随着上涨。第一批运来的货物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购买，第一批成交的买卖使市场更加活跃起来，以后运来的货物还要看涨。人们怀着这种还会涨价的希望把商品买了囤积起来，这样，本来是供消费用的商品却在最需要的时候从流通中被抽出去。投机更加抬高了市价，因为它鼓励其他的人去购买新到的商品，并把刚运到的商品从流通中夺去。这一切渐渐地传到了英国，厂主又重新开始加紧工作，开办新的工厂，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于是这里也开始了投机，它的后果也和国外市场上完全一样：物价上涨，商品从流通中被抽出去。这两件事情使生产紧张到极点，于是出现了‘根基不稳的’投机家，他们运用虚拟资本，靠信贷来维持，而如果他们不能把买进的商品迅速地转卖出去，那就得宣告破产。他们大干这种普遍地漫无秩序地追逐利润的勾当，由于自己的贪得无厌，更加加强了混乱和奔忙，这种贪得无厌使他们发疯似地哄抬物价和扩大生产。一种疯狂的竞赛开始了，连最稳重最有经验的人都给迷住了。铁、纱、布匹开始大量生产，好像要把整个人类重新装备起来，好像在月球上的某个地方发现了有几十亿消费者的新市场。”<sup>②</sup>当然，市场由此又被重新充斥起来，接着开始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6—367页。

② 同上书，第368页。

新的危机。“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繼續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国工业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sup>①</sup>按照恩格斯的意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生产的毫无计划和不可遏止的競争，是产生商业危机的原因；与这种情况不同，他认为工人的消費不足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从这种情况中产生了下述的事实：英国的工业不得不經常（除了最繁荣的时期）拥有一支沒有就业的工人后备軍，以便在最旺盛的月份利用它去为市場生产所需的大批商品。不算苏格兰和爱尔兰，仅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就有一百五十万正式登記的貧民。恩格斯接着仔細地分析了这对英国工人的状况造成了哪些后果。他談到工人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他們吃的什么和穿的什么，他們的精神、道德和身体怎样被摧殘。他以令人吃惊的細致笔触描写了社会的杀人行为，而社会就是按照他所述的細节进行杀人的。他考察了以前几个世紀无产阶级的貧困与劳动者阶级的貧困有什么不同。在这里，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无产阶级的生存沒有保障，他們必然过着掙一天吃一天的日子。“……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就什么也沒有，昨天掙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沒有任何保証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危机，主人的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业，——这个无产者已經被置于人們所能想像的最令人憤怒的非人的地位了。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証，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致于餓死的保障；而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們又不許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9頁。

絲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長河中，不過是一滴而已。”<sup>①</sup>其次，我們還看到強制勞動的令人屈辱的痛苦；這種勞動的使人動物化的作用，由於分工和應用蒸汽與機器的力量，而被增漲了許多倍。“在大多數的勞動部門里，工人的活動被局限在瑣碎的純機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鐘又一分鐘固定不變地重複着，年年都是如此<sup>②</sup>。如果一個人從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時或十二小時以上從事於制針頭或銼齒輪，再加上像英國無產者這樣的生活條件，那末，當他活到三十歲的時候，也就很難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sup>③</sup>最後，工廠的內部規則使工人完全處於奴隸地位，慘無人道地延長工時，雇用女工和童工，實行夜班工作（這種工作破壞着一切家庭聯繫，並且不僅危害活着的一代，而且危害未來的一代），採用truck-system（實物工資制，即用商品支付勞動報酬的制度）和cottage-system（小房子制，即向工人出租小住宅的制度），以及出現被恩格斯實事求是地描寫出來的工廠制度的無數弊端。

恩格斯沒有掩蓋創造了現代無產階級的大工業，使無產階級當中產生了一批喪失了人的面貌、在精神和道德上淪落到動物狀態、在身體上受到損傷的人。在英國的工人當中，酗酒、賣淫、粗魯和財產方面的犯罪現象日益普遍，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又怎麼能夠不這樣呢？然而在今天的這種困苦中，恩格斯也看到了明日的希望。對於工人來說，只有一個可能使他們繼續為人和感到自己是人，而這個可能就是怒發沖冠地反抗資產階級。淪落到牲畜狀況的危險日益增加，促使無產階級投入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這一鬥爭不知道什麼是和解，它必然以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而告終。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1頁。

② 是否在這裡也需要引用一下資產階級權威人士的證明呢？我只舉一個例子，這個例子每一個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麥克庫洛赫4卷版）第3卷第5編第1章第297頁上找到。——恩格斯原注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4頁。

正是資產階級用來使無產階級喪失人的面貌的那些手段，將要成為無產階級手中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

愛爾蘭的移民，大大地促進了英國工人狀況的惡化，然而愛爾蘭人的活潑好動的气质，也對英國的無產階級發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使工人的道德敗壞到極端的地步，但是這也喚起了他們的階級意識，使他們理解了寡弱眾強和團結就是力量。人口的這種集中，消滅着工人和所謂“供養人”之間的家長制關係的最後殘余；大城市逐漸成為獨立的工人運動的發源地。工人的悲慘命運，使他們更加人道，更有禮貌，更和藹可親，他們把每個人都看成人；而財迷，即透過私人利益的稜鏡觀察一切和除了填滿自己的錢包而沒有其他任何生活目的的資產者，則把工人看成比人低賤的存在物。因此，工人的見解比資產者的見解特別具有獨立性，工人對現實比資產者敏感得多。但是，資產階級繼續使無產階級所處的那種人為的無知狀態，却因此沒有被人注意。無產階級從實踐中受到的教育，不僅使他們能夠用來代替學校的知識，而且消除了學校知識帶來的混亂的宗教觀念的毒素。“貧困教人去祈禱，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動。英國工人幾乎都不會讀，更不會寫，但是他們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麼，他們卻知道得很清楚。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是什麼，他們能夠從這個資產階級那里得到什麼，他們也是知道的。雖然他們不會寫，可是他們會說，並且會在大庭廣眾之中說。雖然他們不會算，可是他們對政治經濟學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們看穿主張取消谷物稅的資產者，並且駁倒他們。雖然他們完全不了解教士們費盡心機給他們講的天國的問題，可是他們很了解人間的即政治的和社會的問題。”<sup>①</sup>英國的無產階級逐漸變成完全不同於英國資產階級的另一種人。工人比起資產階級來，說的是另一種習慣語，有另一套思想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8—399頁。

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政治和宗教。几乎和迪斯累里<sup>①</sup>同时，恩格斯说出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成两种民族的见解，但是又与迪斯累里不同，恩格斯补充说：工人将要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代替怀有种种阶级偏见和对一切历史运动发生僵化作用的资产者。

恩格斯研究英国工人运动的各种形式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果。工联有强大的力量反对个别的、害处不太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但是不管工联的力量怎样强大，它们也是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的。“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sup>②</sup>但是，工人为什么要甘冒这些失败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sup>③</sup>工厂主用来向工人宣传罢工毫无用处的论据，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有些是不正确的，不会对工人的理智发生任何影响。工联必须首先注意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是依靠工人之间的竞争，即依靠无产阶级缺乏团结性，依靠各个工人之间的彼此对立。工联组织是工人打算消灭相互竞争的首次尝试，打击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最脆弱地点。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首次尝试永远不能长期消灭工资规律；它要超越自己的范围向前发展。

① 迪斯累里，本杰明 (Disraeli, Benjamin 1804—1881) ——英国的国家活动家和作家，后来成为保守党的领袖，曾在1868年和1877—1880年任首相。  
——俄译本编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5页。

③ 同上书，第506页。

工联发动的罢工只是前卫战，不过有时也会变成巨大的战役。这种罢工虽然不能彻底解决任何問題，然而可以确凿地証明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决战就要来临了。罢工是工人学习战斗的学校，罢工本身也具有无比的作用。恩格斯詳細地描写了1844年春季諾森伯兰和德勒穆两地矿工英勇进行的十九星期大罢工。一般說来，工人除了反对他們所处的全部生活状况以外，再沒有其他余地来显示自己的人格，所以工人就在这种反对中，把自己的最高尚、最可亲、招人爱和最有人性的方面都表現出来。不錯，在几乎每天都有的罢工当中，并不是沒有行动粗魯和殘暴的缺点的，然而不应当忘記，英国正在进行社会战争。如果有人假发慈悲，用爱好和平和甚至敬爱他人作招牌，以使这种战争对資产階級有利，那末，只有消灭这种伪善行为，揭穿事实的真正关系，才能对无产階級带来好处。工人反对資产階級及其僕从时使用的最强力的不友好行动，只不过是公开地說出了資产階級对付工人时使用的阴險和暗害伎倆。資产者之所以認为法律是神圣的，是因为法律是由他們創造的，法律为他們的利益服务。相反地，工人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們經常有机会从实践中体会到，法律不外是資产者准备抽打他們的树条，所以除非万不得已，他們是不訴諸法律的。但是，他們又极想用无产階級的法律来代替資产階級的法律。他們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

宪章里面包括的六条，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議的，可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連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毀掉。宪章运动是无产階級反抗資产階級的集中表現形式。在宪章运动中，整个工人階級起来反对資产階級，并力图把政权由資产階級手中夺过来。但是，宪章运动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宪章运动本質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現象，宪章派工人加倍努力地参加无产階級反对資产階級的一切斗争。实行十小时制工作日的法令，保障工人有权反对資本家，支付較高

的工資，保證工人的地位，廢除新濟貧法——這一切要求，至少也像憲章里的六條一樣，是憲章運動的不可缺少部分。誠然，憲章派的社會主義還處於萌芽狀態，他們至今仍然認為消除貧困的主要手段，是把土地分成許多小塊份地。但是，由於工業的發展，這種手段已經過時了，而且即將到來的危機（按照恩格斯的意見，最遲在1847年到來），大概在力量和尖銳程度方面，都要超過以往的歷次危機，把憲章派投入社會主義的懷抱。

如果說憲章派在理論上還非常落后，不過却是真正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而社會主義者的眼界則比較寬闊，可是他們都出身於資產階級，愛好和平，性情溫順，他們的原則是抽象的。雖然社會主義在實質上使自己高高地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对立之上，但是在形式上却對資產階級十分寬容，而對無產階級在許多方面都非常不公道。社會主義者所希望的不是鬥爭，而是吸引輿論注意他們的各項原則。“此外，社會主義者還經常抱怨下層階級道德墮落，他們看不見社會制度的這種瓦解中的進步成分，看不見只會追求私利的偽善的有產階級更嚴重的道德墮落。他們不承認歷史的發展，所以他們打算一下子就把國家置於共產主義的境界，而不是進一步開展政治鬥爭以達到國家自行消滅……的目的。他們固然了解工人為什麼痛恨資產者，但是，他們認為這個唯一能夠引導工人前進的憤怒並沒有什麼用處，並宣揚對英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更加沒有什麼用處的慈善和博愛。他們只承認心理的發展，只承認和過去毫無聯繫的抽象的人的發展。可是整個世界，包括每一個單獨的人在內，都是從過去成長起來的。所以他們太學究氣、太形而上學了，他們是做不出什麼大事來的。”<sup>①</sup> 恩格斯說，在現在的這種形式下，英國的社會主義決不能成為工人階級的公共財產，它必須汲取憲章運動的革命的內容，猶如憲章運動需要更加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5—526頁。



明确和广闊的社会主义見識一样。社会主义同宪章运动合流，会使工人階級成为英国的真正統治者。但是，不同的工人派別(恩格斯对此也作了詳細說明)，現在就已經对无产階級的教育不断地做了許多工作。无产階級正在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則、具有独特的世界觀的独立的階級，它同一切有产階級对立，民族的全部力量及其繼續发展的能力，都依靠这个階級。

恩格斯曾在自己著作的結論中預言英国在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社会革命，所以資产階級的評論界对于这一沒有应驗的預言就糾纏了五十多年，以使用自己的一套手法来“駁倒”这部划时代的作品。但在实际上，出現了声势浩大的革命，不过沒有采取恩格斯所推測的那种形式。这种革命就是：英国的工人階級从絕望的貧困中站立起来，成长为一支力量坚强的大軍，一步一步地在爭取政权。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可以公正而自豪地指出：使人感到惊异的，并不是青春的热情激起他作出的預言有那么多沒有实现，而是有那么多都应驗了。当时，恩格斯也有非常熟悉英国情况的盖斯克尔和卡莱尔那样的，甚至还有英国資产階級的主要报纸《泰晤士报》那样的对于已經臨門的暴力革命所持的錯誤看法。但是，他的书中的一切新穎的和独创的觀點，以及构成他的精神财产的一切东西都是真理，开辟了科学上的新的道路。

在这里沒有必要隱瞞：恩格斯和馬克思，特別是在他們的青年时代，有时过高地估計了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步伐。一切沒有头脑的人，过去和現在都認為他們用这一点就証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觀是沒有根据的，而像阿尔伯特·朗格<sup>①</sup>这样的人，却与此

<sup>①</sup>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著有《工人問題及其現在和将来的意义》和《唯物主义史》等书。关于朗格的哲学觀點和社会学觀點的評述，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俄文版，第171—174頁，第239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卷第429—433頁；第14卷，第208、218、345頁；等等。——俄譯本編者

相反，他曾經作出一个結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惊人正确地”判斷了他們的時代。朗格寫道：“一般說來，我們總喜歡把我們清晰地預見的東西想像得比它的實際存在近一些。”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傾向於這種愛好；恩格斯甚至在年邁的時候都是如此，他一直到了暮年，都保持着一顆青年人的心。但是，不應當由此就說他們徘徊在五里霧中，盲目摸索；恰恰相反，用朗格的話來說，他們是“明察秋毫的思想家”，他們所以甘願跋涉在漫長的道路之上，是因為他們清晰地看到了這條道路的終點。

恩格斯的這本書，剛一問世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它成了人們最喜歡閱讀的三月革命以前的社會主義作品<sup>①</sup>；但是，吸引資產階級讀者界注意的，實質上只是那種對於悲慘情節的動人描寫。恩格斯應用的方法，以及他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仍然未被人們理解，正如不久以後“政治經濟學中的歷史學派”<sup>②</sup>的首領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教授在他的學術著作中所證明的那樣。希爾德布蘭德試圖利用一大堆瑣碎的历史性注釋，重新把恩格斯射入歷史發展中的光綫遮住。他引經據典，考證年月，核對數字，以附會事實，從而引導出如下的結論：英國的勞動階級在以往幾個世紀比十九世紀的處境還要惡劣；英國的手工業者、海員和僕役的生活，比恩格斯描寫到的工廠工人、農業工人和礦業工人的生活良好；在黑森選帝侯領的上黑森省，手工業無產階級比英國的大工業無產階級

---

① 作者指的是西歐各國在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和德國三月革命以前流行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俄譯本編者

② “政治經濟學中的歷史學派”——資產階級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流派，它否認客觀經濟規律的存在，用支離破碎的零散歷史事實的敘述來盜換科學的研究。這個學派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產生於德國，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威·羅雪爾(Wilhelm Roscher 1817—1894)、布·希爾德布蘭德(Bruno Hildebrand 1812—1878)、卡·克尼斯(Karl Knies 1821—1898)。——俄譯本編者

还要痛苦；以及其他等等。即使希尔德布兰德确实证明了他想证明的东西，他能够用这种结论来证明恩格斯是不对的吗？十分明显，完全不能证明。希尔德布兰德对恩格斯提出的一切主要问题避而不谈，一步不离“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应当宣布恩格斯是一位幻想家，因为他在全世界市场上没有发现希尔德布兰德在黑森选帝侯领的上黑森省见到的那种现象。

但是应当承认，希尔德布兰德是“历史学派”的比較聪明的代表人物之一。过了三十年，罗雪尔出版了他的《德国经济科学史》，除了希尔德布兰德以前说过的那几句话以外，其中对恩格斯再没有讲什么。他甚至没有说出自己的高明见解的来源，这也許就是“历史方法”的特点。

## 第二节 馬克思論費尔巴哈

1845年春恩格斯迁移到布魯塞尔以后，就同馬克思合作，开始全面地制定他們的观点，并拿这种观点同德国哲学的思想观点对立起来，以便清算他們过去的哲学信仰。他們在两卷本的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的著作中<sup>①</sup>，实现了这个愿望。但是，这部著作是注定无法問世的，因为在威斯特伐里亚找到的那家出版商，在接到原稿以后刁难起来，說“由于情况改变而不可能付印”<sup>②</sup>。这是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注定要长期受苦的那种尷尬状况的开始。連卢格这样的人也毫不客气，坚决地要求他的合伙人弗呂貝尔不叫“文艺书店”出版馬克思的任何著作，可是卢格自己也承认，馬克思

---

① 这里所指的是《德意志意識形态》。这本书是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45—1846年写成的。——俄譯本編者

② 参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sup>2</sup>頁。

未必写出什么不好的作品来。

既然馬克思和恩格斯达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他們也就情願把自己的手稿“交給了耗子去批判”<sup>①</sup>。但是，馬克思用来同費尔巴哈清算的十一条提綱，却从这个时期一直保存下来。馬克思在自己的这十一条《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里，說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sup>②</sup> 他說：“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說，認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認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說忘記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說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sup>③</sup>

費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質归結于人的本質，他在世俗家庭中指出神圣家族的謎底。但是，他忽視了一个問題，即在揭示了这个謎底之后，还有一項主要工作待做。如果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像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如果世俗家庭被規定为某种云霄中的独立王国，那末，这个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这个矛盾应当被人理解，而且在理解之后，还要通过世俗基础的实践的革命化来消除。只有这样，宗教的本質才会真正归結于人的本質。

---

① 参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2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頁。

③ 同上书，第4頁。

“……人的本質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費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木質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sup>①</sup>

“……費尔巴哈沒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屬於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社会生活在本質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論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②</sup>

馬克思用下列的簡明論点結束了他对費尔巴哈的批判：“直觀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觀。……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則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哲学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变世界。”<sup>③</sup>

不难理解，这种解釋方式可以得到什么結果。費尔巴哈想回到唯物主义，可是他始終沒有能够同唯物主义完全結为好友。在他打算回到唯物主义而完全同唯心主义断絕关系的时候，他牺牲了德国唯心主义超过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所取得的进步，即放棄了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川流不息的生成和消灭的过程的辯証方法。这个辯証方法与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黑格尔这样称呼它）不同，后者認為世界是現成事物的某种复合体，是一下子生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頁。

② 同上书，第5頁。

③ 同上书，第5—6頁。

成的固定不变的探討对象的复合体。尽管形而上学方法曾經十分必要和有过用处，但是它利用自己的显微鏡和解剖刀，只能把尸体研究到一定程度，因为它使事物脫离了它借以存在和发展其特有的生存条件的那种联系。辯証方法与此不同，它掌握着事物的产生和消亡的过程的整个复合体，它不把人看作是一下子生成的抽象的东西，而把人看作是历史的、不断改变着的存在物。

馬克思同意費尔巴哈的做法，把唯心主义的一切奇談怪論都放棄了，可是他又与費尔巴哈不同，坚定不移地保持住了德国唯心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从正面研究了費尔巴哈只会从反面去研究的那些东西。他把唯心主义的永恒内容放进唯物主义，犹如康德曾把唯物主义的永恒内容放进唯心主义一样<sup>①</sup>。但是，既然一方面人类历史不受什么神或什么絕對观念支配，另一方面这个历史是通过永无間断的辯証过程发展的，那末，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馬克思認為人的真实本質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对于自己关于国家和社会的这一切先行研究作了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人的发展。但是，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于經濟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中的变革引起社会的一切結構方面的变革。馬克思在借用黑格尔的辯証方法和費尔巴哈的抽象的孤立的唯物主义时，都不是沒有批判的。比如，在他証明不是思想具体化为事物，而是事物被反映在思想当中以后，便拋棄了黑格尔的辯証方法；而在他指出川流不息的辯証过程怎样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中发生作用以后，才把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推广在历史唯物主义中。

資产階級的学术界，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出了两点反对意

---

① 不能認為弗·梅林的这一对比是正确的。正如列宁指出的，伊·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調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体系結合在一个体系中。——俄譯本編者

見：第一，說这种历史观完全称不上是新的；第二，說它与真理距离得十分遥远。但是，無論是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来没有說过他們是任凭自己的意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就曾經用类似的說法否認过那种全凭自己的意思只根据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研究就能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了使人们有可能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应当事先有这种社会的存在；而且理所当然的是，从这个社会出現的初期起，即从它由中世紀的封建社会形态的内部产生出来的时候起，有头脑的人士就在这方面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想法：应不应当首先承認正是这种社会締造了乍一看来比它优越的国家；从而应不应当首先从經濟的生产方式中去引导政治的和其他一切的意識形态，而不是从思想体系中去引导生产方式。

资产阶级社会越广泛地发展，它的各种經濟矛盾越彼此冲突得厉害，封建等級的分散殘余越結成巨大的階級，政治斗争不外是这些階級的斗争的这一事实也就越加尖銳地表現出来。偉大的法国革命，在不小的程度內还有巨大的英国工业，都令人惊奇地証明了资产阶级的一切意識形态随着同这个社会的不断进步的經濟发展发生冲突，而云消雾散，化为烏有。七月革命和选举改革法案，已經使現代市民社会的三大階級——貴族階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公开地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从此以后，英国的历史科学，特别是法国的历史科学，認清了現代历史的动力就是这三个階級的斗争，就是它們三者的利益的冲突。其次，甚至在落后的德国，也对这一真理产生了模糊的預感。想入非非的反动分子，也在这方面卖弄聪明，說經濟形式是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构的基础；而自由主义者，比如汉澤曼在反对书报檢查制度的斗争中提出一种反对意見，認為书报檢查制度既妨碍政治問題的討論，又阻撓經濟問題的討論，因为經濟問題差不多經常要变为政治問題的。最后，不問

自明，从资产阶级的理想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便合乎逻辑地同唯物主义历史观会合，我们可以从圣西门、傅立叶和路易·勃朗的著作中找到无数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无论是一切新的发现和发明，还是所有新的科学真理，后来总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像马克思这样明确地提出过如下的原理：“人类始终只会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sup>①</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的先驱者的功绩；恰恰相反，他们使这些人恢复了历史权利，甚至破天荒第一次为圣西门、傅立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样的思想家确立了历史权利。他们的行为就是这样大公无私，可是根据他们的想法，他们也不能不这样对人对事。把他们的先驱者的功劳提高，并没有使他们自己做出的贡献失色，反而更加光明磊落。阿尔伯特·朗格在一个地方说过，我们几乎经常跟我们的其他同时代人分享的，正是一些卓越的思想，只有完满地实行这一或那一原则，才能保证我们受到他人的公正的尊敬。实际上，完满地实行原则，也就因此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挥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于人类具有伟大的意义。他们从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以及德国的哲学陷入的绝境中走了出来。现代文化本身的矛盾，威胁着现代文化，使它分裂成本身无能为力的各种不同的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思潮导入一条在前进的道路上可以排除一切矛盾的统一的强而有力的革命洪流。

有人硬说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白他们相信听天由命的宿命论，并把一切思想的动力从人类的历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 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 第341页。



史发展中驅逐出去。再沒有比这种說法更沒有根据的事情了。从他們的辯証方法中自然应引导出如下的原理：社会对国家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国家也反过来影响社会；經濟事实是最后的决定因素，而思想观念也能够从自己这方面影响經濟事实；意識形态不能发生独立的作用，可是絕對不能由此就說意識形态似乎根本不发生作用。在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天才地发展了新世界觀的基本特征，直截了当地表示他正是願意把唯心主义的积极方面从直观唯物主义的惰性中拯救出来，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他來說不仅是理論上的真理，而且也是实践的武器，他打算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革命行动的工具来把資产階級社会改造成为社会化了的人类。

但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檢驗这个嶄新的世界觀的正确性。首先必須識破現代資产階級社会的經濟秘密，也就是說，不能只滿足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討論，而要求理解这种生产方式，并且証明它的灭亡的必然性来自它的产生的必然性。在西欧的社会主义者当中，蒲魯东比其他社会主义者更进一步，試图弄清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種現象的真实內部联系，而不随便地隱瞞这种生产方式的恶果。在批判費尔巴哈以后，馬克思着手批判蒲魯东。

### 第三节 馬克思反駁蒲魯东

馬克思在巴黎期間，曾与蒲魯东有过私人交往。他們时常彻夜爭論經濟問題。馬克思把蒲魯东带进了黑格尔的观念世界，尽管蒲魯东不懂德語，但他决不是不能完全理解这个世界。馬克思离开巴黎以后，蒲魯东找卡尔·格律恩（Karl Grün）作自己的老师，至少可以向他学习哲学方法。

实际上，在思想发展方面，馬克思一直前进，而蒲魯东却繼續

落后。从1846年5月17日蒲鲁东由里昂寄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分手以后，过了不到一年，彼此已经在思想发展方面相差多么遥远了。可惜，引起蒲鲁东的这封复函的马克思的去信，没有保存下来或者没有发表。但是，不管这封信的内容如何，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蒲鲁东当时一定悲喜交加，而没有理解马克思的观点。蒲鲁东向自己“敬爱的哲学家”大谈道理，说他是第二个路德，受到宗教上的许多咒骂和被开除教籍，认为他是一个主张暴力革命的人，希望巴托罗缪之夜也临到私有者的头上，竭力要满足了解无产阶级的渴望。至于蒲鲁东从哪里吸取了这些奇离古怪的知识，可以由他在这封信末尾对卡尔·格律恩的歌颂中猜出一部分。蒲鲁东希望发现社会规律和实现这些规律的方式，他通过这个希望宣布出来的东西，恰好就是他要自己弄清马克思所致力解决的问题的任务。问题只在于他们两人谁在解决这项任务方面最有本领。蒲鲁东在信中对马克思写道，他写了一部著作来解决这项任务，并且已把著作发表了一半。他请马克思严格地批判他的著作，并许下诺言，说在将来答复批判的时候愿意听取批判的意见。但是，当马克思履行了这项请求以后，蒲鲁东却用了几句出人意料的话来报复，他把人家的批判叫做“一位马克思博士的诋毁文”，说它集了“粗鲁无礼、诽谤、伪造和剽窃之大成”。

蒲鲁东所说的著作，是《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其中试图回答财产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已经不是像他的处女作<sup>①</sup>那样用愤慨的指责去回答了，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去解答的。蒲鲁东这次没有使用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而是运用了黑格尔哲学提出的矛盾。他在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中也发现了这种矛盾，然后又试图去解决它。首先，他研究了关于价值的

---

① 指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译者

基本学說，以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他想通过对李嘉图的价值学說作出空想主义的解釋，以消除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可是英国甚至德国早已有人这样做了，結果沒有成功。但是，蒲魯东在解决自己的任务时，是像格雷<sup>①</sup>那样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場出发的，而不是像欧文及其信徒那样从大资产阶级的立場出发，也不是像洛貝尔图斯<sup>②</sup>那样从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蒲魯东想用他的“构成价值”來說出人类的最后意見，而欧文和洛貝尔图斯(后者以其特有的形式)則认为“构成价值”不过是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同时，蒲魯东暴露了自己根本不懂黑格尔的辯証方法。他死死地抓住黑格尔辯証法的已經变成反动的那一方面不放，根据这一方面，现实世界是由观念世界产生出来的；同时，他又放棄了黑格尔辯証法的革命方面，即放棄了观念的独立性。观念可以安置自己，并把自己跟自己对立起来，以便在这种斗争中发展那种既能消除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形式又能保持它們的实在內容的最高統一。蒲魯东与此相反，他把每一个經濟范畴都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为了在以后寻找合題，即寻找要把好的方面保存下来而把坏的方面消灭掉的科学公式。他认为，好的方面将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而坏的方面要由社会主义者揭发。他既想利用自己的公式和合題超越经济学家，又想利用它們凌駕于社会主义者之上。

馬克思用以下的論断粉碎了这种幻想：“蒲魯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

---

① 格雷，約翰(Grey, John 1798—1850)——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由小资产阶级立場出发批判资本主义，但是拥护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俄譯本編者

② 洛貝尔图斯(亚格措夫)，卡尔·約翰(Rodbertus-Jagetzow, Karl Johann 1805—1875)——德国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了的普魯士容克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宣傳“国家社会主义”，激烈地反对过馬克思。——俄譯本編者

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為一個合題，結果只不過是一種總合的錯誤。

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sup>①</sup> 儘管這項判決做得很嚴厲，但是馬克思是有權宣讀這項判決的。答復《貧困的哲學》的《哲學的貧困》，是用法語寫成和在1847年7月問世的；馬克思在這部著作里，不僅指出了蒲魯東的試圖是怎樣破滅的和被什麼東西粉碎的，而且親自解決了蒲魯東為自己提出的任務。馬克思發現了社會規律；他發展了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使它們遠遠超出自己原來的範圍，從而有機地把它們結合在科學的共產主義當中。他也正是利用辯證方法做到這一點的，不過沒有通過它的唯心主義的神秘形式，而是通過它的唯物主義的革命形式加以利用的。

本書共分兩章，第一章是專門討論蒲魯東的“構成價值或綜合價值”的。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換是同商品中包括的勞動時間相符合的，被蒲魯東說成“將來的革命理論”的商品交換，正是李嘉圖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理論科學地闡明了的東西。勞動的相對價值（工資），決定於生產工人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延續後代所必需的一切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李嘉圖曾經推斷說：“如果用減少維持生活的糧食和衣服的自然價格的辦法來減少人們的生活費用，即使對勞動力的需求可以大大增加，結果工資也會下降。”勞動的自然價格不外是工資的最低限額。由此可見，用勞動時間來測量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頁。

的相对价值，必然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断言的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理论”。

为了支持自己的空想，蒲鲁东假定：如果产品的相对价值决定于生产产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那末，供给和需求必然得到平衡。为了确立他的这个论点，他援引了一个所谓历史证明，即说生产最有效用的东西需要的时间最少；社会总是先从最轻便的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才逐渐地转而生产那些花费劳动时间最多和适合于最高级需要的东西。马克思举了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这个令人惊奇的历史哲学。他说，假如在罗马皇帝时代有人在人工池塘里饲养鳊鱼，那末就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不缺乏充当鳊鱼饲料的奴隶。马克思没有就此止步，他重新把被蒲鲁东头脚倒置的历史发展翻转过来。马克思写道：“实际上，情况完全不像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sup>①</sup>但是，历史也在证明：产品的交换方式，一般是与产品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个人交换同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产品的消费决定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条件本身则以阶级对抗为基础。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为什么它们是最重要的日用必需品呢？是因为它们是对社会最有益处的产品呢？还是因为它们建立在贫困上的社会中是最粗劣的产品，从而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呢？只有“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時間的最低額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時間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sup>①</sup>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供求之間的“比例性关系”，不受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時間所确定的这种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調节，而受供求之間的波动性运动的調节。也只有这种运动，才能使劳动時間成为价值尺度。任何一种新的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迄今用两小时才生产出来的东西，就会使市場上現有的一切这类产品跌价。竞争迫使生产者出卖花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贵于花一小时生产的产品。竞争实现着产品的相对价值决定于生产它使用的必要劳动時間这一規律。但是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物品的实际生产時間，而是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時間，而这个最低限度的時間，也是由竞争来規定的。劳动時間作为交换价值尺度的这一情况，由此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規律，而这种跌价又是同生产过剩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其他許多表现齐头并进的。

馬克思把蒲魯东的空想叫做一个希望商品能够恰好按照比例生产，从而可以使商品按公平价格出售的好心腸的资产者的善良願望。他指出說，为了要把资产阶级社会說成是不允許任何人損人利己的和諧和永恒公平的状态，资产阶级的幻想很久以来就为自己想像出一种沒有阶级对抗的个人交换。但是，只有在生产資料有限，交换在极狹窄的范圍内进行，供不应求，消費大于生产的时候，“这种供求之間的正确比例”才有可能。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就不可能了。大工业由于它的工具的性质，已經不得不經常以愈来愈大的規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由于自然規律的必然性，大工业不得不經過繁荣、衰退、危机、停滯和新的繁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5頁。

榮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sup>①</sup>

马克思接着指出，蒲鲁东决不是第一个试图“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价值学说的人。他列举了蒲鲁东的一些英国先驱者，同时详尽地叙述了约·弗·布雷<sup>②</sup>的空想。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独立的生产者，那末，要进行劳动时间的等量交换，就只有事先对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间数量达成协议，然而这种协议却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利用这个推论，可以令人信服地驳倒布雷的空想。如果我们不拿产品的分配，而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出发点，也会得出上述的推论。在大工业中，张三不能任意规定自己的劳动时间，因为他的劳动，如果没有联合在一个生产当中的其他一切李四和王五的合作，那就没有什么作用。这也清楚地说明了英国的厂主为什么那样顽固地反对减少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的法案，使得这种减少未能付诸实现，而且成年男工的劳动时间也没有减少。大工业的性质本身，就要求大工业中的一切人的劳动时间都完全一样。“今天是资本以及工人们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的东西，如果一旦取消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明天就会成为以生产力总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

②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蒲鲁东借用他的理论的地方(特别是关于所谓“公平交换”)很多。——俄译本编者

对現存的需要总额的关系为基础的一个实在的协定。

但是这样的协定就是个人交换的死刑……”<sup>①</sup>

然后，馬克思評述了蒲魯东对自己的发现的几項特殊的实际应用。根据蒲魯东的意見，金銀是价值已經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并且由于有君主們的御璽为凭的最高裁定而成了貨幣。馬克思对此反駁說，貨幣不是物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只是其他經濟关系的整个鎖鏈的一环，所以同其他經濟关系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同个人交换一样，这种关系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貨幣并不是由君主們任意創造的。“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識的人才不知道：君主們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經濟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經濟条件发号施令。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关系的要求而已。”<sup>②</sup>“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認。”<sup>③</sup>押在黄金上的御璽，并不表明黄金的价值，而只表明黄金的重量。但是，金銀所以成为不受它們的生产費用决定的唯一商品，正是由于它們具有作为价值符号的貨幣特性。这一点是确实無疑的，因为金銀在流通中可以用紙币来代替，——这也是李嘉图很早以前就已經說明过的情况。由此可見，蒲魯东实际应用他的“构成价值”来分析貨幣，只能毀灭他自己的发现。

应用“构成价值”來說明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劳动能比相互沒有联系的个人的劳动生产出剩余的东西，情况也不会好。为了說明社会为什么越来越富，而工人为什么越来越穷，蒲魯东使社会人格化，并把普罗米修斯的名字給予了作为人的社会。同时，这个作为人的社会的生活活动的規律，应当完全不同于构成普通人类社会的一般人的生活活动的規律。“构成价值”应当保証每一个工人在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6頁。

② 同上书，第121—122頁。

③ 同上书，第124頁。



一个工作日内，由于共同劳动的进步而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馬克思对此反駁說：“……英国社会中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七十年間增加了2700%，即1840年每天所生产的是1770年的二十七倍。根据蒲魯东先生的說法，那就应当提出这样的問題：为什么英国工人在1840年时并不比1770年时富裕二十七倍？这样提問題就是說，英国人即使沒有生产这种財富的历史条件（如私人資本的积累、現代分工、工厂、无政府状态的竞争、雇佣劳动制度，一句話，沒有建立在階級对抗上的一切东西），也能生产所有这一切財富。然而这些条件恰恰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劳动的剩余的必要条件。因此，要获得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和这种劳动剩余，就必需有階級存在，其中一些階級日益富裕，另一些則死于貧困。

但是蒲魯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階級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資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沒有手脚的怪影，就是說既沒有工厂也沒有分工，总之，沒有最初你为了使他能够获得这种劳动的剩余而給他的一切东西。”<sup>①</sup>馬克思补充說，按照蒲魯东的理論，只要在實踐中把現在拥有的一切財富平均分配給工人們，而絲毫不改变現代的生產条件，也就够了。当时，馬克思就已經知道了資本主义的思想家們現在仍然天天作为“具有毁灭作用的論据”提出来反对共产主义的那种情况，也就是知道了这样的分配当然不会保証每个参加者都获得极大幸福的情况。

《哲学的貧困》第一章对蒲魯东的批判，已經間接地批判到資产階級的政治經济学。这門科学的一些經典作家对于資产階級社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頁。

会的内部结构的理解，要比蒲鲁东所能做到的正确得多。但是，他们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比如价值、货币和交换等等，也只有对资产阶级社会发生作用。它们的基础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是阶级之间的对抗。只有消除这种对抗以后，才能消灭这些范畴。政治经济学的各范畴，并不像政治经济学本身想像的那样，是永恒的和自然的；它们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李嘉图从静止的状态中描述经济范畴的形式，而马克思则从运动的状态中说明经济范畴的职能。在探讨蒲鲁东的古怪方法的《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里，马克思主要研究了经济范畴。

马克思在这里写道：“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业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sup>①</sup> 马克思拿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同正统的神学家作了比较。正统的神学家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是神的启示，而其余的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同样地，经济学家认为，历史一直存在到“人为的”封建制度没有消失为止，而从“永恒的和自然的”资产阶级制度存在以来，他们就认为历史就不再存在了。

在马克思说来，揭穿蒲鲁东采用的方法的毫无根据，是轻而易举的任务。如果把辩证的过程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指定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144页。

一个范畴作为抵御另一个范畴的抗毒药，那末，观念当中就不会再有生活了。观念不再发挥作用，它既不在范畴中安置自己，又不在范畴中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马克思作为黑格尔昔日的真正学生，非常清楚地知道蒲鲁东到处都想根除掉的这个坏的方面，正是这个坏的方面在引起斗争的时候，创造着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任务。”<sup>①</sup>

然后，马克思正确地按照下述方式提出一项任务：“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作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sup>②</sup>生产关系决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人们的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借以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以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找到了与封建社会中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54—155页。

时期无产阶级<sup>①</sup>殘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飾起来的，只是处于隱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間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尙未感觉、注意、重視、理解、承認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暫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員由于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們互相对立，他們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們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經濟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絕不是一致的單純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財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貧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員的財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財富，即资产阶级的財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sup>②</sup>资产阶级的經濟学家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借用“永恒的和自然的”規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越暴露得明显，經濟学家越同自己的理論发生分歧，于是在他們当中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馬克思只用了不多几笔，就把资产阶级政治經濟学的几位經典作家描写得极为詳尽，而德国大学中的政治經濟学的“历史学派”及其人数众多的历史注釋者，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殘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經濟关系上的封建殘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規模的资产阶级。从他們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

① 在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此处是“劳动阶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譯本編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156頁。

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經受着暫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暫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經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們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資产階級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財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疇和規律并証明这些規律和范疇比封建社会的規律和范疇更便于进行財富的生产。在他們看来,貧困只不过是一种暫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現时的情况一样。”<sup>①</sup>当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对抗了如指掌,而且沒有任何可能去欺騙群众,叫他們不要相信貧困也像財富那样大量产生这一事实的时候,經济学家便开始以飽食的宿命論者的姿态出現,他們自命高尚,蔑視那些用劳动創造財富的活人机器;或者开始以人道論者和博爱論者的姿态出現,他們希望消除資产階級的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使理論和實踐之間、法和事实之間具有无限的區別,劝告資产者和无产者,把一切人都变成資产者,以便消灭資产階級的生产关系的对抗情形。

如果說經济学家是資产階級的学术界代表,那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是无产階級的理論家。“在无产階級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階級,因而无产階級同資产階級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資产階級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階級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論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們为了滿足被压迫階級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階級斗争的日益明显,他們在自己头脑里寻找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們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識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們还在探寻科学和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頁。

只是創立體系的時候，當他們的鬥爭才開始的時候，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這一面，這個由歷史運動產生並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科學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學了。”<sup>①</sup> 馬克思在這段論述中，以極其精簡的形式說明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過渡。

其次，馬克思評述蒲魯東怎樣把自己的方法分別應用在分工和機器、競爭和壟斷、土地所有權或地租、罷工和工人同盟等許多經濟範疇上的。在蒲魯東看來，分工好像一種抽象的範疇。馬克思在駁斥蒲魯東的這種看法時，證明分工不是抽象的範疇，而是一種歷史的範疇；證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分工有過各不相同的種種形式。根據蒲魯東的意見，機器是“分工的邏輯反題”，是被劃分的勞動的合題或恢復統一。馬克思反駁說，情況並不如此，勞動的組成和劃分，是隨着勞動時使用的工具而各有不同的。決不能先從一般的分工開始，以便隨後從分工中得出特殊的機器。“機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樣，並不是一個經濟範疇。機器只是一種生產力。以應用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廠才是生產上的社會關係，才是經濟範疇。”<sup>②</sup> 但是，工廠中的分工跟社會上的分工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當現代工廠中的分工無論巨細全由企業主的權力進行調度的時候，現代社會要進行勞動分配，除了自由競爭之外沒有別的規則、別的權力可言。”<sup>③</sup> 馬克思訂出一個普遍的規則，即“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權力和社會上的權力是互成反比的。”<sup>④</sup>

工廠是亞當·斯密所指的分工的主要條件；在工廠里，每個工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158頁。

② 同上書，第163—164頁。

③ 同上書，第165頁。

④ 同上書，第166頁。

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而权力即资本则安排和部署工作。但是，工厂并不是像蒲鲁东所以为的那样，通过平等的工作同志之间的友好协定等产生出来的；工厂也不是发生于古老的行会的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sup>①</sup> 使用机器的现代大工业的前身是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美洲大陆的发现和从美洲输入贵金属而促进的资本积累，绕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较短航道的开辟，殖民体系的建立，海上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封建领主的大批侍从被遣散，大多数农民由于耕地变成牧场而无产阶级化，在十五和十六世纪几乎到处发生人民流浪现象。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十八世纪末才出现的。在英国，由于手工劳动的制品已经不能满足扩大的市场的需要，而根据市场的要求首先产生了机器。但是，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而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sup>②</sup> 劳动工具的积聚，并不像蒲鲁东认为的那样，在否定着分工；而是恰恰相反，它在加强分工。机械技术方面的每一项重大发明，都带来分工的加强；而分工的每一次加强，又引起机械技术方面的新发明。蒲鲁东硬说工人认为应用机器是他们的“复原”，可是蒲鲁东的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情况恰恰相反，在十八世纪，工人曾经长期反抗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机器在贬低工人阶级的特长的时候，就使他们丧失了力量。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

自动化工厂引起了分工方面的革命，然而并不是蒲鲁东的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页。

② 同上书，第168页。

資產階級思想的革命，也就是沒有像蒲魯東建議的那樣，不要工人只做別針的十二部分中的一部分，而要他們按順序做完別針的所有十二部分。工廠使分工革命化了，從這一過程的客觀結果來看，這不是為了重新訓練中世紀的行會師傅，而是為了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現代社會內部的分工，產生了許多專業和專職，以及由此而來的職業性痴呆。機械化工廠中的分工，則與此不同，它的特点是勞動在工廠中完全失去專業的性質。但是，同時也消滅了職業性痴呆，開始顯露出個人對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發展的志向。

對於競爭和壟斷，馬克思也同樣指出它們是社會範疇，而不是自然範疇。馬克思說：“……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sup>①</sup> 蒲魯東認為，如果他宣布工業方面的競賽不外是競爭本身的話，就可以打敗那些想以競賽來代替競爭的傅立葉主義者。但是，如果對十四世紀的一個手工業者說，應當把工業方面的全部封建組織廢除，而代之以工業競賽即所謂競爭，那末他一定會回答你們說，各種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的特權正是有組織的競爭。競爭並不像蒲魯東認為的那樣是人類精神的必然要求。但是，同它由於歷史的需要而產生於十八世紀的情況一樣，它也可能由於其他的历史需要而消滅於十九世紀。競爭並不是工業競賽，而是商業競賽。競爭並不是追逐產品的競賽，而是追逐利潤的競賽。“在現代各民族的經濟生活中，甚至還有一些時候，大家都患了一種不事生產專謀利潤的狂熱病。這種周期性的投機狂熱，暴露出競爭竭力逃避工業競賽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質。”<sup>②</sup> 蒲魯東打算消滅的競爭的壞的方面，推動着社會前進。競爭越刺激人們狂熱地去創造新生產力，它就越對資產階級關係發生破壞作用，同時為新社會建立着物質條件。蒲魯東認為壟斷是競爭的必然結局，這是正確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頁。

② 同上書，第173頁。



然而竞争本身就是由封建的垄断产生的；既然竞争产生了现代的垄断，那末，现代的垄断只有在它不断参加竞争的条件下，才可以维持下去。如果垄断者只通过部分联合来展开相互竞争，那末工人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而且无产阶级群众的人数越比本民族的垄断者的人数增加，各民族的垄断者之间的竞争就越肆无忌惮。

关于土地所有权，蒲鲁东认为它的起源不在经济范围之内，而基于同财富的生产很少有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但是地租却有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的作用。马克思反驳这一点时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sup>①</sup>地租是农产品的价格减去农产品的生产费用所得的剩余，生产费用中包括普通利润和资本的普通利息。地租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結果，而且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之下，地租才能够产生。地租不可能是或多或少持久的、或多或少长期的土地本性的結果；它的来源起因于社会，而不在于土壤。按照李嘉图的看法，地租是资产阶级社会状态下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地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企业，把经营资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移到乡村。地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而只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联系在一起。作为地租，土地所有权丧失了它的不动产的性质，而变成买卖的对象。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教他们把自己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

土地所有权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鑄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地租使土地所有者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以至他连自己的领地都可能完全不了解了。

最后，馬克思去分析蒲魯东对罢工和工人同盟进行的責难。据說，普遍提高工資会引起物价的或多或少的普遍上漲，馬克思駁斥了这种說法。他証明說，普遍提高工資会使利潤普遍下降，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資和利潤之間的已經改变了的比例，不会影响商品的价格。罢工和工人同盟有时事与願違，引起了机械技术方面的发明思想加强，馬克思认为罢工和工人同盟对于工业发展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里。尽管經濟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出于不同的动机，坚决地警告工人不要采取罢工和組織同盟的手段，可是罢工和工人同盟仍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益进步。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識的人們聚集起来。竞争把他們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維護工資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們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組織同盟）下联合起来。”<sup>①</sup> 为了破坏这种反抗，个别的資本家也互相联合起来；而为了抵制經常联合的資本，原来各自孤立的工人同盟組成集团。于是，工人維護自己的联盟，就比維護他們的工資更为必要了。工人們捐獻（这一点使經濟学家們极为吃惊）很大一部分工資去支援經濟学家认为只是为了工資而建立的联盟。在这场斗争（真正的內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进行集結和发展。工人所保卫的利益，成了阶级的利益。同盟具有政治性质，因为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

馬克思提醒人們說，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也是从組織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自己的斗争的，以便首先形成一个阶级，而在阶级形成以后，再把封建社会改变为资产阶级社会。“被压迫阶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6頁。

級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階級對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階級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階級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現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繼續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为階級，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sup>①</sup>但是，在旧社会崩潰以后，不会再出現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階級統治。工人階級只有消灭一切階級以后才能解放自己，犹如第三等級即資產階級的解放条件是消灭所有的一切等級一样。随着工人階級的发展，工人階級的胜利将带来一个沒有階級、从而沒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的联合，因为政权正是資產階級社会内部的階級对立的正式表现。“在这以前，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間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階級反对另一个階級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緊張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sup>②</sup>社会运动并不排斥政治运动，因为从来沒有不同步也是社会运动的政治运动。“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結論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  
就是毁灭。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sup>③</sup>

馬克思用乔治·桑的这几句話結束了自己的这部著作。

在反駁蒲魯东的論战中，馬克思完成了同一切空想主义的彻底絕緣。他确凿无疑地証明社会不是人腦的作品，不是聰明的或笨拙的建築師的人造建築物；恰恰相反，社会是本身具有自己的发展規律的活的机体。历史唯物主义已被十分令人信服地証明为发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頁。

② 同上书，第198頁。

③ 同上。

現這些規律的方法，而不是創造這些規律的方法；它也清晰地闡明了三大文明民族的許多優秀人物迄今努力解決而未獲成果的那些問題。

儘管馬克思的這部著作开辟出來的新道路幾乎沒有在同時代人的意識中留下痕迹，但是在歐洲今日的階級鬥爭的發展水平下，與其說這部著作更加沒有人理解，不如說它更加被人理解了。據我們所知，在德國的學術界里，當時這本書沒有被人注意，也就是無論如何沒有受到哪怕是略微符合它的一點價值的注意；在法國，當時它對蒲魯東的威信也沒有動搖多少，以至蒲魯東對法國無產階級的影響仍然不斷增強。

但是，在歷史的舞台上出現了一支堅決而勇敢的先鋒隊，它逐漸地團結在作為新世紀的旗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周圍。誠然，有些學者還不理睬他們的著作；不錯，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還沒有成熟到足可以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向他們提出的那些口號的地步。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已經取得了他們應當致力活動的地盤。他們的科學活動，開始對當時的革命鬥爭發生強大的影響。

## 第五章

### 共产主义者同盟

七月革命以后，比利时变成了认为自己是不依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从而也不依革命为转移的标准的资产阶级君主国。它为一些大国的政治流亡者提供了避难场所，而在这个幻想一破灭后，这个避难所就名存实亡了。普鲁士政府一再努力，想要达到把马克思从布鲁塞尔驱逐出境的目的，结果没有成功。但是，这种作法迫使马克思放弃了普鲁士国籍，同时他既没有在比利时，又没有在国外的其他地方取得国籍。

在马克思于布鲁塞尔流亡的三年当中，比利时的首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中心。从1845年春到1846年夏，恩格斯也寄居在布鲁塞尔。他们两个人从这里，同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人士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经常与《北极星报》的编辑朱利安·哈尼<sup>①</sup>和《改革报》的编辑斐迪南·弗洛孔<sup>②</sup>通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和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艾韦贝克通信。他们在布鲁塞尔市内也得到了一些拥护者，比如同蒲鲁东友好的市图书馆职员菲利浦·日果(Philippe Gigot)，吸引他参加革命活动的，也许主要不是共产主义理论，而是工人运

①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的编辑。——俄译本编者

②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二月革命以前，为《改革报》的总编辑。——俄译本编者

动的人道方面。

他們同祖国德意志也有不断的往来联系；在萊茵省，特别是在該省的科倫，他們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此外，魏特林从倫敦，塞巴斯提安·載勒尔从瑞士，約瑟夫·魏德迈<sup>①</sup>从威斯特伐里亚，也先后到这里找过他們两人。魏德迈原来是个炮兵中尉，后来成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始終不渝的忠实战友。魏德迈返回德国后，也像設法全面排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境内从事写作活动时遇到的出版困难一样，尽心竭力地要把《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吸引到他們这方面来。费尔巴哈的一个年輕的信徒海尔曼·克利盖(Hermann Kriege)，为到新大陆去宣傳共产主义而迁往美利坚合众国以前，也先到巴門去找过恩格斯，后来又 到布魯塞尔去見馬克思。

但是，在布魯塞尔跟馬克思和恩格斯接触的一切人当中，威廉·沃尔弗<sup>②</sup>跟他們二人最为亲近。馬克思称他为“无产阶级的勇敢的忠实的高貴的前卫战士”，后来为了紀念他而把自己所著《資本論》的第一卷献給他。沃尔弗原是西里西亚的一个农奴的儿子；他經歷千辛万苦，在中学和大学里受到了古典語文学的教育，对自己阶级的压迫者从来没有失去刻骨的憎恨心情。他被控为“蠢惑分子”，在普魯士的几个要塞監獄里受了几年折磨；后来到布勒斯劳，依靠充当家庭教师維持生活，他在这里曾热情而勇敢地同官僚制度和书报檢查制度作战。但是，他的革命家的斗志，决不能满足于这种游击战的幽默。他深入到使布勒斯劳的无产阶级奄奄待

---

① 魏德迈，約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德国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他为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傳播奠定下基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俄譯本編者

② 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卓越活动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俄譯本編者

毙的貧民窟去考察，他对这种“囚室”的动人描写，使他得到了一个光荣的外号——“囚室里的沃尔弗”。他在《德国公民手册》上发表的关于西里西亚紡織工人起义的概述，証明他十分理解經濟問題。因受控破坏出版法而被追捕的他，不願意到普魯士監獄里去长期受苦，而最初逃往倫敦，后来又轉赴布魯塞爾去找馬克思和恩格斯，結果成了他們的最积极的助手。他为人忠实可靠，性格坚定，固若磐石，决不动摇，有义务感，对待朋友和敌人都同样严格，而对待自己更加严格。

可見，即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喜欢用大部头的厚本著作专门向学术界不厌其烦地傳播自己的理論結論（实际上，他們决沒有这样），也不缺乏各种动因去实际宣傳共产主义。他們的实际宣傳活动跟他們的理論研究工作同时进行。宣傳活动是一項困难的工作，往往一无所得，至少看来好像一无所得；他們被迫放弃的，不仅有他們这几年热心从事的那項写作計劃。尽管外来的障碍重重，尽管最令人不快的障碍恰好是他們打算給予影响的那些人本身为他們制造的，比如指責他們輕举妄动，过于希望破坏，以自己的破坏性批判妨害社会主义运动，說什么如果不去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社会主义运动一定会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征服整个世界，而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气馁。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有先見之明的人，不会不理解問題恰好发生在这些小事情方面，由于这些小事情的影响，現代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才沒有明确的和一定的目标，而只能接二连三地失败。

毫無疑問，馬克思先后同蒲魯东和魏特林进行批判地清算，並沒有給他带来特别的快意，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天資聰敏的无产者，对他們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初表现，任何人都沒有像馬克思那样高兴地欢迎和深刻地理解。我們也有相当多的証据，可以証明馬克思在布魯塞爾的这个期間对待魏特林是容忍而寬宏大量的。但是，

魏特林的空想主义已經不可救药，所以除了把这个障碍从无产阶级的發展道路上扫掉，再沒有其他办法。魏特林本人和一个不偏不倚的見証人——俄国的政論家安年柯夫，曾对彼此的矛盾达到不能調和地步的 1846 年 3 月期間发生的一个場面作过戏剧性的生动描写。在这以后不久，魏特林使事情表面化，弄得两人完全絕交，而且采取了魏特林本人也認為是显然不对的形式。

这件事情发生在 1846 年 5 月，正值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几个极亲密朋友不得不以通告的形式反对克利盖的时候。这个年輕的大学生，辜負了恩格斯特別寄托于他的期望。他在紐約表現得幼稚而高傲，以欧洲共产主义的預言家自居，在他主編的《人民論壇报》（“Der Volks-Tribun”）上，正如布魯塞尔的通告所指出的，鼓吹荒誕的伤感主义的梦嚟，宣傳“談爱的廢話”，把共产主义描繪成一种充滿着爱的和反对利己主义的事业，把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歸納为以下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胡說八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們的意志頹廢。克利盖做得太不像話了，甚至他的同乡們，即原籍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些共产主义者，都出来反駁他。呂宁<sup>①</sup>甚至違反原作者的意志，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轉載了布魯塞尔通告，从而承認自己的杂志应当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評。但是，魏特林不贊成布魯塞尔共产主义者的声明，他在給克利盖的信里，用极不友好的口吻說他怀疑这些人的意图。他的夸大妄想和以为他人迫害自己，終于使他的最后一个朋友赫斯也同他疏远起来，于是他前往美洲去找克利盖。

在布魯塞尔共产主义者反对克利盖的通告中，也对克利盖曾用各种方法大加吹嘘的正义者同盟进行了批評。但是，参加这个

---

<sup>①</sup> 呂宁，奥托（Lüning, Otto 1818—1868）——德国的政論家，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俄譯本編者



同盟的无产者对待布魯塞尔的批評，要比魏特林明智得多，当魏特林停留在倫敦的时候，他們已經不能同他搞好关系了。大約在1846年底(馬克思說在1846年底，恩格斯說在1847年春)，約瑟夫·莫尔到布魯塞尔来，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說同盟願意拿他們的批判的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論。于是，思想的花火終于落到素朴的人民土壤上面；而爭取真正的无产階級組織(尽管这种組織还为数很少)的工作，也得到了益多損少的結果，因为不善于从无产階級的解放斗争的历史意义去評价这一斗争的一切书本的、空想的和其他的社会主义相繼失去作用。在布魯塞尔，建立了同盟的几个支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支部里积极活动。1846年8月，恩格斯前往巴黎，为的是結束格律恩給那里的德国人的思想带去的混乱；后来他留在巴黎，在这里的支部工作，大概这并没有妨碍他有时返回布魯塞尔。

就在这个时期，实际活动又展現出其他远景。在德意志同盟里，特别是在普魯士境內，革命的預兆日益增多。在規定建立联合省議会的1847年二月特令頒布以后，柏林的想入非非的国王开始向資产階級投降。这是一种胆怯的开端，但这毕竟是由于本身的历史条件不能不发展成为某种更大的开端的开端。三月革命以前的专制制度的整个基础开始动搖了。雪恩和阿尔坦施泰因<sup>①</sup>的傳統，决沒有在普魯士的官僚制度中完全灭絕；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任性脾气，正是由于他极想完全消灭这种傳統，反而使它們巩固起来。隱蔽的反对派的精神，浸透到极为显要的机关的最秘密书橱里，吹掉其中保管的文件上的灰尘。这种精神在僧侶、教师和法官中間，在还没有完全俯首听命于高官显宦的专橫跋扈的官僚

---

<sup>①</sup> 阿尔坦施泰因，卡尔(Altenstein, Karl 1770—1840)——普魯士文化、教育和卫生事务大臣。——中譯者

阶层中間，表現得最为强烈。艾希霍恩在教会和学校方面的正統統治，在那部分还没有堕落到彻头彻尾伪善地步的僧侶中間，在从大学开始一直到乡村小学的几乎所有教师中間，引起了反抗的情緒。法官們由于实施臭名远揚的紀律法，而感到十分不安；萊茵地方的司法人員，由于拿破侖法典經常削減，而开始不易輕信和多疑起来。在軍隊里，特别是在下級軍官当中，也有各种激进的趋势。当軍事机关想以共产主义的思想方式为理由把明登的炮兵中尉安內克解除軍职的时候，曾长期不能对他定罪。在公意审判中，他的真正同事三十名下級軍官主張宣判无罪，而有十八人主張解除軍职，其余的十八人主張只給予警告处分。为了解除安內克的軍职，国王不得不亲自出馬，他頒布了一道具有威胁性质的內閣命令，指定了一个新的公意审判法庭，法庭成員全系校官。在这以后，一些年老的軍人还不得不付出不少的力量，去劝阻安內克的昔日同僚不要同他保持友誼关系。这个事件是个特別令人驚訝的事件，但远远不是証明下級軍官当中即将发生风潮的唯一征兆。

阿达尔貝特·馮·伯恩施太德原来也是普魯士的軍官，他从1847年开始出版《德意志—布魯塞爾报》，每周发行两期<sup>①</sup>。他不是一个人抱有坚定原則的人，而且也不像伯恩斯坦那样仅仅是一个商人。由于他向普魯士駐比利时大使館告密而激起的反对他的事件，使人們对于他的不敢輕信，迅速地在流亡者当中傳播开来。馬克思認為，《德意志—布魯塞爾报》“尽管存在着許多薄弱方面，毕竟还有一些功劳”；他没有发现伯恩施太德是个奸細，所以沒有在这方

---

① 《德意志—布魯塞爾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1847年1月創刊，1848年2月停刊。它的一个出版人阿达尔貝特·馮·伯恩施太德（Adalbert von Bornstedt 1808—1851）是德国的政論家，普魯士政府的密探。馬克思和恩格斯不知道这个情况。从他們經常为該报撰稿以后，就使这份报纸变成了已經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俄譯本編者

面做什么工作，只是一心想把报纸搞好。他同自己的一些朋友，从1847年春开始，并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日益热心地为该报写稿，使报纸得到了当时欧洲民主主义的第三机关报的声誉，同《北极星报》和《改革报》齐名。

这个期间，他的朋友增多了，补充进来一些新的宝贵的力量，格奥尔格·维尔特、莫泽斯·赫斯、斐迪南·沃尔弗和恩斯特·德朗克<sup>①</sup>都先后来到布鲁塞尔。无产阶级当中的一些十分进步的无产者，比如油漆匠施泰因根斯，金银丝带制造工里德尔，《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两个排字工人：后来就任巴塞尔大学教授的斯蒂凡·波尔恩<sup>②</sup>和后来担任美因兹市长的瓦劳，同这些博学的思想家结合在一起了。他们构成了1847年8月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核心，协会约有一百名会员。不久以后，又在11月间成立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这个协会具有国际性质，它把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同聚集在布鲁塞尔的政治流亡者团结起来。协会的名誉主席是把安特卫普从荷兰人手中拯救出来的老将军弗朗斯瓦·梅利奈(François Mellinet)；主席是曾任比利时临时政府委员的律西安·列奥波特·若特兰(Lucien-Leopold Jottrand)律师。副主席有三人：由德国人中选出马克思，由波兰人中选出曾任波兰临时政府委员的约阿希姆·列列韦尔(Joachim Lolewel)，由法国人中选出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推勒里宫总管的安别尔(Humbert)。当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还没有“德意志工人协会”大，马克思也决没有夸大这两个团体的作用。他只认为，直接

---

① 斐迪南·沃尔弗(Ferdinand Wolf)和恩斯特·德朗克(Ernst Dronke 1822—1891)——两人都是德国的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俄译本编者

② 波尔恩，斯蒂凡(Born, Stephan 1824—1898)——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在这次革命时期，他以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早期改良主义的代表之一的身分出现。——俄译本编者

宣傳和社会活动,会对每个人发生特别有力的焕发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从事直接宣傳时所創造的一切,即在《德意志—布魯塞尔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在“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布魯塞尔民主协会”上所做的报告;最后也是最多的,即他們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做的一切,現在仍然发生着特别有力的焕发作用。

### 第一节 《德意志—布魯塞尔报》

馬克思同伯恩施太德的报纸的最初接触,是由他与卡尔·格律恩的論战引起的。

以真正的德国新聞記者自居和在报刊上为自己大登广告的格律恩,像德国的一句諺語所說的,用“賊喊捉賊”的手法大肆詆毀馬克思,說馬克思好像为了貶低他的关于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运动的著作的价值,而采取在报纸上发表短篇文字进行无足輕重的攻击似的。比如,格律恩办的《特利尔日报》,就曾这样誹謗过馬克思。为了回答这一点,馬克思声明說,为了表明自己十分需要反对格律恩的不正当竞争手段,而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他为自己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态》写成的关于格律恩的著作的詳細評述。这篇詳細評述后来也确实載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了;在发表这篇評述的同时,馬克思还在《德意志—布魯塞尔报》上刊登了批判格律恩所著《从人的观点論歌德》一书的詳細評論<sup>①</sup>。馬克思在評論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格律恩沒有从歌德身上发现英明和偉大的地方,而使英明和偉大的东西沉沒在陈腐庸俗的浊流里;然而,他却以典型的报界人士的口吻,夸大歌德的一切庸俗的、小市民的特点,夸大歌德的一切瑣屑的方面,以便

<sup>①</sup> 《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是恩格斯写的,而不是馬克思执笔的。——俄譯本編者

把德国的庸人描写成“人”的理想。

尽管这一批判十分中肯，尽管格律恩对于歌德說的这些庸俗的廢話已經受到了应有的批判，但是不能認為馬克思沒有充分理由再在《德意志—布魯塞爾報》上批判“相当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sup>①</sup>，指責这一部分人“經常叫囂反对自由資產階級，而結果，除了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沒有好处……”<sup>②</sup> 比如，莫澤斯·赫斯当时就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作战，他完全支持他們在研究无产階級革命的后果的一些文章中以及針對卢格所写的若干評論中所发表的观点。不錯，呂宁仍然抱怨馬克思的笔調刻薄，但是他却十分高兴地接受馬克思寄給他的批判格律恩的文章，并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甚至必須附有一定保留条件地接受馬克思对于格律恩所做的严正判决，因为他認為格律恩的确是一个不好的哲学家和不好的社会主义者，但作为一个小說家，毕竟从他本身來說还是一个不坏的民主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同情劳动者，从来不想把无产階級的利益出卖給三月革命以前的反动統治。此外，在評論他們的历史功过的时候，应当在功績方面写下这样一笔：三月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对待三月革命以前的自由主义的态度的問題，已經不是那样簡單的問題了。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从在《德法年鉴》上开始一再着重指出的，德国的資產階級恰好是在它准备同王权和容克地主階級进行斗争的时候，感到工人階級的獅子般的巨爪抓在自己的脖子上。

---

① 这里指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參看本书第一章对于莫澤斯·赫斯所作的編者注)。弗·梅林在本书里(參看第146頁、181—182頁)低估了小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这一流派对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国的危險性，所以沒有完全正确評價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俄譯本編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7頁。

因此，它的政策一方面仍然具有革命性質，可是另一方面，已經有了反動的色調。當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工人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首先應當保證資產階級戰勝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時候；當他們以辛辣的口吻嘲笑“真正的社會主義”打算在自由主義擊敗封建制度以前就征服自由主義的一切試圖的時候，歷史和理性的邏輯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方面的。但是，要想找出仍然具有革命性質的戰略和已經帶有反動性質的戰略之間的分界線，並不是那麼容易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時也在这方面犯過錯誤，不過所站的立場跟“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同。當他們贊揚聯合省議會否決所得稅，認為這一否決是合乎邏輯地徹底從金錢上拒絕支持專制封建制度，認為這一否決是準備從薄弱的地方使專制封建制度失去活動能力的強硬試圖的時候，他們給予推翻所得稅的反對派的榮譽有些過多了。聯合省議會上的發言和表決，證明所得稅之被否決不是由於革命地反對政府的心理，而是出于一種對有產階級的腰包十分反動的關懷。有產階級一毛不拔，甚至不肯犧牲一小點東西去小小地和暫時地改善勞動者的狀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7 年 9 月 12 日發表的文章，儘管在其他一切方面十分出色，但也沒有擺脫這種錯誤。他們在文章中，同“萊茵觀察家”的政府—教會社會主義作了清算。據說，自由派資產階級只關心自己，絲毫也不考慮“人民的福利”。他們在反駁以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這種利己主義為借口的人們時說道：“人民，或者（如果用個更確切的概念來代替這個過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無產階級……不會問，人民的福利對資產者是重要的還是次要的，資產者是不是想把無產者當炮灰。他們根本不想知道資產者想怎麼樣，他們想知道的是資產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麼。問題就在於什麼能使無產階級取得更多的手段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統治，還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資產階級統治。

他們只要把英國、法國和美國的無產階級的政治地位跟他們在德國的地位比較一下就會相信，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僅使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鬥爭中得到嶄新的武器，而且還給他們創造了一種和過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們已成為一種公認的力量。”<sup>①</sup> 可是不要以為無產階級就是柏林的短工或波美拉尼亞的農民，因為無產階級既要很好地看清政府關於人民的福利和不良的社會地位的空談，又要很好地看清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類似言論。

至於基督教的社会原則，已經有了一千八百多年的發展，可是這些原則在實踐中得到了什麼結果呢？“基督教的社会原則曾為古代奴隸制進行過辯護，也曾把中世紀的農奴制吹得天花亂墜，必要的时候，雖然裝出幾分憐憫的表情，也還可以為無產階級遭受壓迫進行辯解。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宣揚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存在的必要性，它們对被壓迫階級只有一個虔誠的願望，希望他們能得到統治階級的恩典。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把國教顧問答應對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補償搬到天上，從而為這些弊端的繼續在地上存在進行辯護。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認為壓迫者對待被壓迫者的各種卑鄙齷齪的行為，不是對生就的罪惡和其他罪惡的公正懲罰，就是無限英明的上帝對人們贖罪的考驗。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頌揚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順從馴服，總之，頌揚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對不希望把自己當愚民看待的無產階級說來，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獨立感比麵包還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帶有狡猾和假仁假義的烙印，而無產階級却是革命的。”<sup>②</sup>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0頁。

② 同上書，第218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这样无情地粉碎了关于国王和人民之間可以結成同盟的美丽幻想。他們写道：“对国王來說，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危險的是人民。但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所說的那种吃了拳头、得点小恩小惠就感动得流泪的人民，这种人民自然不危險，因为他們只存在于国王的想像中。而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貧民，正像霍布斯所說的，是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一个結实而調皮的孩子；他不会让国王（無論是羸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这种人民首先要向陛下要求有普选权的宪法，要求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令人不快的东西。

他們一得到这些，就会充分加以利用，以便尽快地表示他們对君主制的权力、威严和詩意的态度！”<sup>①</sup>这项預言只过了半年，就字字应驗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魯塞尔报》上不仅同政府—教会的社会主义，而且同认为君主是一切反动統治的罪魁的政治激进主义进行了清算。政治激进主义的这种观点，与只能把革命运动解釋为蠢感分子的教唆的君主們的观点，具有同样的深刻意义。这种激进主义的代表者思想越貧乏，也就越叫囂得厉害；卡尔·海因岑<sup>②</sup>就是这种代表人物。在三月革命以前的政治流亡者当中，海因岑以他的說話粗魯和天資不高而聞名。在任何場合下，海因岑都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手，但是他作为整个激进派的典型代表，毕竟还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同他进行比較严肃的論战，并不算是白白地浪費劳动。

馬克思駁斥海因岑說，不能說君主制是德国社会的起源，而是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0—221頁。

②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的政論家，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曾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俄譯本編者



恰恰相反，应当說德国社会是君主制的起源。“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須撑破。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越反动。君主权力的反动性并不証明这种权力創造旧社会，倒是相反地証明，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君主权力本身也就消灭。它的反动性同时就是旧社会的反动性，因为旧社会仍然是官方的社会，因此也仍然是权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权力的享有者。

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所以，現在君主专制不实行集权（集权本是它的开明措施）而打算实行分权。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級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級的活动，而現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說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以此鼓励过資产階級上升，并且还曾經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現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們正在成为已經很强大的資产階級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它那胆怯而魯鈍的目光又从使它繁荣的搖籃——城市，轉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sup>①</sup> 尽管这次辯論十分透彻，但是海因岑仍然百思不解。

他相当不知深淺，在下一年革命斗争方酣的时候，出版了一本拙劣而无味的小册子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可是他自己的革命活动甚至沒有滿足最起碼的要求。叫庸人害怕而使警察大快的是，他写了几册問答式的令人可笑的讀本，用来鼓动士兵們开小差；还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1—342頁。

描写了各种蒸汽断头台，想用它們把各国的君主成批地送到西天极乐世界。在大洋彼岸，他又大发雷霆二三十年，反对德国的君主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可是前者和后者都沒有被他震掉一根头发。

## 第二节 《雇佣劳动与資本》，《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

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协会发表的关于經濟問題的几次講演，只有片断在他的文章《雇佣劳动与資本》<sup>①</sup>中保存下来，它証明馬克思在科学普及工作方面也是有才干的。馬克思首先探討了什么是工資的問題。他根据每一个工人的日常經驗指出，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而恰恰相反，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购买一定数量的生产劳动的那一部分。馬克思接着問道：劳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他回答說：跟决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一切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三方面的竞争：购买者之間的竞争，即需求；出賣者之間的竞争，即供給；购买者和出賣者之間的竞争，即供求关系的变动。这种变动每次都要导致商品的价格趋于它的生产費用的水平。但是，商品的时价总是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費用的。如果某种商品供不应求，那末，这种商品的价格就要上漲，大批的資本就要涌向生意兴隆的工业部門，直到出現生产过剩以后，該工业部門的产品价格落到产品的生产費用以下为

---

① 为了使內容的叙述符合于馬克思經濟学說的后来发展，恩格斯对 1891 年版的这本小册子的正文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关于这个新版本，恩格斯在他所作的导言里写道：“我所加进的一切修改，都是归结于一点。在原稿上，工人为取得工資向資本家出賣的是自己的劳动，在今稿上——则是自己的劳动力。”（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1 卷，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48 頁。——中譯者）——俄譯本編者

止。如果某种商品供过于求，那末，就要发生与上述情况相反的过程，即资本由这种商品的生产领域外流，直到商品的价格涨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上为止。同这种情况一样，劳动的价格也决定于劳动的生产费用。由于劳动的生产费用经常变动，所以劳动的价格有时高于它的生产费用，有时又低于它的生产费用。但是，简单劳动的生产费用，只等于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种属的费用；这种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正如商品的价格一般决定于生产费用一样，最低限额的工资并不是就个别成员而言，而是对整个种属说的。个别工人所得，千百万工人所得，不足以维持生存和延续种属；但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是合乎这个最低限额的。

其次，马克思转到资本的研究上去。按照经济学家们的意见，资本是用作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的劳动。马克思反驳这种解释时说：“什么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种人。上面的说明和这个说明是一样的。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价格一样。”<sup>①</sup> 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表现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批商品，即一笔交换价值之变成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于积累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6页。

資本的實質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實質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sup>①</sup> 資本和劳动“两者相互制約；两者相互产生。”<sup>②</sup>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由此得出一个結論，說資本家和工人是利益相同的。的确啊！如果資本家不給予工人以工作，工人就会灭亡；而如果資本家不剝削劳动，他也会灭亡。生产資本增殖得越快，即工业繁荣得越盛，資產階級的財发得越大，生意进行得越好，資本家需要的工人就越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就越高。原来，尽量迅速地增加生产資本，竟是保証工人能够过上还算不錯的生活的必要条件。

但是，生产資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积累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支配权力的增加，資產階級对工人階級的統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所生产的，是对它发生統治作用的他人財富，即与它敌对的力量——資本；而它从資本那里得到的，則是就业手段，即生活資料，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雇佣劳动重新变成資本的一部分，重新变成使資本加速增长的杠杆。“断言資本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說資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約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貸者和揮霍相互依存一样。”<sup>③</sup>

馬克思举一个最順利的情況作例子，即假設生产資本增加，則对于劳动的需求由此提高，从而劳动的价格，即工資隨之上漲。但是，工資的少許的显著提高，是以生产資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而生产資本的迅速增加，又要引起財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9頁。

② 同上书，第490頁。

③ 同上书，第491頁。

乐发生同样的迅速增加。因此，即使工人能够得到的享乐也增长了，但是这种享乐使他們得到的社会滿足，比起他們得不到的資本家的日益增长的享乐，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却有降低。我們的需要和享乐是由社会造成的，所以我們也要用社会的尺度来衡量这些需要和享乐。我們的需要和享乐，就它們的性質來說是社会的，所以它們也是相对的。名义工資，即劳动的貨幣价格可能提高，甚至实际工資，即工人实际能用自己的工資买到的商品数量也可能提高，然而相对工資可能下降。

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但是資本家要用出售工人制造的产品所得的收入来偿付。

对資本家來說，工人生产的商品的售价，可分为三个部分：补偿資本家預付的原材料和磨損的劳动資料的价款；补偿資本家預付的工資；資本家本身的利潤。第一部分只是补偿原先就已存在的价值，而其余的两部分，即工資和利潤，則完全是从工人的劳动所創造的和被工人的劳动附加于原料价值上去的新价值中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來說，为了拿工資和利潤互相比較，我們也可以把两者都看作工人生产的产品中的一份。在这种情况下，工資和利潤彼此成反比，即利潤增加多少，工資就降低多少，利潤降低多少，工資就增加多少。甚至在資本和雇佣劳动之間的对比关系範圍內，資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也是完全相反的。“假如資本增加得迅速，工資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資本家的利潤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們的社会地位的降低换来的。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会鴻沟扩大了。……”

所謂生产資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論点，实际上不过是說：工人階級愈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敌对它的力量，即愈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財富，它就能在愈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資產階級增殖財富、重新为資本加强权力而工

作——，这样的工作无非是它本身在鑄造金鎖鏈，託資產階級用來牽着它走罷了。”<sup>①</sup>

然而，生產資本的增加和工資的提高，實際上並不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所斷言的那樣是彼此密切聯系着的。好像資本越雄厚，它的奴隸也就吃得越好，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資本的增殖在加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增加資本的金額，就有可能把裝備着更加強大的鬥爭武器的更加有力的工人大軍投入工業會戰的疆場。一個資本家只要把商品賣得便宜一些，就可以把另一個資本家擠出戰場，占有他的資本。而為了有可能把商品賣得便宜一些，而又不使自己破產，這個資本家必須降低商品的生产費用，也就是要尽可能地提高勞動生產力。但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首先要依靠擴大分工，依靠更加全面地採用機器和經常不斷地改進機器。在內部實行分工的工人大軍的人數越多，應用機器的規模越大，生產費用就越能相對迅速地縮減，勞動也就越會有效率。因此，資本家之間就發生了全面的競爭，彼此都想大力加強分工，採用機器，尽可能大規模地使用機器。有一個規律在供求的周期變動的範圍內必然使商品的价格与它的生產費用趨於一致，這個規律使生產方式發生革命，不斷地改革生產資料，一再把資產階級的生產脫出原先的軌道，不叫資本有片刻的休息，而經常在它的耳邊催促說：“前進！前進！”假如我們想像這種狂熱的奮發精神同時籠罩了全部世界市場，那末不難理解，資本的增長、積累和積聚將會怎樣促使分工、新式機器的應用和舊式機器的改進，繼續不斷地、突飛猛進地和日益擴大規模地實現。

這種情況與生產資本的增長具有不可分離的聯系。試問這種情況怎樣影響着工資的決定呢？擴大分工，能使一個工人完成五個、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97—498頁。

十个乃至二十个人的工作，从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强五倍、十倍乃至二十倍。不仅如此。分工还能引起劳动的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也就是说，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要求什么特别的体力、智能和熟练。工人的劳动变成人人都能胜任的劳动。随着劳动日益被人讨厌，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日益加强起来。但是，工资也要因此随之下降，因为一种劳动越简单，越容易被别人学会，它的生产费用就越不太高。工人试图以加紧工作的办法来维持自己工资的一般金额，也就是试图多做几个小时的工作，或在同样的工时内多做出一些产品，以便维持工资的一般水平，可是结果徒劳。工人工作越多，他所得的工资也就越少。这种情况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他工作越多，也就对自己的同业工友造成更加强烈的竞争局面，从而使自己的同志变成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些对手也像他自己一样，愿意按照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的劳动。

机器也发生同样的作用，而且作用的规模更为巨大，因为机器用不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人；因为哪里一开始使用机器，那里的手工劳动工人就被大批地抛到街头，哪里改进或改善了机器，或用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代替了原来的机器，那里的工人就被一批一批地排挤出去。资本家之间的工业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种战争的致胜条件与其说是工人大军人数的增加，不如说是工人大军人数的减少。各个统帅即资本家之间，在看谁能解雇更多的工业士兵方面，相互展开了竞争。

但是，情况还不止于此！小工业家是禁不住这种战争的，因为这种战争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以经常扩大的规模从事生产，也就是必须作为一个大工业家，而决不能成为一个小工业家。随着资本的增加，也就是随着资本的总额和数目的增长，资本的利息将要减少。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收取利息维持生活，必然奔向工业而遭

受小工业家那样的命运。大批的小工业家和小食利者相继淪落，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他们除了赶快地举起自己的手同工人的手一起去乞求工作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于是，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树林一样一天一天地密起来，而这些手本身却一天一天地瘦了下去。

最后，随着这一整个发展进程迫使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运用已有的巨大生产资料，并为了这一目的而开动一切信贷机构，那种使商业世界只有依靠牺牲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把它们献于地下诸神才能保存下来的地震，也愈加频繁起来，简而言之，就是危机也要日益加强。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从而随着扩大市场的要求的加强，全世界市场的容量逐渐缩小，而剩下来可供榨取的市场也越来越少，因为每一先行的危机都要把一些新市场或先前只被略微榨取的市场卷入全世界贸易。只是这种情况，就足以使上述的危机日益频繁和尖锐化。但是，资本并不单单依靠劳动而生存。它像一个豪华而野蛮的奴隶主，在死亡的时候还要用自己的奴隶殉葬，即用危机时期死亡的工人来作祭奠。马克思对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的那种分析，用几句话作了总结：“如果资本增长得迅速，那末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虽然如此，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sup>①</sup>

可惜，就是这个只叙述重点的片断，还是从马克思向居住在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介绍他对于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观点的讲演中保存下来的。他在1848年1月9日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是他当时进行实际宣传活动的另一范例。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6页。



最初，馬克思本想在1847年9月于布魯塞爾舉行的國際經濟學家會上發表這篇演說，大聲疾呼地擁護自由貿易。但是，馬克思當時沒有得到發言的機會。馬克思對於自由貿易問題所持的態度，來自他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所持的原則性觀點。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也抱着與他完全相同的態度。恩格斯在他於愛北斐特發表的一些演說中，警告聽眾們不要把李斯特的保護關稅制度的宣傳看成拯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萬應靈藥。後來，他在《德意志—布魯塞爾報》上證明，無論是實行自由貿易制度，還是實行保護關稅制度，工人的生活都是同樣惡劣不堪，所以乍一看來可能有人以為，不管是自由貿易的擁護者得勝，還是保護關稅制度的擁護者得勝，對於工人毫不相干。但是，德國的資產階級卻需要保護關稅制度，因為如果不用人為的辦法保護和鼓勵它的工商業，它就無法維持和鞏固下去，從而不能使王權垮台。從這個觀點出發，工人階級也與保護關稅制度有利害關係。恩格斯就是從這種意義上，於他反對格律恩的論戰中把保護關稅的宣傳叫做“進步的資產階級措施”。但是，這絲毫不妨礙他嘲笑三月革命以前的社會主義者里廷豪森<sup>①</sup>。里廷豪森在布魯塞爾經濟學家會議上為保護關稅制度的觀點進行辯護，不過決不是從革命的考慮出發的。

但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自己的革命觀點，發表意見擁護英國工業實行自由貿易和德國工業實行保護關稅，以及揭穿英國的自由貿易派<sup>②</sup>和德國的保護關稅派用來裝飾自己的口號的那種

① 里廷豪森，摩里茨(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德國的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第一國際委員，後來成為(1884年以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1848—1849年曾為《新萊茵報》撰稿。——中譯者

② 自由貿易(free trade)——工業資產階級的一種經濟政策方針，它要求自由貿易和國家不干涉私人的經濟活動。1846年，英國的自由貿易派達到了廢除谷物法的目的。谷物法對小麥、大麥和其他種植業產品規定了高額的進口稅。——俄譯本編者

华而不实論点时，他們一点也沒有毫无根据的地方。由于自由貿易派达到廢除英国的谷物法的目的以后，剛剛庆祝过自己的偉大胜利，而現在又不断地吹嘘，說什么无产阶级的“千年王国”将随他們取得統治而开始，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有必要这样做了。

馬克思在他的《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中，反对自由貿易派的这种說法。他指出說，英国的自由貿易派要求降低谷物的价格，只是为了降低工資；并不是地租下降多少，工資就上升多少，而是地租下降多少，資本的利潤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工人已經向自由貿易派表明，他們是不願做自由貿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騙的牺牲品的；他們所以联合自由貿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殘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計錯：为了向自由貿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贊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們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廢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sup>①</sup>即使自由貿易能像它的信徒們所声称的那样可以提高資本的生产力，工人也不要协助这样做。馬克思仍然像以前一样，以在关于雇佣劳动和資本的講演中使用的方式，証明了这项原理。

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所謂貿易自由不外是資本的自由。这种自由决不会对工人阶级有所帮助，恰恰相反，它惨无人道地使工人阶级遭受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一切灾难。然而，馬克思在批判自由貿易的时候，并没有打算由此为保护关税制度进行辯护。

“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見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拥护者。”<sup>②</sup>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然而，这也就是說，要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場，从而也要依赖于自由貿易。保护关税制度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它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0頁，

<sup>②</sup> 同上书，第458頁。

是年輕的資產階級聚集自己力量的手段。馬克思指出德國的資產階級，當時為了達到實行保護關稅的目的，曾經付出巨大的努力。馬克思在結束他的演說時說：“但總的說來，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却起着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对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sup>①</sup>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馬克思才贊成自由貿易。

當然，在國際關係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捍衛着他們的唯物主義歷史哲學。他們反對空洞無物的革命詞藻，因為這種詞藻忽視當時的歷史現實是專制君主或外交家的會議任意製造出來的、毫無條件應當受到譴責的事實，並打算使這個事實在虛構的人民意志面前同這種意志的絕對命令和自由的絕對要求一起消滅得干干淨淨。他們認為各族人民的普遍解放的障礙，是開化水平上的巨大差異和由此而來的各國人民的需要上的差異。在同英國和法國的民主主義者辯論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那種不顧各民族的历史狀況和社會發展水平而死乞白賴地叫它們結為兄弟的各民族普遍兄弟友愛的理論。

另一方面，他們也反對妄自尊大。許多“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就以妄自尊大的態度對待各民族的兄弟友愛，特別是以此種態度對待各民族在偉大的法國革命的旗幟下進行的兄弟友愛。恩格斯在《萊茵社會改革年鑑》第二卷上寫道：“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現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愛，用以對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偽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義；這種兄弟友愛比德國的一切‘真正社會主義’的理論都要寶貴得多。”<sup>②</sup>在他看來，也跟馬克思一樣，認為共產主義才是民主。“任何其他的民主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9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2—663頁。

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sup>①</sup>但是，这种民主所以有充分理由庆祝法兰西共和国，不仅是因为愚蠢得被人用去镇压革命的一切人民应当公开地向法国人道歉，不仅是因为十九世纪的社会运动只不过是法国革命的第二幕，而且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充满胆怯、自私和吝啬的资产阶级时代，回忆一下那个伟大的年代是完全适时的；那时全体人民曾经一度抛弃了一切胆怯、自私和吝啬，那时他们是敢于反抗法律的、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退缩的人，是具有坚强毅力的人，曾经在1793年5月31日到1794年7月26日使得一切胆怯鬼、一切小商人、一切投机者，总之，使得一切资产者都不敢抬头。”<sup>②</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规定了各民族的兄弟友爱可能获得实践意义和成为实际力量的时代。恩格斯接着写道：“幻想成立欧洲共和国和利用适当的政治组织来保障永久和平，就像空谈靠普遍的贸易自由来保护各族人民的团结一样荒唐可笑；当所有这类多情善感的幻想完全不中用的时候，各国的无产者就开始不声不响地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地结成兄弟。也只有无产者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点，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他们的少数几个理论家即使把他们所有那些美妙的‘原则’都搬出来也顶不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根本不触犯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现存制度，他们只会说空话。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665页。

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sup>①</sup>

在这里，重现了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地方见到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使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家和伟大的空想主义者以不够肯定的、模糊不清的预感形式提出的国际性的世界主义思想具有了坚定的、明确的和具体的形式。他们探讨了在什么条件和什么前提下，这种思想才能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对历史进行唯物主义的研究，向他们指出了唯一能够沿着前进的道路，他们也毫不犹豫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 第三节 正义者同盟内的危机

还在马克思住在法国，而恩格斯住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就同正义者同盟发生了最初的联系。但是，同盟当时仍在宣传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没有能够使他们满意，所以他们没有加入同盟。

在这以后，同盟中发生了表示愿意接受他们的观点的进化。同盟本身是由原来参加魏特林在瑞士成立的秘密同盟的三种成分组成的。由于盟员都出身于工人阶级，所以他们差不多全是手工业工人，其中以裁缝工人居多。在巴黎的几个支部里，有两个在1847年主要由裁缝工人组成，一个主要由木器工人组成。一些开设小作坊的师傅剥削这些手工业工人；而手工业工人本身也希望自己最后成为这样的师傅。他们还有一只脚踏在也持有行会偏见的德国手工业上。这些人都像魏特林在瑞士的信徒那样坚强不屈，但是也受到同样命运的威胁——陷入自己的两面性阶级状况的矛盾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5—666页。

之中。

恩格斯对几位极有声望的盟員作过如下的描写：“他（沙佩尔。——俄譯本編者）身材魁偉，性格果决剛毅，随时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本身，是在三十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如像他从‘蠢惑家’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所証明的，他虽然思維有些迟緩，但决不是不能深刻理解理論問題，并且一經他了解了的东西，他就更加坚持不渝地予以奉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有时和他的理智是有距离的，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錯誤，并且公开承認这些錯誤。他是个大人物，他在最初組織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作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遺忘的。

亨利·鮑威尔，弗兰哥尼亚地方出身，皮鞋匠；他是个活潑、灵敏而談諧的小伙子；但在他那矮小的身体里也蘊藏着許多机警和果断。

……跟他們联合起来的有从科倫来的鐘表匠約瑟夫·莫里；这是个大力士，中等身材，——他屡次跟沙佩尔一起胜利地抵擋住成百个企图闖进厅門来的敌人，——这人在毅力和决心方面至少不亚于他的两位同志，而在智慧方面則胜过他們两人。他不仅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家——这点已由他許多次作为全权代表出差获得的成功的事实所証明了，——而且对于理論問題比較容易領会。”<sup>①</sup>有两位比較年輕的領袖，即卡尔·普芬德和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在理論認識的能力方面，大大胜过这几个年长的領袖。普芬德是一位小型精細画的画家，原籍海尔布倫，恩格斯說他具有一副聰敏和独特的头脑，有談諧、譏諷和辯証的天賦才能。埃卡留斯是个裁縫工人，原籍紹林吉亚。

如果拿埃卡留斯的文章——关于倫敦的縫紉业（或者如这篇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7頁。

文章的副标题所说的,关于大小资本的斗争)同魏特林的作品比较一下,立刻就可以明白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为什么没有遭到在瑞士遭到的那种失败。埃卡留斯的写作天才虽然大大不如魏特林,但是他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明确理解,足以补上他在这方面不如魏特林的地方,甚至使他超过了魏特林。埃卡留斯所做的批判,一点也没有伤感、道德和心理的成分,他把大工业战胜手工业看成历史的进步,认为大工业的成果就是历史本身所产生的和每天不断被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

在埃卡留斯写他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经是马克思的学生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事实,正在于正义者同盟设在世界市场的中心而领会了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者同盟从把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以后,就从一个德国人的同盟逐渐变成了国际性的同盟。在同盟组织的工人协会里,除有德国人和瑞士人参加以外,还有主要用德语同外国人交际的一切民族的代表,即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国人和英国人。这个工人协会,不久以后就自己命名为“共产主义工人协会”,并把“人人皆兄弟”这句名言,至少用二十种文字写在会员证上,——据恩格斯说,在写这句名言的时候,并不一定没有文法错误。公开的共产主义工人协会的国际性质,在实践上由于会员的国籍不同,在理论上由于意识到革命要想胜利就必须是全欧革命,也对秘密的正义者同盟发生了影响。正义者同盟积极地参加了居住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每逢法国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而举行的国际大会。

同时,同盟的社会学说的的发展超过了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这个学说在发展中通过了英国的社会主义、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哲学等数个不同阶段。沙佩尔和他的几个同志,在魏特林主办的杂志上著文介绍欧文组织的移民区。这种移民区尽管有很多空想性质,还是不得不去注意大工业的条件,以及对这种条

件发生兴趣。当奥古斯特·貝克尔<sup>①</sup>在瑞士同德国的天主教交流温情观点的时候，鮑威尔、莫尔和沙佩尔就已经向隆格<sup>②</sup>发表公开信，用精細入微的諷刺笔調痛斥了这个新的使徒。他們在公开信里写道：“你在創立新的民族教会，耶穌基督都沒有創立过任何民族教会。为了使教会成为民族的，你要在弥撒当中廢除拉丁文的圣歌，而改用德文的圣歌。人們現在就可以理解他們在作弥撒的时候所唱的圣歌，然而是不是正因为他們每个礼拜日或天天都听他們所理解的圣歌，以至听得感到枯燥无味而认为不够了呢？如果你們突然开始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用民族的德語去說那些一千多年以来已經在全世界各地用拉丁語講慣了的名言，渴望求知的、貧穷而受压迫的教徒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以及其他等等。当魏特林来到倫敦的时候，他再也不能跟同盟的領導者們合作下去了，因为他已經过于迷恋自己的預言家的角色了，而同盟的領導者們則远远地走到了一切宗教的空想主义的前面。但是另一方面，这些領導者沒有順利地而且也不可能順利地把同盟的秘密学說发展成为一种比由德国的哲学和英法的社会主义构成的混合物更加卓越的学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与活动，对于同盟的秘密学說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們宣称对資產阶级社会的經濟結構的科学理解是唯一有根据的理論基础，并以通俗的方式說明問題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主义体系，而在于有意識地参加正在我們目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据馬克思說，当时发出的一些通告，对于同盟的发展起了上述的作用；可惜，这些一部分鉛印和一部分石印的通

---

① 貝克尔，奥古斯特 (Becker, August 1814—1871)——德国的政論家，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时是瑞士魏特林派的領袖之一。——中譯者

② 隆格，約翰奈斯 (Ronge, Johannes 1813—1887)——德国的神甫，利用天主教来为德国的資產阶级服务的“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中譯者



告，沒有保留到今天。但是不管怎樣，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同意立即加入同盟的期間，莫爾就宣布了中央委員會擬在倫敦召開同盟代表大會，並準備在大會上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批判的世界觀作為同盟的學說以公開宣言的形式制定下來，但是由於有一些盟員陳腐守舊，堅持反對的意見，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必須親自出馬，而他們的這一協助，又同他們加入同盟聯繫起來了。於是一切懷疑，就這樣消除了，何況他們深信德國工人階級需要有一個組織，而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組織只能是秘密的。

同盟的第一屆代表大會，是1847年夏在倫敦召開的。馬克思沒有參加這次大會；但是，恩格斯以巴黎支部代表的身分，沃爾弗以布魯塞爾支部代表的身分，出席了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首先實現了同盟的改組工作。代表大會廢除了一切還能使人想起陳舊的密謀傾向的東西，使同盟具有了完全根據民主原則組成的宣傳團體的性質。在同盟章程的第一條里寫道：“同盟的目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滅舊的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建立沒有階級、沒有私有制的新社會。”<sup>①</sup>同盟以“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名稱組織起來，其中設有支部、區部、總區部、中央委員會和代表大會。按照這種組織形式，同盟章程列有以下各項規定。每個支部的組成至少三人至多二十人。區部至少由兩個至多由十個支部組成。本國或本市的各區部隸屬於一個總區部。區部委員會是區內各支部的權力執行機關，而總區部則是本省各區部的權力執行機關。總區部同這些區部和中央委員會保持聯繫。中央委員會是全盟的權力執行機關，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不少於五人，由代表大會指定為中央委員會所在地區的區部委員會選出。中央委員會每三個月作一次關於全盟狀況的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2頁。

报告。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

盟员不超过三十人的区部派代表一名，六十以下者派两名，九十以下者派三名，依此类推。代表大会于每年八月举行，在每次会议后代表全党发表宣言。

至于同盟的经费，则由代表大会为每个国家规定每一盟员应当缴纳的最低盟费。盟费半数上缴中央委员会，半数由区部或支部留用。同盟的货币收入完全用于宣传目的：支付与联络工作有关的费用，支付印发传单的费用，支付派遣代表的费用。同盟章程除要求每个盟员承认共产主义外，还必须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但是没有详细规定这种宣传的进行方式。在实践中，仍然使用正义者同盟试用过的方法。盟员的活动首先是成立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这种教育协会每周开两次晚会，其中一次讨论各种问题，另一次进行各种娱乐、唱歌和朗诵文艺作品等活动。工人教育协会设有图书阅览室，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成立向工人传授各种基础知识的学校。站在公开的协会后面并领导协会的秘密的同盟，把协会看作从事公开宣传活动的最便利场所，并用协会的最合适会员补充和扩大自己的队伍。由于德国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不定，到处漂泊，所以中央委员会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需要派遣特别代表去联络工作。

新的同盟章程分送到各个支部讨论，后来在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最后通过。第二届代表大会也是在伦敦举行的，时间在1847年11月和12月。主席沙佩尔和秘书恩格斯“受1847年秋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同盟章程上签字。在第一届代表大会和第二届代表大会之间，还发生了如下的一个著名事件：当时正向自己的“伊加利亚”移送共产主义者的卡贝，顺便向伦敦的“共产主

义工人协会”求援。协会的答复，表明它已經十分清楚地了解現代无产阶级的任务。协会对卡貝本人表示了应有的尊敬，并且十分高兴地承认：卡貝在为拯救多灾多难的人类的事业中表现了不倦的热誠和值得惊异的毅力，以自己对于各种阴谋所作的警告为无产阶级立了无法估計的大功。但是，协会同时又反对卡貝的移民計劃，认为这是一条錯誤的道路。协会利用一些完全令人信服的論据，証明实现这一計劃会对共产主义原則带来极大的危害，引起各国政府大快，使卡貝的余生因大失所望而暗淡无光。协会当时注意到了卡貝观点中具有的良好东西：对于承认个人自由的共产主义者說来，没有一个过渡时期就不可能实现财产的公有（同时，这是一个民主的过渡时期，私有制在这个期間内只能逐渐地变为公有制），犹如农民认为不种就不能收一样。卡貝还曾亲赴倫敦，同那里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整整辯論了一个星期，但是他沒有能够把他們吸引到自己的烏托邦那方面去。

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把同盟的学說明文規定在宣言里面。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宣言草案，經出席代表大会的德国工人、法国工人、英国工人、比利时工人和瑞士工人討論了不下十天；在草案的两位作者对大家提出的一切疑义作了有理論根据的解釋以后，又全体一致委托他們起草用来向外发表的宣言。以前的那句具有温情成分的格言——“人人皆兄弟”，被換成一句新的、令人騰欢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問世；不久以后，它的英文譯本、法文譯本、丹麦文譯本和波兰文譯本也相繼出版。現代科学共产主义的旗帜升起来了。

#### 第四节 《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以精辟的叙述总结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們

的理論探討和实际斗争所达到的成果。

《宣言》是具有完整意义的历史性文件，是名符其实的历史性文件；只有在它实际問世的那一历史时刻，它才可能产生。只要考察一下宣言的产生时间，就可以完全明白它那不多的篇幅包含着丰富的思想世界。尽管如此，如果說它經受了五十多年的考驗，經受了那么多自己打算永久长存的綱領和体系的考驗，并在不断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里能够日益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旗帜，那也必须把它的这种全世界历史性成就，归功于它的两位作者得以理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的那种明察秋毫的眼力，归功于他們得以在资产阶级社会还处于它的初期历史阶段的时候就說明了这一过程的那种才能。

历史唯物主义是《宣言》的基础。貫串整个宣言的基本思想，在于經濟生产和必然由此产生的一切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构成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基础；在于同这种情况相适应，迄今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間、被压迫阶级和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占据統治地位的压迫阶级之間的斗争的历史；在于这一斗争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已經达到使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一举把整个社会永远从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就再也不能把自己从剥削和压迫他們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地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其中占有光荣一份的許多新研究闡明了沒有文字記載的人类原始时代的历史以后，即从发现了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只是从这种土地所有制解体起，社会才开始分裂为各个阶级)以后，上述的基本思想受到了一个限制，但也只是受到了这一个限制。

《宣言》的第一章題名为《资产者与无产者》，它在这一章里概述了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作为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多次

变革的产物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发生史。“资产阶级这样每发展一步，都伴随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它在封建主统治时期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面是一个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又组成君主国中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的君主国里或专制的君主国里与贵族相抗衡的势力，并且是一切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确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表制国家里夺得了独揽的政治统治权。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sup>①</sup>

《宣言》以明确的笔触描写了资产阶级曾在历史上起过的那种非常革命的作用。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它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庄严光彩。它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僕役。它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不使生产关系发生革命，从而不使全部社会关系发生革命，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地，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因为它消灭着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不前的东西，亵渎着一切神圣的东西，所以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旧的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的各方面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468页。

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賴了，而且無論是在物質生产方面，还是在精神生产方面都是如此。資產階級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了，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漩渦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和征服野蛮人最頑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在本国采用資產階級的生产方式，这样它就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創造出一个世界。

資產階級已經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規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从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資料集中起来，使財產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权。資產階級爭得自己的階級統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可是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利用机器进行的生产，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輪船的航行，鉄路的运轉，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喚出来的大量人口，——試問在过去哪一个世紀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

現代的資產階級社会，曾經像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龐大的生产資料和交換資料，而現在却像一个魔术师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喚出来的魔鬼了。資產階級用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个武器，現在却对付資產階級自己了。就像資產階級据以成长起来的生产資料和交換資料，以前粉碎了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一样，現代的生产力已經几十年来一直在反抗現代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反抗那种作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商业危机的周而复始，越来越凶猛地威胁着整个資產階級社会的生存。在商业危机期間，发作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好像是荒唐現象的

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轉瞬之間回到了突如其来的野蛮状态，而这种情形竟是因为社会文明过度，生活資料过多，工商业規模过大而造成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們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资产阶级只能双管齐下地来克服这种危机，即一方面不得不大量地破坏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夺取新的市場，并且更加彻底地榨取旧的市場。可見，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准备更加全面和更加猛烈的危机，另一方面又在减少防止危机的手段。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运用这武器来反对它自己的人——現代的工人，即无产者。現代的工人只有当他們能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可是他們又只有当他們的劳动能增殖資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宣言》也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作品那样，精簡扼要地描述了現代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有一个事实特別显然，那就是旧社会的內部冲突，在許多方面促进了无产阶级的發展过程。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最初是反对貴族，后来又反对那部分利益同工业进步相抵触的资产阶级，并且由始至終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求援，从而把无产阶级卷进政治运动里去，把自己的一部分政治知識和社会知識授予无产阶级，也就是把反对自身的武器交給了无产阶级。其次，被工业进步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的，或至少由此而使生活条件受到威胁的那部分統治阶级，也給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知識。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整个旧社会內部的瓦解过程，就显得非常强烈和尖銳，以至統治阶级中間有一小部分人分化出来，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这一小部分人，就是已經提高到在理論上認識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

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一切階級都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衰落和滅亡，而無產階級却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 and 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只是为了挽救他們這種中層等級的生存，以免于滅亡。因此，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把歷史的車輪扭向後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指他們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里來，那是指他們維護的不是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他們將來的利益。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腐化的消極產物，他們雖然間或被無產階級革命卷進運動里，但是他們的全部生活條件却使他們更甘心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

至今發生過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運動，或者都是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自主的運動。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的最下層，它如果不摧毀壓在自己頭上的、由那些組成官方社會的階層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腰來。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那末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最初總是國內的鬥爭。每一個國家里的無產階級，當然應該首先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發展，形成現存社會內部的多少隱蔽的國內戰爭，一直到這個戰爭轉變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以建立自己的統治。

《宣言》這樣描述了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改造過程以後，在第一章的末尾用幾項強而有力的論點總括了這一過程。至今有過的一切社會，都是建立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對抗上面的。但是，為了有可能壓迫某一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維持它那奴隸般生存的條件。實際上，現代的工人每況愈下地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的水平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資產階級再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



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維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們落到必須由它养活而不去养活它的地步。社会不能再在它的权力下面生活下去了，它的生活再不能同社会相容了。資产階級的統治依靠雇佣劳动来支持，而雇佣劳动則依靠工人的自相竞争来支持。但是，資产階級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却使工人們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結，代替了工人們因自相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工业进步就把資产階級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从資产階級脚底下抽掉。資产階級的灭亡和无产階級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宣言》的第二章說明了共产党人同无产者的关系。“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殊政党。

他們並沒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們并不提出什么想用以限制无产階級运动的特殊的原则。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階級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別重視和坚持整个无产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的斗争所經歷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終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

所以，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終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比其余的无产階級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階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結果。”<sup>①</sup>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同其余一切工人政党的最近目的是一样的：使无产階級形成为階級，推翻資产階級的統治，由无产階級夺取政权。

其次，《宣言》十分卓越地証明：共产党人的理論原理，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造出来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而是恰恰相反，这些原理来自当前进行着的階級斗争的真实关系。对五十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9頁。

年来资产阶级及其学者向科学共产主义提出的一切问题所作的详尽答复，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叫嚷消灭个人用自己的劳动获得或挣得的财产，这除了使资产阶级也像一切过去的和已经灭亡的统治阶级一样产生错觉以外，不会再有其他结果。资产阶级消灭了封建的所有制，它不反对自己的生产方式一天一天地在消灭小资产阶级的和小农的所有制，但是却把自己的特殊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由生产发展过程中暂时存在的历史性的关系提升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一谈到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它就再也不去理解在说到古代的所有制和封建的所有制的时候它所能理解的那些道理了，也就是说，它不敢去理解这种所有制是历史产物并且属于历史过程的道理了。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具有的一个特征。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因为后者已经不能同社会的历史发展相容了；而共产党人也想在与此相同的历史基础上，废除现代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是，既然这种所有制是那种以阶级对抗、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为靠山的产品生产和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善的表现，那末共产党人就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但是要知道，共产主义的敌人可以同时说我们要消灭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真是这样吗？在现存的社会里，私有制在十分之九的社会成员中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已在十分之九的社会成员中间不存在了。所有制以它现代的形式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中演进。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即使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这也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公有财产，而只是改变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因为所有制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另一方面，僱傭工人依靠自己的勞動結果所占有的東西，並沒有給他們創造任何財產，而只能勉強維持他們的生命的再生產。共產黨人決不打算消滅這種直接用來生命再生產的勞動產品的個人占有，因為這種占有並不會留下任何剩餘的東西能為占有人造成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共產黨人所要消滅的，只是這種占有的悲慘性質，它使工人僅僅為增殖資本而生活，並且只有在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們生活的时候，他們才能生活。

“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活的勞動只不過是增殖已經積累的勞動的一種手段。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已經積累的勞動只不過是擴大、豐富和促進工人的生活過程的一種手段。

所以，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是過去支配着現在，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則是現在支配着過去。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擁有獨立性和個性，而勞動的個體卻被剝奪了獨立性和個性。”<sup>①</sup> 關於消滅自由和個性的一切言詞，不外乎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產階級的個性。資產階級高談自由的大話，一般說來僅僅對於不自由的買賣，對於中世紀的受奴役的市民，才是有意義的；而對於共產主義要消滅買賣、要消滅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要消滅資產階級本身這一點來說，却是毫無意義的。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機會，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機會。

然後，《宣言》反駁那些說共產黨人打算消滅家庭和祖國的指責。《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的家庭建築在資本上面，建築在私人發財的制度上面；這種家庭的完全發展的形態，只有在資產階級中間才存在；這種家庭的補充現象，就是無產者的被迫獨居生活和公娼制度。無產階級中間的一切家庭聯繫越是由于大工業的發展而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1—482頁。

陷于破坏，他們的子女越是被变成简单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那末，资产阶级的关于家庭和教育的那一套大話，就越是令人听来作嘔。《宣言》以辛辣的嘲笑，指出资产阶级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对于共产党人要实行莫須有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駭，其实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希望在消灭現有的生产关系的同时，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消灭。

同工人沒有家庭的情况一样，工人也沒有祖国。决不能剝夺他們原来沒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立为阶级，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随着貿易自由的发展，随着世界市場的发展，随着工业生产和与它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間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无产阶级的統治，将更加快它們的消逝。联合的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努力，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人对人的剝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剝削就会随之而消灭；民族內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敌对关系也会随之而消失。

《宣言》簡短地批駁了从思想、宗教和哲学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責难。人們的观念和概念，簡短些說，人們的意識，是随着人們的生活条件、人們的社会关系和人們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統治思想，都只能是統治阶级的思想。当人們談到思想能够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时候，只不过是說明着下述这样的事实：在旧社会的內部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当18世紀基督教思想在启蒙思想的打击下陷于灭亡的时候，封建社会曾經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竟

爭在知識領域里占統治地位罷了。”<sup>①</sup>然而，有人反駁共產黨人說：也存在着一些永恒的真理，比如自由、正義等等，這些真理是社會發展的一切階段所共有的，當然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也有過改變，然而儘管有這種改變，它們終被保存下來；共產主義如果不同歷史發展背道而馳，是消滅不了這些真理的。《宣言》對此回答說，社會的一部分人剝削另一部分人，在各個不同的時代是採取各不相同的形式的，然而這種剝削却是過去一切世紀所共有的事實。“所以，毫不奇怪，各個時代的社會意識，儘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一定的共同的形態中演進的，也就是在那些只有隨着階級對立的徹底消逝才會完全消逝的意識形態中演進的。”<sup>②</sup> 共產黨將像它最堅決地打破過去傳下來的所有制關係一樣，來打破過去傳下來的各種觀念。

《宣言》這樣令人信服地駁斥共產黨人的反對者以後，又回來敘述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這種革命的第一步，就是無產階級變為統治階級，爭取民主。無產階級運用自己的統治，來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的手里，並且尽可能迅速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為了能夠做到這一點，最初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實行暴力的干涉，即採取這樣一些措施：它們在經濟上似乎是不能夠充分和沒有效力的，但是在運動的進程中它們卻會越出本身，成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這些措施在各個不同的國家里，當然是要各不相同的。《宣言》認為，在一些十分先進的國家里，幾乎到處都可以採取以下的辦法：剝奪地產，把地租供國家支出之用，征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沒收一切逃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把信貸和運輸事業集中在國家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8頁。

② 同上書，第489頁。

手里，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的数量，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以及其他等等。

在发展的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都集中到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联合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在团结成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消灭扎着阶级生存和阶级相互对抗的根子的旧生产关系的时候，它也就一并消灭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宣言》的第三章，是批判十九世纪前期的社会主义文献和共产主义文献的。《宣言》把这一章分成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在反动的社会主义里，又细分成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宣言》对封建的社会主义作了经典性的评价。这一评价现在对于这种社会主义还完全适用，而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尖酸刻薄的俏皮话更加平淡无味了，而它的政治实践更加彰明昭著了。封建的社会主义，是作为法国的贵族在七月革命中和英国的贵族在通过议会改革令后遭受的失败的结果而产生的。法国贵族和英国贵族不能再唱封建的、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了，而为了激起别人对他们同情，他们不得不使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的声罪致讨具有维护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外表。因此，他们引以为快的是，写出一些刺激性文字来讽刺自己的新统治者，并向他低声细语地说出一些不祥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哀怨，半是譏諷；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候固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判刺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于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現代历史进程的劣根性，却常常使人感到可笑。

这班貴族为了籠絡人民，往往把无产階級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揮舞。但是，人民每次跟着他們走的时候，发现他們的臀部盖有旧的封建印章，就哈哈大笑，嘩地一下子散去了。”<sup>①</sup> 封建剝削是在同資產階級的剝削完全不同的（現在已經过时了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当封建主証明在他們統治时期并没有出現过現代的无产階級的时候，他們便忘記了一个事实，即現代的資產階級正是他們的那个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不过，他們很少隱諱自己那一套批評的反动性質：他們控告資產階級的主要罪状，恰好是說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根本推翻的階級发展起来。

他們責备資產階級，与其說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性的无产階級，倒不如說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階級。

所以，在政治實踐上，他們总是参加反对工人階級的一切暴力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又不顧自己所吹噓的那一套堂皇动听的論調，却总是毫不放过机会，拾取黄金果，不惜信义、爱和名誉，靠經營羊毛、甜菜和燒酒生意获取暴利。”<sup>②</sup> 《宣言》把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当作封建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簡單变种，对它进行了清算：說它只不过是僧侶用来滌除貴族肝火的一种圣水罢了。

《宣言》中提到的第二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它的主要代表者是法国的西斯蒙第。在形式上，这种社会主义当时已經死亡了，可是《宣言》中对它所作的批判，在今天也一点沒有过时。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的对立越尖銳，資產階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2頁。

② 同上书，第492—493頁。

級的一切社会主义也就越集中力量去保护小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和反集体制度的农民。“……它都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sup>①</sup>——《宣言》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做的这一批判评价，像适用于西斯蒙第的社会主义那样良好地、甚至比这更好地适用于反犹太人主义、农民狭隘性和行会习气的一切表现。

从原则性批判的深度和强度的意义上来说，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也同样地远远不如西斯蒙第的社会主义，但是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在它提出的防治弊害的手段的不坚决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西斯蒙第的社会主义。对于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仍想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里为中层等级寻找巩固的安身地盘的忙乱尝试，《宣言》早就作了如下的批判：“在近世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已经形成了——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资产阶级，它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但是，竞争经常把这一等级的成员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所以他们已开始觉察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们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sup>②</sup>这个历史过程现代发展得更远了，以至那么多从事职业性写作活动的新的“中层等级”，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大企业的职员构成的，旧式小工业和小商业的日益没落的残余断片，同这种大工业结合在一起。所以，上述的中层等级并不像人们宣称的那样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花岗岩柱石；相反地，它却是一根弱不禁风的芦苇，旧式手工业的根基，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没有扎在它那里。中层等级毫无疑问构成一个比无产阶级拥有许多特权的阶级，而且好像能够使一些胆小的当权人物安心，因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对于工人的解放斗争漠不关心，甚至持有敌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93—494页。



意，而他們本身又受到下述危險的威脅：隨着資本積聚的日益加強，他們將由于競爭而被拋入無產階級的队伍。因此，中層等級日益分化為兩個集團，其中的一個集團較小，成員們身居職位高而薪金多的官職，另一個集團較大，而且還在不斷擴大，它的成員們的生存水平降低到無產階級的生存水平。第一部分人變成資產階級的毫無節操的奴僕，從而絕對不能成為中流砥柱；第二部分人日益同無產階級攜手，并肩前進。他們大部分處于從屬地位，以至他們不能像真正的僱傭工人那樣進行堅決的鬥爭，但是毫無疑問，這個本質已被《共產黨宣言》深刻指明的新中層等級，並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那個被學者院士們捧得天花亂墜的救星。新的中層等級越代替舊的中層等級，私有制的基础就越要動搖，工人階級的獲勝機會也就越要增多。

反動的社會主義的第三種形式，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它的代表人物有赫斯和格律恩。由于這種社會主義產生于德國，所以《共產黨宣言》對它批評得特別詳盡，特別尖銳，然而並不完全公正，因為問題在于這種社會主義的當時代表者們的意圖。這種社會主義雖然早就不再把法國的社會主義詞藻翻譯成陳腐的黑格爾德國哲學的語言和傷感性的愛的幻想的語言，可是在《共產黨宣言》問世以後，它只是勉勉強強地禁住了考驗，但從它的歷史實質來說，它決沒有從德國的土地上死絕。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它的基础是害怕劇烈的階級鬥爭的德國特有的市儈，這便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它的特点。不管這種社會主義怎樣打扮它的外表，也不管它是“倫理學文化”或“自然主義美學”，還是什麼其他別的東西，但是它的外衣始終是一樣的：按照《宣言》上的話來說，是“用思辨的蛛絲織成的、綉滿辭令花彩和浸透甜蜜溫情之泪的”<sup>①</sup>外衣。在這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7頁。

种社会主义者中間，当然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士，比如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就有莫澤斯·赫斯。随着殘酷的階級斗争的加剧，这些精明强干的人士日益趋向“橫蛮破坏”的共产主义，而一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則在这种条件下后退，滾进資本主义的泥潭，而且是滾进这个泥潭的最深地方。

正是階級斗争的这种加剧，随着本身日益由假說变成历史现实，而使保守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結束了它們的存在。《宣言》也把这两种社会主义当作反动的社会主义，对它們作了同样的毁灭性批判。《宣言》以蒲魯东的《貧困的哲学》为例，說它是保守的社会主义的最著名的有系統著作，但是蒲魯东主义在它的祖国，現在甚至落到供少数資产階級人士娱乐之用的地步；而在德国，几十年来已經只有一个追隨者，而且这个人还是一个古怪人物。保守的社会主义同它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可怜改革打算保全資产階級，而不顧无产階級；它向无产階級建議，要无产階級“始終停留在現今的社会里，但要他們抛弃把这个社会看成是一种可恶东西的觀念”<sup>①</sup>；其实，它最終不外是断言“資产者之为資产者，是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sup>②</sup>这种社会主义，不管在百依百順的紙張上把它从理論上描写得怎样动听，实际上已經是过了时的笑料。

尽管在資产階級的一切种类的社会主义当中，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作了很有价值的准备工作，可是对它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共产党宣言》完全承認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这种功績，但是它也指出这一社会主义变种的意义，是与历史的发展进程成反比例的。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是革命的思想家，而圣西門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和欧文主义者則成了反动的宗派主义者，因为他們不想去看无产階級的真实成就，死守着他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8頁。

② 同上书，第499頁。

們的先师的陈旧学說不放。同样地，現代的空想主义，在它还可以出現的地方，比如在海尔茲卡<sup>①</sup>的沒有成功的探險考察中，与流行的反动社会主义的不同地方，“只在于……更为一贯迂腐，更加狂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能奏奇功异效罢了。”<sup>②</sup>

《宣言》的第四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叙述了共产党人对于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当然，这方面的一切情况，由于五十多年来的历史演进，已經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这一章里所确定的共产党人的策略原則，却胜利地禁住了艰巨的考驗。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在当前进行这种运动的时候，也要坚持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現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在所有这些运动当中注重所有制問題，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問題，而不管这个問題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共产党人到处都为爭取世界各国的民主主义政党之間的团結和協議而努力。上述的这一切原理，目前仍然保持着它們的全部作用，当然要有一定的条件，即要从《宣言》的一般思想联系当中去理解这些原理，从而要把所說的革命运动理解为經濟政治变革，而不理解为幼稚的輕举妄动和造反，要把主張无产阶级民主的党派看成是各国的民主主义政党。既然资产阶级的各种民主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內再次証明自己是完全无能的，那末对于上述原理的不正确理解，現在应比以前更加减少了。

在对待各国的态度方面，《宣言》建議共产党人联合現有的革命运动的激进的一翼。在法国，共产党人要联合社会民主党，联合《改革报》的一派，去反对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资产阶级，但要保持自

---

① 海尔茲卡；泰奥多尔(Herzka, Theodor 1845—1924)——奥地利的經濟学家，著有数部空想主义的长篇小说。他的主要作品是空想主义的长篇小说《自由国》(1890年)。——俄譯本編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2頁。

己对于那些从革命的傳統中产生出来的空談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在瑞士，共产党人要支持激进党人，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政党是由一些相互矛盾的分组成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派社会主义者，另一部分是激进派的资产者。在波兰，共产党人要支持把土地革命当作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在德国，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認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間敌对情形的意識，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統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現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17世紀的英国和18世紀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sup>①</sup>《宣言》是用几句话結束的：“共产党人认为隱瞞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們公开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統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顫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而他們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sup>②</sup>**

越到后来，《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越成为現代国际社会民主制的历史。在《宣言》剛一問世的时候，只有先进的无产阶级和明察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3—504頁。

<sup>②</sup> 同上书，第504頁。

秋毫的思想家的不大的精銳隊伍熱情地歡迎它，但是這支隊伍畢竟是太小了，因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人數，在有盟員的各國總共也不過數百人。後來，隨着革命的工人運動進入低潮，《宣言》曾從舞台上消逝。但是，工人運動的巨浪的再起，又把它涌上水面，像一只領航船一樣，用羅盤針指出駛過遼闊的水域奔向勞動的新世界的正確航程。現在，《共產黨宣言》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意義的著作，是由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一切國家的千百萬工人在自己階級的偉大解放鬥爭中必須自願遵守的共同綱領。

在資產階級世界，《宣言》遭到了相當奇怪的命運。它以戰無不勝的力量進入了迄今只靠英國和法國的殘羹剩飯過活的德國政治經濟學，進入了歐洲的一切文明國家。但是，素被認為是德國市民的遺傳性美德的對於理論思考的熱愛，在他們從事典型的寫作活動的日子里就已經消失了，以至在三十多年當中，《宣言》成了被政治警察禁止德國資產階級閱讀的“黑書”。不過，一個叫施梯伯<sup>①</sup>的先生，還是從《宣言》中發現了“智慧和毅力”。1881年，又產生了一件事情，即哈雷的艾森哈爾德，在德國的大學教授中第一個榮幸地發現了《宣言》的存在。艾森哈爾德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史中，稱《宣言》是“對巴貝夫宣言的卑鄙可恥的猴子式模仿”<sup>②</sup>，並引證了一句他凭空杜撰出來的毫無意義的話，作為模仿的例證。這句話就是：“我們希望平等，儘管由此應當毀滅一切藝術。”從此以後，

---

① 施梯伯，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魯士的警察官，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2年) 的組織者之一。參看第 189 頁注。——俄譯本編者

② 巴貝夫，格拉古 (Babeuf, Gracchus 1760—1797)——法國的革命家，空想的平均主義共產主義的杰出代表人物。艾森哈爾德企圖抹殺巴貝夫的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宣言》從原則上加以闡述的共產主義之間的質的差異。——俄譯本編者

又經歷了一代人的半生時間；現在，夜貓子也學會看亮光了，使得它們發現《宣言》中有“暴力革命”，而且还見到了迄今未被道德憤懣所提到的材料。

毫無任何疑問，《宣言》的作者決不希望天真地等待現代的資產階級，一俟他們的历史喪鐘響起來以後，就心甘情願地放棄自己的統治地位。但是，資產階級本身對於這一點也持有不同的意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詆毀“暴力革命”，認為這是对統治階級的善意的粗暴懷疑；而資產階級的法院和警察當局，則把以和平方式宣傳自己階級解放鬥爭的無產者們看成喝人血的革命者，對他們判罪處刑，因為他們說過不能指望現代的資本家自己剝奪自己。其實，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執筆寫《共產黨宣言》的時候，歐洲的土地上就已經響起規模巨大的階級戰鬥即將爆發的裹鳴，而資產階級已舒舒服服地占据了無產階級通過推翻專制封建的社会制度和國家制度的“暴力革命”的辦法為他們打出的地盤，可是他們在良心上却一點也沒有感到慚愧。

實際上，儘管一些非常值得尊敬的學者或人物對於“暴力革命”發出種種怨言，但是這些怨言却沒有認真討論的價值。為了對《共產黨宣言》加以補充和證明其正確而能在這個問題上發表的意見，早就由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說出來了。既然研究從1789到1830年的法國革命時期能使他們深入地探察資產階級社会的改造過程，那末另一方面，這一研究也可以促進他們十分恰當地把資產階級革命的各种形式移用于無產階級革命。在《宣言》出版的時候，兩位作者還都不到三十歲，所以在他們已經年老而經常準備从历史的实际經驗中吸取教訓的時候，就更不可能對自己在年輕時期吸取的历史教訓置之不理了。

馬克思在總結1848—1851年革命鬥爭史的著作中，就已經指出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在進程上的顯著不同。他寫道：

“資產階級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連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繽紛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滿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頂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領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无产階級革命，則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們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們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証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壯地在它們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們在自己无限宏偉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sup>①</sup>

后来，巴黎公社証明：“工人階級不能简单地握取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sup>②</sup>恩格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为例，在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里再一次說明：由于历史辯証法的作用，革命的无产階級从原則上規定和平的和合法的斗争手段时，可以长得“两頰紅潤，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sup>③</sup>，而最为人們公認的秩序的柱石，却声嘶力竭地要求“强制改革”和“由上至下的革命”，要求国家政变和公开的刺刀統治。

历史唯物主义的許多敌人，最喜欢把历史唯物主义描繪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万能圣手，一旦它不能屈指按日預言在今后几百年內将发生什么事情，就得認为它是一个不能应驗的預言者。正直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頁。

③ 同上书，第113頁。

的人們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同一切显灵应驗是針鋒相对的，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能够根据劳动力的多寡、劳动力使用的劳动工具的性质作出比較准确的結論。劳动力从《共产党宣言》中得到鼓舞，建立了一个精神的世界强国。在目前的历史科学所处的条件下，劳动力能够支配的劳动工具越不完备，劳动力就越值得人們惊异。《宣言》本身說道，宣言中的各項原則的实际应用，是随时随地都要依現存历史条件为轉移的，不过不管条件怎样变化，宣言中的各項原則仍然是不可动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既不是为了应一年之急，又不是为了供十年之需，而是为了百年大計；同时，那些曾經一連几年或整个整个十年在他們那里似乎发生过异議的东西，将会在这一百年里得到很好的証明。

他們曾經認為，德国的資产階級革命将要成为无产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这种看法在凱尼格列茨和色当<sup>①</sup>会战时期可能成为什么錯誤的見解，而在今天回顧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时，德国的資产階級革命又能成为什么別的东西呢？

---

<sup>①</sup> 在1866年普奧战争期間，奧国軍队在凱尼格列茨地区大敗。1870年，在普法战争期間，法国軍队在色当潰敗。——俄譯本編者



## 第六章

### 科学共产主义的成就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在德国进行共产主义宣傳是完全不可能的。工人階級对于这种宣傳沒有反应，而主要的宣傳人員又散居世界各地，几乎每个人都不得不为生活奔波。甚至德国的图书市場，都为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人关上了大門；而一些还以激进人士自詡的出版商，在遇到关于出版他們作品的“不符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时候，却是怕得要死。只是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弗兰茨·敦克尔<sup>①</sup>才冲破了因此而被貶的处境。

但是，对于科学的共产主义來說，五十年代并不是白白度过去的。五十年代是科学共产主义养精蓄銳和深化加强的时期。科学共产主义把自己劍上在熾烈的革命斗争年代里击出的缺口磨好，恢复昔日的鋒利劍刃，用坚硬的石头筑起一座堡垒，它的敌人撞上堡垒的石牆，一定碰得头破血流。在还可以进行实际宣傳的地方，比如在美国和英国的报刊上，决沒有放弃过这种宣傳。在巴塞尔和波士頓同时发表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sup>②</sup>里，馬克思揭穿了普魯士政府的丑行，使它受到了应有的譴責。后来，馬克思又給

① 敦克尔，弗兰茨(Duncker, Franz)——普魯士官吏，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中間派左翼的領導人之一。——中譯者

② 1852年，普魯士政府对十一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审讯，控告他們犯了“叛国”和“阴谋”推翻普魯士国家的罪行。卡·馬克思在《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一书中，不仅有凭有据地証明了公訴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揭穿了警察机关用来制造公訴的詭計和伪造。——俄譯本編者

他的朋友魏德迈在美国出版的德文杂志，写了一部叙述法国政变的历史著作，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在这部著作里，指出了法国的阶级斗争怎样使这个平庸无奇而滑稽可笑的人物得到了变成英雄的机会。这部唯物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杰作，这一闪耀着聪明机智的辛辣批判，向一度引起欧洲的一切社会救星吃惊的波拿巴主义指出，它的前途无论是成功或者失败，都同样是可耻的。马克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欧洲撰稿人，一直到美国内战，他始终以锋利的笔触为该报撰写关于德国革命和反革命的历史著作<sup>①</sup>。在1848年宪章运动遭受重大失败以后，宪章派的报刊还继续宣传普选权，马克思以大公无私的热诚，为它们写稿。马克思在几本小册子里，抨击了帕麦斯顿<sup>②</sup>支持沙皇政府的行径。总之，这一切著作，对于一个才干非凡的人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工作成果，然而这不过是马克思在五十年代所完成的工作的一小部分。

马克思依靠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维持生活，而恩格斯仍然在曼彻斯特参加父亲经营的事业。他们虽然不在一地，但并没有停止他们的合作，而做了如下的分工：恩格斯负责捍卫他们的共同原则，反抗敌人的攻击，但在许多年间，都没有得到进行这项工作的机会；马克思通过自己的渊博研究，为现代的共产主义建立了科学基础，并联系历史的发展过程精确地规定共产主义的目的。英国博物馆的丰富藏书，是马克思汲取知识的无尽泉源。在这十年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对各种不同的科学做了深入的研究。他们也像在斗争的熾烈进行期间利用最好的时机那

① 1913年，由于公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才知道《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不是马克思所著，而是出于恩格斯的手笔。——俄译本编者

② 帕麦斯顿，亨利·约翰(Palmerston, Henry John 1784—1865)——英国的反动政治活动家，1830年起为辉格党的领袖之一，曾在1855—1858年间和1859—1865年间任首相。——俄译本编者

样,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段在斗争中不得不暂停的时间。在祖国,一提到他们就是咒骂和诽谤,而他们的敌人可以通过这种咒骂和诽谤不受制裁地发泄对他们的怀恨。但是,这种情况连一瞬间也没有使他们从前进的道路上离开。

然而,这个期间毕竟是十分艰苦的,从恩格斯在过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时期以后于马克思的妻子墓前发表的悼词中还可以听到这种艰苦的余音:“这一次,对于燕妮·马克思来说,也是一次带有流放的一切灾祸的真正流放。她毕竟克服了使她的两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进入坟墓的物质贫困。但是,当政府同资产阶级的反对派,由庸俗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到民主主义反对派勾结,策动大规模的阴谋反对她的丈夫的时候;当他们对马克思进行卑鄙下流的最丑恶的诽谤的时候;当一切报刊都对马克思关上了大门,所有的自卫可能性业已丧失的时候;当马克思在自己的敌人面前突然陷于束手无策,而他和她只能不去理睬敌人的时候,这种情况给她带来了深重的创伤。而且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了很久。”在这段阴郁沉痛的年月里,马克思为自己的主要科学著作完成了奠基工作。

## 第一节 马克思论商品和货币

《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部头不大的书,是最初发表的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所完成的科学工作的成果。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马克思说他准备按照下述顺序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他打算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本书的第一卷论述资本,它的第一篇应由下列三章构成:第一章论述商品,第二章论述货币,第三章论述资本一般。头两章,即论述商品和货币的两章,构成了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第一分册

的內容。

在這篇序言里，馬克思扼要地敘述了他的科學研究的經過。他說，對黑格爾法哲學的評述，使他得出了這樣的結果，即法律關係如同國家形態一樣，既不能從它們的本身去理解，又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去理解；恰恰相反，它們的根子生在物質生活關係當中，黑格爾效法十八世紀英法兩國作家的先例，把這種物質生活關係的總體稱為“市民社會”；對於市民社會的解剖，應當到政治經濟學中去探討。接着，馬克思對唯物主義歷史觀作了經典性的敘述；從此以後，人們便極其經常地引用這段敘述。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sup>①</sup>里十分明確地指出了他的著作的科學—歷史性質，而在每一頁正文中，這種性質也表現得同樣明確。

“乍一看來，資產階級的財富表現為一大堆商品，而個別商品則是這堆商品的原素性存在。”<sup>②</sup>——該書就是用這幾句話開始敘述的。馬克思要研究社會的一定的歷史形態，也就是說，他希望闡明的，並不是商品或貨幣能夠成為或應當成為什麼一般的從哲學上理解的東西，而是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它們體現為什麼東西。馬克思早在反駁蒲魯東的著作里，就曾嘲笑那些把資產階級社會的生活條件提升為人類社會的一般生活條件的經濟學家<sup>③</sup>；現在，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里詳盡地描述了商品和貨幣的歷史發展進程，從而也描述了商品和貨幣的各種學說的历史制約性。資產階

① 指馬克思的未完成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他準備用此作為一本大部頭經濟學著作的導論。在這本大著作中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整個總體，同時批判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這篇導言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譯本第2版，第12卷，第709—738頁）。——俄譯本編者  
中譯文見《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3—161頁。——中譯者

② 參見《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頁。

③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154頁。

級陣營的代表們為了故意欺騙他人，或出於無意識的自我欺騙，不去考慮這一點，而經常絕望地弄混概念，不斷地硬說馬克思正是在他的價值論里從自己的頭腦中臆造出一套理想原則或道德原則，據說更加聰明和更有道德的頭腦才能利用某種其他的理想原則或道德原則推翻這套原則。具有這種頭腦的人，就是馬克思自己，他不過是間接地詳盡發展了李嘉圖提出的想法：“價值規律要使本身充分發展，就得以擁有大工業生產和實行自由競爭的社會，即以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為前提。”<sup>①</sup>

馬克思的科學的歷史觀點，使他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綫索的斷頭處抓住了研究綫索。李嘉圖用勞動時間對商品的價值做了十分精確的規定，但是在他的價值論中，仍然有一些既為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無法解決，又為以前的社會主義者不能解決的矛盾。只要提一下勞動報酬（工資）和勞動產品之間的差異，就可以知道這種矛盾了。這種差異同李嘉圖的價值規律具有尖銳的矛盾，格雷、蒲魯東和洛貝爾圖斯都試圖用消滅貨幣的辦法來消滅它。馬克思比任何其他人都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這種試圖是毫無成功希望的。但是，對於他來說，現在的問題是正確而具體地說明李嘉圖的錯誤發生在什麼地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在哪一點上還沒有充分浸入資產階級社會的機體。馬克思徹底地重新審查了勞動創造價值的特性。他探討了什麼勞動創造價值，勞動為什麼能創造價值，勞動怎麼創造價值，為什麼說價值不外是這樣的一種結晶勞動等問題。然後，他把商品和貨幣之間的關係分成數個階段，並且指出商品怎樣和為什麼（由於商品固有的內在價值特性）以及商品交換怎樣和為什麼一定要製造商品和貨幣之間的對立。

馬克思第一個發現資產階級社會的勞動的二重性。對任何一

---

<sup>①</sup> 參見《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頁。

种商品，都可以从两重观点来观察：既可以把它看作使用价值，又可以把它视为交换价值。

“不管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它的内容，而这一内容，最初是毫无差别地对待财富的社会形式的。我们不能从小麦的滋味尝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也是社会需要的对象，从而被包含在社会联系之中，但它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使用价值，以这种毫无差别的态度对待经济的形式规定，也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是处于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的范围之外的。只有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范围之内。它直接的使用价值是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借以表现的物质基础。”<sup>①</sup> 马克思用这些明晰的论点，铲除了无穷无尽的误解的根源，从而一堆一堆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有供烧火生炉子使用。

一种使用价值，在作为交换价值的时候，能够同任何别种使用价值所值的東西对等，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它们两者得有正确的比例。“一座宫殿的交换价值，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鞋油表示。反过来，伦敦的鞋油厂主可用几座宫殿表示大量鞋油的价值。”<sup>②</sup> 各种商品在互相交换的时候，完全不依它们的自然存在的形式，不依它们作为使用价值时应当满足的需要的特殊性质为转移，尽管它们的外表形形色色，但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的东西。

使用价值是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这些生活资料本身又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消耗人的生命力的结果，也就是物化劳动。一切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物质化，都是同一个统一东西的结晶。“均等地物化在它们当中的劳动，本身应当是同类的、没有差别的、简单的

<sup>①</sup> 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页。

劳动；而不管这种劳动出现在金中，还是出现于铁、小麦或绸缎中都没有关系，犹如氧气不管存在于铁锈中，还是存在于空气、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没有关系一样。”<sup>①</sup>既然使用价值的差别来自创造这些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差别，那末，对于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来说，劳动本身的特别形式也是无所谓，犹如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对于它来说是无所谓的一样。再者，既然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都是各个不同的个人活动的产物，也就是个人的各种不同劳动的结果，那末，使用价值在作为交换价值的时候，就都代表着同一的、没有差别的劳动，也就是消失了劳动者的个性的劳动。因此，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就是抽象的一般劳动。这种劳动已经没有质上的差别，只是随着它物化在不等量的交换价值中的数量的多寡，而有量上的差别。对于在量上有差别的全部抽象的一般劳动，只有一个衡量大小的尺度，这就是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的标尺，则是时、日、周等自然的时间量度。劳动时间是劳动的活的存在，这种存在对于自己的形式、内容和个性都一律相待，而没有任何差别。一切商品，在作为交换价值的时候，不外是凝固的劳动时间的一定数量。物化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一方面是使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从而成为商品的实体，另一方面又是测定商品价值大小的尺度。

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化为失去差别的、同类的、简单的劳动，是以抽象的形式实现的，但这是每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抽象。“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是比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的抽象既不大、同时又不小的现实的抽象。”<sup>②</sup>一般人类劳动的这种抽象，存在于本社会的每个平常人所能完成的平均劳动当中，这是人的肌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的生产性消耗。这也就是构成资产阶级社会

① 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的絕大部分劳动的簡單劳动。复杂劳动是复合的、自乘的簡單劳动。比如，一日的复杂劳动等于三日的簡單劳动。复杂劳动向复合的簡單劳动的这种轉化，不管它是根据什么規律完成的，实际的經驗都显然証明它是每天不断进行的。复杂劳动的产品，每天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去交換簡單劳动的产品。也十分清楚，創造价值的劳动時間，一定是必要劳动時間，也就是在一定的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同样一件新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時間。馬克思早在《哲学的貧困》中就已經指出，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实际生产它的時間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時間来确定<sup>①</sup>。

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形式下，在商品生产当中，二重性是劳动所固有的本質。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是占有統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与資本主义社会密不可分。既然劳动創造使用价值，所以它从本質上就具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劳动在作为一种合乎目的的活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掌握大自然的各种要素的时候，便构成人类生存的条件，构成人和自然界之間的物质变换的条件，而且这种条件不依任何社会形式为轉移。这种劳动要有物质作为自己的前提，所以它不是它所創造的一切东西的唯一源泉，也就是說，它不是实物財富的唯一源泉。不管在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界的物质之間比例具有什么差別，使用价值总还是要包含着一种自然界的基質。

相反地，創造交換价值的劳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劳动形式。我們在一切文明民族进入有史时期的时候，都見到过原始公社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个人的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机体的成員的职能。在中世紀的人身徭役和实物貢賦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联系不是依靠它的普遍性，而是借助它的个体特性形成的。在古代的

---

<sup>①</sup>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7頁。



家长制家庭里，妇女紡紗，男人織布，以供家庭自用；紗和布是家庭範圍內的社会产品，而紡和織則是家庭範圍內的社会劳动。家庭同家里自然发展起来的分工的联系，在这种劳动的产品上打上了它所特有的社会印記。在这里，紡和織的社会性，并不在于紗和布能够作为同样的一般劳动時間的等值和等价的表现者而互相交换。只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个人劳动才由于具有自己的直接对立面的形式，具有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而成为社会劳动。交换价值是特殊的社会劳动形式的实体表现。一种交换价值本身并不包括自然界的物质，因为劳动是它的唯一源泉，同时也是由交换价值构成的财富的唯一源泉。

但是，商品本身却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的統一；同时，它只有在同其他商品发生关系的时候，才成为商品。商品彼此之間的实际关系，就是它們的交换过程。在彼此独立的个人参加的这种社会过程中，商品必然兼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既是滿足特殊需要的特种劳动，又是可以換成等量的同种一般劳动的一般劳动。物化在各个商品中的个人劳动，应当直接具有一般劳动的性质，而商品的交换过程，則必然要发展和扩大这种矛盾。

每一特殊的商品，在作为交换价值的时候，就成为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反之，被其他一切商品用来測定自身价值的每一特殊的商品，又是交换价值的完全相等的存在的表现；于是，一种特殊的、单独分出的商品，就变成交换价值，并由于其他一切商品都向它轉化，而成为一般劳动時間的直接物化。結果，商品本身包含的矛盾，即它兼为特殊的使用价值和一般等价物，从而既是每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又是一般使用价值的現象，便在这个单一的商品中得到解决。这一特殊的、单独分出的商品，也就是貨幣。

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作为特殊的商品在貨幣中結晶的。貨幣这种晶体，是交换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現的必然产物；在交换

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实际上彼此开始相等化,从而实际上都向商品转化。货币是在交换的发展过程中本能地被创造出来的。直接交换产品的贸易(这是交换过程的最初形式),与其说是商品向货币转化的开始,不如说是使用价值向商品转化的开始。交换产品的贸易越向前发展,使用价值越变为商品,从而交换价值越采取自由的形式并且不再同使用价值发生直接联系,交换产品的贸易就越促进货币的产生。最初,只有一种商品,或几种具有最一般的使用价值的商品,比如奴隶、牲畜和金属,偶然被人用来当作货币。有许多种类不同和适应程度有大有小的商品,曾经轮流地执行过货币的职能。最后,这一职能落到贵重的金属身上,因为贵重的金属具有能够使一切商品的货币存在结晶的那种特殊商品的必要的物理特性,即具有直接来自交换价值的本性的那些特性,比如使用价值的持久性,可以任意分割的特性,各个部分的均质性,这种商品当中的每个单体之间没有任何差异。这种特殊的商品要保存在交换过程中;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物质化的这种商品,应当是均质的,只能有数量上的差异。

在贵重的金属当中,黄金逐渐变成被单独分出的货币商品。黄金成了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变成商品的流通手段。通过商品向黄金翻筋斗,积累在商品中的特种劳动,证明自己也是抽象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如果商品未能实现这一转化,那末,它不仅要失去作为商品的意义,而且要失去作为一种产品的意义,因为它之所以成为商品,是由于它对自己的持有人没有使用价值。

黄金,即成了价值尺度和商品流通手段的特殊商品,没有得到社会的进一步协助,就变成了货币。黄金与那些只是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的代表者、一般的社会劳动的代表者、抽象财富的代表者的商品不同,它本身就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但是,黄金也是实物财富的物质代表者;它可以满足各种需求,因为它能够直接交换

任何必需品；黃金在它的堅實的金属體里，以隱蔽形式包含着在商品世界發展起來的一切实物財富。同時，從黃金的形勢來說，黃金也是一般勞動的直接體現，而從它的內容來說，則是現實的一切種類勞動的總和。黃金在作為一個個體的時候，是一般財富。它由僕人變成了主人，由一個普通助手變成了商品之神。

馬克思闡述了貨幣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作用的一切細節，照亮了以前被曖昧的半明半暗或完全黑暗統治的一切地方。他的經濟分析有力而精微，就像一台汽錘一樣。關於這樣的汽錘，馬克思在一個地方寫道：“它輕而易舉地把花崗岩的巨塊擊成粉末，而且也不是不能輕輕的几錘就把釘子打進軟質的木頭里去。”<sup>①</sup>因此，再沒有比羅雪爾及其追隨者對馬克思所做的那種指責，即說馬克思高談感人的神話和曖昧的神秘論的非難更錯誤的事情了。恰恰相反，馬克思驅散了籠罩着商品生產和一再使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識糊塗的那層神話的和神秘論的煙霧。

馬克思指明了社會生產關係怎樣被人看成了存在於個人之外的對象，這些個人在自己的社會生活的生產過程中參加的一定關係怎樣被人看成了事物的特殊性能，而這種本末顛倒的曲解，即追求實利的這種真正而非想像的神秘化又是怎樣說明創造交換價值的勞動的一切社會形式的。“在商品上，這種神秘化還是很簡單的。人人都多少地意識到，作為交換價值的商品之間的關係，不過是人們在他們的生產活動中彼此發生的關係。在比較高級的生產關係上，這種簡單性的外貌就消失了。貨幣主義的一切錯覺的根源，就在於沒有看到貨幣代表着社會生產關係，但是採取着具有一定特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自鳴得意地嘲笑貨幣主義的錯覺的現代經濟學家，一到處理比較高級的經濟範疇，比如處理資本的時

---

<sup>①</sup>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5頁。

候，自己也发生同样的錯覺。当他們剛剛大致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作为社会关系出现在他們面前的时候；当他們勉强地得以确定为社会关系的東西，又作为物来戏弄他們的时候，这种錯覺就以天真的驚訝的形式，在他們的身上暴露出来。”<sup>①</sup> 罗雪尔最好是应当略微仔細地玩味一下为了自慰而在他的几大厚本书里前后六次嘲弄馬克思时所做的那种細微的区分；他用俏皮話說：馬克思是一个聰明人，但是沒有聰明的头脑。

在商品和貨幣方面，馬克思揭露了商品生产的神秘化現象。他本来打算接着証明資本方面的这种神秘化現象，但是一些外来的原因，其中包括使他屢次中断工作的长年疾病，一連八年妨碍了他繼續不断进行这一已在 1859 年开始发表的著作的写作。这部著作的第一分册遭到了冷遇，完全沒有被人重視。然而，罗雪尔的政治經济学教科书，却接二連三地再版，历史方法在其中为自己的关于貨幣和商品的胡說八道，直到为貨幣是“令人高兴的商品”这一具有鼓励作用的发现，庆祝胜利。

## 第二节 科学共产主义的 一部主要作品

1867 年，《資本論》这部偉大著作的第一卷問世了（很多年間，一直只是出了第一卷）。馬克思在这部书里，使他的对于政治經济学的批判，达到了經典性的完成阶段。馬克思描述資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就好像登上了一个居高临下的場所，从这里俯視清晰而醒目地展現在眼前的現代社会关系的一切領域，犹如經過一番突击而攀上最高山峰的人，从山巔鳥瞰迤邐在他脚下的山麓一样。

---

<sup>①</sup> 參見《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8 頁。

馬克思在他的新著的第一篇里，再一次總結了他在1859年的著作中對於商品和貨幣的問題所做的敘述。同時，他還是以無比豐富的形容，在全世界這樣廣闊的範圍內，用色調精細入微的圖幅，來進行這一總結的。在寫作技巧方面能夠比得上《資本論》的這幾章的世界文學創作，是不太多的。許多人談到的這幾章的難於理解，只發生在沒有上過思維的辯證法學校的讀者身上。只要認真地努力，這個從被創造出來的人的生命深處的泉眼流出的同時清冽得可以數出泉底的每粒砂子的認識的清泉，就能出現在每個具有健康頭腦的人的面前。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二篇里，轉向由貨幣到資本的轉化問題的研究。既然在商品流通中進行着相等的交換價值的交換，那末，貨幣的持有者怎麼能夠按照商品的價值買進和賣出商品之後獲得比他原來投入的貨幣增殖的價值呢？貨幣的持有者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在現存的社会關係下，他在商品市場上發現了一種商品，這種商品具有消費了之後可以創造新價值的獨特性能。這個商品就是勞動力。馬克思由此解決了古典經濟學沒有能夠解決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也曾徒勞無益地解決過的一個謎；馬克思還由此說明了勞動報酬和勞動產品之間的似乎同資本主義生產的價值規律矛盾得無法相容的差別。

勞動力以活的工人形式存在，活的工人需要一定的生活資料來維持自己的生存，以及維持保證工人死亡以後還能繼續有勞動力的家庭的生活。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是勞動力的價值。但是，以工資形式支付的這種價值，大大低於勞動力的購買者可能從勞動力上榨取來的價值。超過補償工人的工資所需要的時間的工人剩餘勞動，是剩餘價值的源泉，是不斷增加的資本積累的源泉。一切不勞而食的社会成員，就依靠這部分無酬的工人勞動過活。也就是說，付給地主的地租，資本家獲得的利潤，

以及國稅和地方稅，都依靠這部分勞動償付，資本主義社會的整個大廈都建築在這種勞動上面。

誠然，無酬勞動本身並不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唯一無二的特点。從社會上出現有產階級和沒有財產的階級以來，沒有財產的階級總是被迫向有產階級提供自己的無酬勞動。只要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壟斷生產資料，自由的工人或不自由的工人，就不得不在維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再做若干時間的工作，去為生產資料的私有者生產生活資料。僱傭勞動不過是自從社會分裂為兩大對抗階級以來就占居統治地位的無酬勞動制度的特殊歷史形式，也就是一個為了使人能夠正確地了解而應當就其本身加以研究的特殊歷史形式。

為了使貨幣轉化為資本，貨幣的持有人必須到商品市場上去尋找自由的工人。這裡所說的自由的工人，有雙重的意義：第一，說他是一個自由的人，擁有作為商品出售的勞動力，除了勞動力以外再沒有其他任何可供出售的商品；第二，說他一貧如洗，沒有任何必要的物品來實現自己的勞動力。這不是自然歷史關係，因為大自然既不創造貨幣和商品的持有者，又不創造本身只擁有勞動力的人。然而，這裡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那種社會關係，而是長期的歷史發展的結果，是歷來的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也就是一系列比較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消滅後的產物。

商品流通是資本發生的起點。商品生產、商品流通、發達的商品流通、貿易，構成為資本發生的歷史前提。現代資本的生活史，從現代世界貿易和現代世界市場在十六世紀產生以後就開始了。庸俗的經濟學家們胡說八道，似乎自古就一方面存在着一伙克勤克儉的人士，他們積累了財富；另一方面又有一批好吃懶做的二流子，他們揮霍無度，最後除了出售自己的身體以外，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換錢了。這種胡說八道是鄙俗的瞎扯，而且鄙俗得同資本

階級历史学家的昏庸完全一样。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由于自己昏庸，在描述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解体过程时，把这种解体完全看成是工人的解放，而不认为这同时就是由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向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的转变。随着工人不再作为奴隶、农奴等等而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以来，生产资料便不像归进行独立经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所有那样归工人所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土地、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在一系列强制和残酷措施的帮助下，被剥夺得干干净净。马克思在《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从英国历史上引证一些十分明显的例子，对这类措施作了详尽的描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大批自由工人，就是这样发生的。“……资本一生长下来，就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出血污。”<sup>①</sup> 新生出来的资本一站定脚跟，就不仅维护和支持工人同他们的劳动条件的分离，而且用日益扩大的规模开始再生产这种分离。

雇佣劳动与以前的各种无酬劳动的不同点在于：在使用雇佣劳动时，资本的运动没有止境，资本对剩余劳动的贪求无厌。在产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主要意义而产品的交换价值没有太大作用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剩余劳动只是供范围多少比较狭窄的需要，而且从生产本身的性质当中还没有对剩余劳动产生无限的需要。但是，在产品的交换价值具有主要意义的社会里，情况就不同了。“资本，作为他人勤劳的生产者，作为剩余劳动的吸收器，作为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自己的能力、贪求无厌和效率方面，都远远超过以前的一切以直接的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sup>②</sup> 对于资本来说，重要的东西不是劳动过程，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价值的增殖过程，即是使资本可以比原来的投入额增加价值的交换价值的创造。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贪求是无厌的。交换价值的生产不知道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61页。

② 同上书，第365页。

需要的滿足為使用價值的生產規定的界限。

同商品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一樣，商品的生產過程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的統一。價值創造的過程一直繼續到以工資形式支付的勞動力價值得到等價的補償為止；過了這一點以後，價值創造的過程就變成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變成價值的增殖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價值創造的過程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形式。在勞動過程中，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互相發生影響；在價值的增殖過程中，資本的這兩個組成部分，以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形式出現。不變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料，即變為原材料、輔助材料和勞動資料；它在生產過程中不改變自己的價值量。可變資本轉化為勞動力，並在生產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價值，也就是再生產自己的等價物，此外還生產剩餘的等價物，即生產本身可以改變而且有多有少的剩餘價值。由此可見，馬克思為剩餘價值的研究開出了一條光明大道，同時把剩餘價值分成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兩種形式，其中的每一種剩餘價值，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上發生着雖非相等但有決定意義的作用。

在資本家延長工作日，使它超過勞動力的再生產所必要的時間時，就創造絕對剩餘價值。如果一切都任憑資本家為所欲為，那末，一個工作日可能占滿全天，達到二十四小時，因為工作日越長，它生產的剩餘價值也就越大。工人相反，他們確實地感到，他們在為補償自己的工資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以外，每多作一小時的工作，就會使他們受到損失；他們必然要使自己的身體受到勞動過度的痛苦。

自由的工人一出現在歷史舞台，就為爭取標準的工作日而鬥爭，直至今日仍在繼續。一個資本家，不管他的人品高尚還是丑惡，都要為攫取利潤而奮鬥；競爭促使他把工作日拉長到人的工作能



力的极限。工人相反，他們要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爭取每天多休息几个小时而奋斗，以便不仅有可能照常工作、吃飯和睡觉，而且有可能在其他种类的活动方面显示自己的人性。

馬克思以十分令人信服的笔触，描述了英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間在工作日的长短問題上进行的五十年內战。这场內战从大工业出現以后开始，直到頒布十小时工作日法才結束。大工业促使资本家排除人的本性、生活习惯、年齡、性別和昼夜更替为资本家剝削无产阶级所設的一切障碍。十小时工作日法是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也是防止工人阶级本身自願地跟资本家簽訂合同以出卖自己和后代致死与处于奴隶地位的不可克服的社会障碍。

相对剩余价值，是由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時間縮短和剩余劳动時間随着增加而創造出来的。在产品决定着劳动力价值的一些工业部門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为此，必須不断地改革生产方式，改进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馬克思在《資本論》探討协作、分工与工場手工业、机器与大工业的各章对于这个問題所做的历史推論、經济学推論、工艺学推論和社会心理推論，是他至今所做的一切論断中的最著名推論。甚至为他作傳的一位资产阶级作家，也嘲笑那些学院式的政治經济学教科书不从这个丰富的宝庫里汲取科学知識，而仍然肤淺地和武断地相信亚当·斯密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对于分工問題所做的論断。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使人原諒这些教科书，那就是要折断海格力斯<sup>①</sup>的手指头容易，而想从馬克思这样的革命思想家的著作里找到可以直接供作资产阶级大学的养畜飼料的思想困难。

馬克思不仅指出机器和大工业怎样以比过去的任何一种生产

---

<sup>①</sup> 海格力斯(Hercules)——羅馬神話中的大力士，相当于希腊神話中的赫拉克勒斯。——中譯者

方式都巨大的規模創造了駭人聽聞的貧困，而且也指出機器和大工業怎樣在改革資本主義社會的同時又為更高一級的社会經濟形態作好了準備。

制定工廠法，是社會對它的生產過程的自發形成的制度首次有意識和有計劃地施加影響。當工廠法調整工廠和作坊里的勞動的時候，最初不過是干預資本家的剝削權利。但是事實的力量，最後又促使工廠法也去干預所謂家內的作業和限制親戚領域的活動，從而促使工廠法承認大工業隨着破壞舊家庭制度的經濟基礎和與此相適應的家庭勞動，也在破壞舊的家庭關係。“舊家庭制度在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瓦解，儘管顯得十分可怕和可厭，但是由於大工業在家務之外的社會有組織的生產過程中，給予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以極為重要的地位，而為家庭和兩性關係的較高形式創造出新的經濟基礎。當然，把基督教德意志的家庭形式看成絕對的，同把古羅馬的家庭形式、古希臘的家庭形式或東方的家庭形式看成絕對的一樣，都是不合理的。其實，這些家庭形式是依次繼起，形成一個統一的历史發展系列。顯而易見，由男女兩性和不同年齡的個人構成的結合勞動體，在它的自發的、粗鄙的資本主義形式下，當工人是為了生產過程而存在，而不是生產過程為了工人而存在的時候，是使人滅亡和遭受奴役的禍源，但在適當的條件下，它反而一定會變為人道發展的源泉。”<sup>①</sup> 機器把工人貶低到簡單的附屬品的地位，可是同時又為提高社會生產力創造了條件，使它達到能使人類得到應有的一致發展的高度。至今存在過的一切社會經濟結構，對於人類的這種發展都是無能為力的。

馬克思探討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以後，就得出政治經濟史上第一個合理的工資理論。商品的价格是用貨幣表示的商品價值，而工資則是勞動力的價格。

<sup>①</sup>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99頁。

直接出現于商品市場上的不是勞動，而是出售自己勞動力的工人；勞動只是作為一種叫作勞動力的商品的消費過程而發生的。勞動是價值的實體和內在尺度，但是它本身並不具有價值。不過乍一看來，勞動好像以工資形式得到了報酬，因為一做完工作，工人就領到了工資。工資的形式擦去了工作日之被分為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的一切痕迹。

在使用奴隸勞動的條件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時，奴隸好像是完全為主人而勞動，甚至他們僅能用以補償自己的生活資料價值的那一部分工作日，也被用去為主人效勞。他們的全部勞動，都表現為無酬勞動。相反地，在採用僱傭勞動制度時，甚至無酬勞動也會以有酬的形式出現。在使用奴隸勞動的條件下，所有制關係掩蓋着奴隸為自己所做的那部分勞動；而在僱傭勞動制度下，貨幣關係掩蓋着僱傭工人白給資本家付出的那部分勞動。因此，馬克思所說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轉化為工資的形式，即轉化為勞動本身的價值和價格時發生的決定性作用，是不問自明的。工人和資本家的一切權利觀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神秘化，這種生產方式產生的一切有關自由的幻想，庸俗政治經濟學所做的一切支吾詭辯，都建築在這種掩蓋着真實關係和造成直接對立的關係假象的表現形式上面。

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是工資的兩個基本形式。馬克思以計時工資法的頒布為例，順便揭穿貪婪無厭的剝削者，而首先是雄赳赳的俾斯麥，為反對頒布限制工作日的法令而經常放出的言詞的卑鄙自私的荒誕性，這些剝削分子說，似乎在限制工作日之後，會使工資下降。實際上，我們看到的現象却與此截然相反：臨時縮短工作日，可以使工資下降；但是長期縮短工作日，卻能夠對工資發生提高作用；工作日的持續時間越長，工資的金額就越少。

計件工資不外是計時工資的轉化形式，它是最適合於資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工资形式。计件工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得到特别广泛的应用之后，到英国大工业的突飞猛进时期，便成了用来延长劳动时间和压低工资的杠杆。采用计件工资，对于资本家十分有利，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使资本家不必去监督工人劳动，而且为资本家提供着各式各样的借口，以便扣工资和施展其他方式的资本主义欺骗伎俩。但是，对于工人来说，实行计件工资，就是同一系列的巨大害处连结起来。在这种报酬制度下，工人的过度劳动损害着他们的健康，工人们本希望依靠过度的劳动多挣几个工钱，然而在实际上，这种制度只有降低工资水平的趋势。此外，计件工资还在加强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削弱他们的团结精神；由于采用计件工资，就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产生一个中间的寄生分子阶层，他们从工作报酬上剥皮，得到相当不错的一部分收入；以及产生其他等等弊端。

使工资和剩余价值联系起来的那种关系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断地替资本家再生产资本，而且也在不断为工人再生产贫困，也就是说，它一方面再生产拥有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材料和一切劳动工具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再生产广大的无产者群众。这些无产者为了取得数量勉强可以维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抚养能够工作的无产者的新生后代的生活资料，而不得不向上述的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但是，资本不单纯是被再生产，而且不断增殖和壮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篇，即在自己描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篇，对于这一“积累过程”作了研究。不仅是剩余价值可以由资本发生，反过来资本也可以由剩余价值发生。

每天生产的剩余价值，一部分被有产阶级当作收入，在他们当中进行分配，然后消费掉，另一部分当作资本积累起来。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来的无酬劳动，现在成了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数量越

来越大的无酬劳动的手段。由于生产的繼續进行，最初預付的全部資本，与直接积累的資本比較起来，即与日新月异地轉化为資本（不管这项資本是在积累者本人手里发生作用，还是在他人手里发生作用）的剩余价值比較起来，一般在数量上不断地相对减少。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私有制規律，由于它自身內在的、必然的辯証法，而轉化为自己的直接对立面。商品生产的各項規律，似乎确定了私有權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权利。彼此平权的商品持有者互相对立，同时只有轉让自己持有的商品，才是获取他人商品的手段，而自己的商品只能由劳动来生产。現在，私有權在資本家那方面，表现为把他人的无酬劳动或产品据为己有的权利；而在工人这方面，則表现为他們不可能享用自己的劳动产品。

当現代的无产者开始明白現象之間的这种联系的时候，当里昂的城市无产階級敲起警鐘的时候，当英国的农业无产階級放火烧毀地主庄园的时候，庸俗的經濟学家发明了“节欲說”。根据这种学說，資本是由于資本家的“自願节欲”而发生的；馬克思无情地抨击了这个学說。实际上，促进資本积累的是工人的被迫“节欲”，是强制降低工資，使工資低于劳动力的价值，以便把一部分必要的工人消費基金变为資本积累基金。实际上，对于工人的“奢侈”生活方式发出的一切哀号，关于好像柏林的石匠們喝过一瓶香檳酒而不断发出的叫嚷，基督教社会主义改良主义者的廉价菜譜，以及諸如此类的資本主义欺詐表现，都是来源于此。

因此，資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規律如下。資本增殖的本身包含着它的可变部分，即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一部分的增殖。如果資本的构成仍然未变，也就是說，为了使一定数量的生产資料（不变資本）发揮作用，还需要与原来数量相等的劳动力，那末，对于劳动和工人生活基金的需求，显然要随着資本的增殖而比例地增加，而且資本增殖得越快，对于劳动和工人生活基金的需求也增加得越

快。同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原有规模的资本主义关系一样，扩大规模的再生产，即资本积累，以扩大的规模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关系，即在一极再生产越来越多或越来越大的资本家，而在另一极再生产越来越多的雇佣工人。

由此可见，资本的积累过程就是无产阶级的壮大过程，同时在上列的情况下，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在十分有利于工人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工人本身生产的剩余产品在数量上日益增加，越来越多地变为追加资本，而有很大一部分这种剩余产品，又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工人手里，所以他们可以扩大自己的需要范围，更好地以服装、家具等等充实自己的消费基金。但是，工人不能由此摆脱从属和受剥削的地位，犹如穿着漂亮衣服和吃着美味饮食的奴隶不能不再是奴隶一样。

工人们经常被迫付出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不错，付出的数量可能减少，但是决不会下降到给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造成任何严重威胁的地步。如果工资被提高得造成了这种威胁，那末，发财致富的刺激将会弱化，资本的积累将会减缓，直到工资回降到满足于资本增殖的要求的水平为止。只有在劳动的价格因资本的积累而上升，并且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之间的比例仍然未变的时候，雇佣工人本身早就为自己锻好的那条金锁链的长度和重量，才能使这条锁链的压力减轻一点。但在实际上，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发生巨大变动（不变资本增加，可变资本相对减少），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生产资料总量的增长快于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总量的增长，对于劳动的需求不会随着资本积累比例地上升，而要出现相对下降的趋势。由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各项规律引起大资本吞并小资本而发生的（与资本的积累无关）资本积聚，也起着这样的作用，不过形式有所不同。如果在资本积累的突飞猛进时期形成的追加资本随着数量的增加而日益减少吸收工

人，那末另一方面，周而复始再生产的、构成发生变化的旧資本，將日益大量排斥它原来使用的工人。这样，就出现了相对的人口过剩，即劳动時間超过資本增殖的需要而来的工人过剩，从而产生了产业后备軍。在工业停滞时期或工业的营业处于平淡状态时期，这支后备軍沒有經常性的工作，所得的报酬低于自己劳动力的价值，或者被迫向社会慈善团体求援，但是不管怎样，它是一个使在业工人失去反抗力量 and 把他們的工資压在低微水平的因素。

既然产业后备軍是在資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积累或发展財富的必然产物，那末，它也要成为資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存条件。随着資本的积累及附带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突然扩大資本的力量也在加强。这种力量要求大批的人力，以便能够把它們一举投入新的市場和新的工业部門，而不必縮减其他領域的生产規模。現代工业特有的生活道路，具有十年一循环的周期形式，周期由一般复苏、生产高漲、危机和蕭条等阶段构成，間或被一些較小的波动打乱。这条生活道路的基础，是产业后备軍的不断形成，即产业后备軍的或多或少受雇和重新形成。“社会的財富越大，运用的資本越大，这种資本增殖的規模和能力越大，也就是說，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及其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軍也就越大。……产业后备軍的相对数量与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这支后备軍越比現役的劳动大軍增加，經常的过剩人口也就越扩大。这种过剩人口的貧困，与現役产业大軍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的极穷苦阶层和产业后备軍越大，正式的赤貧現象也就越显著。这就是資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規律。”<sup>①</sup>

<sup>①</sup>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11—812頁。《資本論》中譯本所根據的德文版為“成反比”，現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俄文第2版第659頁改正為“成正比”。——中譯者

这种积累的历史趋势，也是由此发生的。同资本的积累、积聚和集中一起，“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向前发展，即科学在技术上的有意识应用，土地的有计划开发，生产资料向只能集体使用的劳动资料的转化，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联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来的节约……将以经常不断扩大的规模向前发展。随着夺取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人数的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规模继续扩大，但是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同时加强。他们在人数上不断增加，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训练、统一和组织起来。资本的垄断成了同这种垄断在一起和在它之下成长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不能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并存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破裂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起来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sup>①</sup>

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将被恢复，但这已是在资本主义时期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自由的工作者的协作以及土地和用本身劳动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实现的恢复。

“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所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化，当然是一个比实际上已经以社会生产过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向公共所有制的转化更为持久、困难和艰巨得多的过程。前一种转化的实质，在于少数的剥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一种转化的实质，是人民群众要剥夺少数的剥夺者。”<sup>②</sup>

当然，只用不多几张篇幅，是不可能对《资本论》第一卷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和大量事实提供即使是近似的概念的。在这样的概括中，或多或少必然会有未被充分论证的地方，而这样的地方，在《资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6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965页。



本論》第一卷中，却是用石头一块一块地垒起来，以铁一般的邏輯牢靠地連結在一起，巩固地建立在事实的坚硬基础上，而沒有任何修飾的。尽管全书中的精神瑰宝十分丰富，随手即可拾得，但是这本著作还有一个表明作者才华的最真实特点，那就是給讀者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忘記的印象：作者的技巧比他的創作本身还要高明得多。

馬克思一方面批判了政治經濟学，另一方面又使它作为一門科学达到完善的地步。馬克思是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奠定的基础上进行建筑的；他关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是对于前人研究的繼續发展。他的研究从被所謂独立的思想家打断了的这项研究的断头处开始，更正确一些說，从他們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內在規律的作用还未發揮到使他們能够深刻認識这种規律的地步而不得不打断这项研究的那个地方开始。古典政治經濟学的資產階級繼承者們，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办法：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暴露它的真实的而且毫無疑問是可惡的面目，他們就越不研究和闡述这种生产方式，而专心为資本主义的现实擦胭脂抹粉，同时把这种作法叫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在馬克思的这部书問世以后，他們最初試圖使用他們的慣用手法，即对該书一言不发，保持完全緘默。但是，当这种策略沒有奏效的时候，他們又发出了老一套的哀鳴，說什么这本书具有非科学的傾向。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事实，是《資本論》第一卷問世八年以后 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批判。这项批判不是来自哪一个曼彻斯特派，而正如批判的內容所表明的，来自历史学派的某一个代表。

这位大家写道，誰要想彻底地理解資本的实质，就得科学地探討資本的真实历史。这种研究工作要求具有巨人的力量和甘願矮人一头的忍耐精神。誰要想談論現代財富分配制度的不公，就得探討与現代的利潤和工資有关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探討这种不公

的发展和消灭。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向学問渊博的讀者証明他所要証明的任何一种东西。看完这段前言以后，讀者大概有权利期待作者做出如下的結論：馬克思在他的著作里滿足了上述的一切要求。可是并未如此！我們讀到：“馬克思有意識地和故意地停在十九世紀头二十五年英国政治經濟学的观点上，对于已經进步的科學后来获得的一切成就采取輕視不理的态度，或者不如說是一窍不通。他努力向前发展和补充大卫·李嘉图的学說，并仿效李嘉图的抽象手法，好像要竭力談出李嘉图始終沒有說出的最后意見。他具有自学成功的人的一切傲气，依靠他認為确凿无疑的前提，然而別人却認為这些前提早已被推翻了。李嘉图和其他一些老作家，当然有过不可置疑的功劳，比如他們研究了并完善了經濟学邏輯，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很久以前，而且成了过去。目前正在試图应用这种陈旧的經濟学邏輯解决与資本主义所有制有关的迫切問題以推动科学前进的那个人，即走着錯誤道路和……的那个人，在科学生活中错过了整整一代的时光。”其实，好像被馬克思错过了的这段“整整一代”的时光，是被巴师夏及其模仿者的詭辯和罗雪尔及其他“历史方法”大师的胆怯的无效掙扎所浪費：一方面，巴师夏及其模仿者利用詭辯伎俩，伪造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說；另一方面，罗雪尔及其他“历史方法”大师胆怯地进行无效的掙扎，企图越过古典政治經濟学得出的使資产階級“不快的”邏輯結論。

我們只举出这一个例子就可以了，因为它完全沒有道理，而且最能說明資产階級政治經濟学許多年来和数十年間每当必須評价馬克思作品的时候就使用的那种理解問題的手法。将来，馬克思的作品也不可避免要影响資产階級政治經濟学。事态发展的本身，已經十分显然地証實了馬克思所作的結論，使得对于眼光短淺的人甚至都不必說明馬克思的論据的正确性了。沒有一个資产階

級經濟學家現在還敢于重復二十多年以前這類經濟學家對於《資本論》第一卷所說的那一套陳腐的廢話。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還在做着的一切真實工作，都直接或間接處在這部書的影響之下。

既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同科學共產主義鬥爭的時候，不能只使用麥秸或稻草，而且也要用比較堅硬一點的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所以它就利用《資本論》的烈火鍛造着這一武器。如同蠻族即使在求諸文明的武器去保卫自己的陳腐過時的社會制度時不能免于滅亡的命運一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也終究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

但是，在馬克思的作品開始同工人階級形成血肉相連的關係以前，工人階級也還必須經歷經濟的發展，從其中受到教育。這是出于事物本身的要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里，曾親自暗示過這項要求。他說，也同歐洲大陸的其餘地方一樣，德國不僅受着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痛苦，而且受着這種發展的不足的痛苦。由于古老而已經過時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着這種生產方式的陳舊落后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還在苟延殘喘，而存在着一大串遺傳下來的災難，它們模糊了工人們的認識，使他們看不見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揭露出來的現代社會災難的內部聯繫。約翰·菲力浦·貝克爾<sup>①</sup>把《資本論》稱為“工人階級的聖經”，這是一個從理論上來說不恰當，而從歷史上來說是正確的比喻。

最初，人們對《資本論》表示的驚訝勝過對它的閱讀，對《資本論》的贊美高于對它的理解，解釋《資本論》時表現的篤信熱心大于批判的深思熟慮。關於“教條主義的狂熱”的指責，在當時比現在

---

<sup>①</sup> 貝克爾，約翰·菲力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曾參加1848—1849年革命，第一國際德國支部的組織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俄譯本編者

具有較大的意义，因为德国大工业的势不可擋的进步，現在一天比一天清晰地表明馬克思是多么正确地理解了英国大工业的典型本质，他的著作是多么沒有教条主义的性质，而是一部科学的历史性的作品。

这部描述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定时期的科学的历史性的作品，不可能成为洞察未来的一切时代的絕對无誤的源泉，而且任何人也不可以額外地对馬克思提出这种要求。最近三十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許多为馬克思所不知道的和他没有以現在的形式預見到的現象；現代工业特有的生活道路，沒有繼續保存馬克思所說的十年一循环的周期形式。但是，在个别事实上出現的偏差，只是証明了那个被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中占有統治地位的一般趨勢。有人企图引証工人階級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达到最高发展的国度才取得的成就，来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工人階級带来的貧困，結果白費力气。

然而，被馬克思科学地証明出来的资本主义积累趨勢，正是在于大工业越是向前发展，它本身也就越以自己使人挨餓和逼人强制劳动的鞭子教育和訓練将来去挖掉它的资本主义老根的劳动大軍。打算說服工人階級相信經濟的和政治的階級斗争无济于事的那套臭名远揚的高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妄图把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經過艰苦的努力才由大工业中挖掉的东西說成是大工业的成就。这种高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临刑之前說出的笑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利用这种笑話来縮短它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的运动的痛苦阶段。



0284196